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4
第2期

ISSN 1671-2811



2024年6月 第2期(总第102期) 第26卷
No.2 (Sum 102) Vol.26 Jun.2024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年6月第2期(总第102期) 第26卷

黄宏嘉：我爱中国多一些

龙美光

黄宏嘉，湖南临澧人，微波电子学家。1922年8月27日生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在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电子所（筹）兼任副研究员，电子所正式成立后，兼任所学术委员、微波传输研究室主任。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分所，任所党委会成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同时兼任《激光》杂志主编。1979年6月起担任上海科技大学（今上海大学）教授、副校长、名誉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父亲是最佩服的学者

黄宏嘉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他回忆说：“我父亲黄右昌是我最佩服的学者。清光绪年间，父亲12岁就考中秀才，在湘西一带传为佳话；17岁中举人，被清廷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23岁回国戊申部试第一。民国初，他27岁时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历18年。后去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委员、大法官。虽然有了官衔，但父亲的情趣仍在于治学，以诗人著称。父亲的治学风范对我起了潜移默化影响。”

在北京念完小学，黄宏嘉就跟随父母到了南京，就读中央大学附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又随父母辗转到了四川，就读于国立合川二中（今属重庆）。这所学校是由内迁的扬州中学办的，教学水准并不差，就连一度恐慌的数学，他也在数学老师汪桂荣先生循序渐进、一丝不苟的教学下迎头赶上了。一个假期里，他跟父亲学写中国古文和旧体诗，进步很快。由此，父亲希望他传承衣钵学文。不过，经过一再权衡，他选择了在大学读工科的志愿。

一个人要珍惜自己的成果

1940年高考，黄宏嘉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联大机械工程学系。当时，日军正侵入越南，昆明局势危急，学校决定将一年级和先修班新生安排在川南的叙永分校入学。获知录取消息后，他按学校要求从重庆乘船，溯江抵泸县（今泸州），再辗转乘卡车到校报到。

在叙永分校，学校强大的师资阵容震撼了黄宏嘉。一年级主要是基础课程，授课的教授多是声名在外的名师大家，如朱自清、杨振声、郑华炽、霍秉权、蒋硕民等。他们不仅学问一流，对学生的课业要求也十分严格。和众多知名教授相比，刚任教不久的英文教员王佐良资历还较浅，但他认真严谨的教学态度令黄宏嘉折服。

据《黄宏嘉传》记载，一次上英语习作课，王佐良出题《值得回忆的往事》。黄宏嘉写的是自己读初中时被朱静秋老师在“雪耻楼”前进行工业强国教育的情景，这使他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学工科。作文交上去，被老师很欣赏地给了A⁺。个把月后，老师突然找到他，说要办英文教学成果展览，让把那篇作文拿去做展品。但黄宏嘉找了个遍也没找到，王佐良感到很惋惜，告诫他说：“一个人要珍惜自己的成果，凡是有意义的材料都要慎重保存。”这对黄宏嘉触动很大，从此养成了保存重要材料的好习惯。

联大学业奠定终身志向

到联大之前，黄宏嘉认为机械才是纯粹的工科，故而报了机械工程学系。可是读完一年级，他突然对电磁学发生了特别兴趣，便提出了转系申请。此时，叙永分校已迁回昆明。经批准，他转入了电机工程学系电讯组，投入到更加刻苦勤奋的学习中。哪怕是暑假，也要赶早起床，去排队挤图书馆。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他安静地温习英文。经几个月苦读，英语水平提高很多。到了大三暑假，已能用英文打字机敲出长达7页的《大学生活素描》，将它发表在“民主墙”的学生壁报上。

其间，著名电子学家孟昭英在系里任教授。一次，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MIT Radiation Laboratory）短期回国的孟教授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工学院简陋的大教室作报告。和简陋的办

（下转封三）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 刊

2024 年 6 月 第 2 期(总第 102 期)第 26 卷

本刊顾问

于千千 徐 彬 苏 莉 李玛琳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高 峰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岳 宁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杨春禄 谢灿坤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 瑛 杨松禄 罗建生 钟瑞华

诸 芳 魏贵华

主 编:何云葵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杨松禄

副 主 任:罗 雷 李亚强

责任编辑:念兴昌 郭周静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严维国

编 务:郭周静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年第 2 期 第 26 卷

1999 年创刊

目 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内涵诠释、生成路径与时代意蕴 刘化军，王酉霖（5）

●统战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实践经验、问题和策略

——基于广东省 A、B、C 三市的调查分析 郑 维，肖海艳（15）

歌谣与统战：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视角下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研究 刘 鹏（24）

●协商民主与治理现代化

积分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

——基于浙江省 P 市的考察 吴 昌（32）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功能定位与运作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钱再见，史诗悦（42）

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杨松禄（50）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5*2024-02]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向度	彭舸珺, 陈 真 (59)
“共同体”的书写: 滇缅公路文学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彭春瑞, 李心澜 (65)

● 历史与文化

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阐释	赵世林, 蒋正珊 (72)
有“血”有“肉”的文艺: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金永梦 (81)

● 学习与思考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现状及其路径优化	刘华清 (89)
洱海保护治理从“抢救模式”向常态化的转型	夏志贤 (97)
新时代文化宣传在融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实践研究	马 雯 (107)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的思考 ——以云南省为例	谭舒匀 (115)
黄宏嘉: 我爱中国多一些	龙美光 (封二三)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2 (Sum 102) Vol.26 Jun.2024

Contents

Studies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Great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Connotation Elucidation, Generative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Liu Huajun, Wang Youlin (5)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United Front

Experience,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United Front in the New Internet Age: Surveys on Three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 Wei, Xiao Haiyan (15)

Ballads and the United Front: A Study of CPC's Democratic Undertakings of the United Front with Workers and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ary Ballad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Liu Peng (24)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Governance under Credit System as a Form of Exercising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 Survey in City P in Zhejiang Province Wu Chang (32)

Create a Stronger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Realistic Foundation, Function's Specification and Operative Logic to Forge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An Analytical Angl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Qian Zaijian, Shi Shiyue (42)

Evolution of Borderland Governance through China's Ancient Dynasti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Further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Yang Songlu (50)

Cultural Dimens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Community Peng Gejun, Chen Zhen (59)

Writing on "One Community": the Yunnan-Myanmar-Highway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Peng Chunrui, Li Xinlan (65)

History and Cultu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Yunnan Ethnic Group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Zhao Shilin, Jiang Zhengshan (72)

Art with "Flesh" and "Blood": Ai Siqu's Outlook on Marxist Art Jin Yongmeng (81)

Learning and Thinking

On Present Condition of "Time Bank" Mutual Aid Elderly Service Model and the Optimal Development Approaches Liu Huaqing (88)

On Erhai Lake's Protection Management: From "Emergency Mode" to Normalized Protection Xia Zhixian (97)

A Study of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ultural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Era Supported by Integrated Media Ma Wen (107)

On Social Management of Concentrated Resettlement Community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A Case of Yunnan Tan Shuyun (115)

Huang Hongjia: I Love China Even More Long Meiguang (Back Covers)

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内涵诠释、生成路径与时代意蕴

刘化军，王酉霖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锻造了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这一伟大精神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全面阐释，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主动精神蕴含着“把握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尊重历史主体，发挥首创精神；坚定历史自信，践行使命担当”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和发展、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植继承、源于对百年大党成就经验的深刻总结。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继承与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能够为运筹帷幄“两个大局”激发动能，为站稳人民立场指引航向，为开展自我革命增添力量。新时代唯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以历史主动把握战略主动，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伟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内涵诠释；生成路径；时代意蕴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05-10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多次对历史主动精神做出深刻论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首次以党的文献形式正式提出“历史主动精神”这一重要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号召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①，从而把握历史发展潮流之大势，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谱写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绚丽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精神秘匙，历史主动精神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等学科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历史主动精神理论内涵的研究

学者们从历史主动精神这一概念的学理性出发，将历史主动精神所蕴含的理论逻辑进行深层次剖析，并提出不同的观点。侯衍社从五个方面^②对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做了具体阐释；骆郁廷等指出，历史主动精神首先体现为历史先锋精神，其次为历史自觉精神，再次为历史创造精神；^③刘爱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2020CX01）；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云南财经大学）（21SZJS53010689）。

作者简介：刘化军，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王酉霖，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② “五个方面”，即“尊重历史规律的科学精神、尊重人民的主体精神、清醒自觉的主动精神、未雨绸缪的预见精神和勇毅前行的担当精神”。参见侯衍社：《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第21—31、155页。

③ 骆郁廷、付玉璋：《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三重内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9期，第80—89页。

军等认为历史主动精神是一种积极的、自发的或自觉的精神状态，其观点表现为“精神状态说”，认为侯衍社等人观点属于“精神表现说”，并提出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是通过“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我们党的历史成就经验”及“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政党领袖”三方面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①

（二）对历史主动精神形成逻辑的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基础、文化基因与逻辑理路等方面探赜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机理与发展脉络。刘鹏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为源，强调历史主动精神受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并从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中汲取力量。^②徐家辉认为历史主动精神在科学的理论、独特的文化根脉及共产党这一主体的共同作用下形成。^③孙冲亚等从“人们自觉创造历史”出发，通过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对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展开论证。^④

（三）对历史主动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

历史主动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学者们将历史主动精神置于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的历史方位，阐明其时代价值。张晓婧在阐释历史主动精神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之上提出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主要在于为新时代推进党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精神力量。^⑤梁军等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历史主动精神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价值总体上在于调动全党全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但具体价值在不同时代有所不同。^⑥廖晓衡强调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不可替代，主要体现在三方面^⑦。

（四）对历史主动精神弘扬路径的研究

作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学者们结合百年党史，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逻辑主线，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历史主动精神的弘扬路径：田心铭聚焦于“什么是我们所要发扬的历史主动精神”，指出把握历史主动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两个结合”是获得历史主动的现实途径、开展自我革命是赢得历史主动的有力武器、敢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⑧张士海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牢牢把握四对辩证关系^⑨，才能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李明奎等则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出发，通过对三个历史决议的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的路径主要为呈现历史成就、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划历史任务三个层次。^⑩

前述可见，学者们围绕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形成逻辑、时代价值、弘扬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为继续深入研究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提供了借

① 刘爱军、王梦也：《新时代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1期，第16—23页。

② 刘鹏：《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与时代价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7—24页。

③ 徐佳辉：《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态结构、生成根基与实践理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2期，第145—151页。

④ 孙冲亚、高福进：《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认同功能与深化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第42—51页。

⑤ 张晓婧：《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第20—30页。

⑥ 梁军、邱雪：《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时代价值与当代建构》，《学术研究》2023年第4期，第1—7页。

⑦ “三方面”具体表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应对风险挑战”。参见廖晓衡、毛王芳：《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逻辑、时代价值与实践遵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4—26页。

⑧ 田心铭：《论历史主动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0、155页。

⑨ “四对辩证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政党与群众、国际与国内”的辩证关系。参见张士海、安瑞龙：《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与弘扬路径》，《东岳论丛》2022年第10期，第5—15、191页。

⑩ 李明奎、周子衿：《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方法——基于三个历史决议的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年第5期，第70—76页。

鉴。历史主动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精神伟力，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彰显了高深的政治智慧，具有厚重的历史性与鲜明的时代性。本文从三个基本方面即“内涵诠释”“生成路径”和“时代意蕴”出发，试图全面地探析伟大历史主动精神。首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对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进行分析，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其次，以“两个结合”为主要切入点，把历史主动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生成的一个重要命题进行阐发，厘清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路径；最后，立足于新时代，放眼“两个大局”，在历史主动与战略主动、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中阐明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意蕴。

二、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诠释

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点，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践主线，在尊重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这一伟大精神蕴含着“把握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尊重历史主体，发挥首创精神；坚定历史自信，牢记使命担当”的丰富内涵。

（一）把握历史规律，推动历史前进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规律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尊重与把握历史规律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前提。何为历史规律，怎样把握历史规律？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这一规律概而言之，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国家设施、法律、艺术及宗教观念等都建筑其上。对历史规律完整揭示的理论成果就是马克思的第一大发现——唯物史观。因而，完整、准确地认识了唯物史观，就是正确把握了历史规律。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与此同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随之变革，正是这样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唯物史观正是在深入考察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揭示了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度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暂时性，指明了人类社会最终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和历史走向。

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运用主要表现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够立足于社会基本矛盾，正确认识与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总能够找到行之有效的处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方法，从而持续推动中国社会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并强调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社会主要矛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转化。在革命低潮之时，他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要论断，鼓舞人心，并深入洞察把握中国近代历史规律，科学预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趋势。正是因为遵循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明晰了社会主要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遵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顺利完成“三大改造”，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正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就在于解决这一矛盾。虽然，在后来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又重申强调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然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将我国工作重心重新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科学解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坚持走自己的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两个大局”、深化认识“三大规律”，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观照整个人类社会，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主动精神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要致力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互动协同中，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行动自觉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二）尊重历史主体，发挥首创精神

“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直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并将历史上的少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或杰出人物的作用随意夸大，认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客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由某种客观精神所创造，例如“绝对精神”“绝对理念”；但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都掩盖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事实，两者都是阶级对立社会中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进行压迫与剥削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未来世界进行了详尽描绘和憧憬，“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①，本质上仍属于英雄史观的范畴。马克思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的主体出发，阐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创立了群众主体观，“马克思的群众主体观也可以称之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即人民群众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能动性。”^②群众主体观认为，人民群众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所进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③。其次人民群众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时间的生产劳动中创造了璀璨的优秀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后人民群众更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朝代的更迭，新旧社会制度的更替，无不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把人民群众当作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所以在其指引下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发挥首创精神，推动历史前进，与社会前进方向保持一致。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密切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将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人民浴血奋战。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我们党紧密团结人民群众，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成功找到打破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发扬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所具有的历史主动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中，虽有曲折，但在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力推动下，我们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伟大成就与党带领人民群众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不可分离；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意愿，最终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与发扬群众史观，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断，强调“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⑤。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与发扬人民群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1页。

② 刘化军：《论马克思群众主体观》，《学术探索》2014年第6期，第42—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63页。

的首创精神，我们成功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新时代接续辉煌。

（三）坚定历史自信，践行使命担当

历史自信是历史主体对于自身存在及自身经历的充分肯定与高度认同，历史自信贯穿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不断激励历史主体前进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新伟业的重要信念支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我们是否能继续交出优异答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历史自信。”^①

历史自信与“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统一于党的伟大奋斗史中。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党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成功运用于中国实践，顺应历史潮流，尊重广大人民群众意愿，成功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愈加坚定；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接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理论自信愈加坚定；我们党坚持不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推动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制度自信愈加坚定；我们党坚持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弘扬红色革命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文化自信愈加坚定。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正是我们党百年来始终坚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历史自信弥笃坚定，所以“四个自信”愈加坚定。当前，迈向新征程，只有坚定历史自信，才能在世界发展大潮中以更加积极主动的精神面貌开创未来。

践行使命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其根本目的在于践行自身的初心与使命，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使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救亡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中国共产党于危难之中成立，从成立之初就时刻铭记自身所肩负的使命，从而一往无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起属于人民自己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又独立自主地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道路，带领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中，顺利建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带领人民积极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确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始终肩扛使命担当，以自信昂扬的精神状态把握历史主动，以铿锵有力之声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中国之问、人民之问，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正阔步迈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三、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要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必须做到“两个结合”，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历史主动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诞生的重要理念，其生成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高度契合。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和发展，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植继承，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545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斗成就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变革与革新的统一。

(一) 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①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根本理论前提就在于有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也即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觉运用并进而丰富发展过程中才有了历史主动精神,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顺应历史发展、适应时代变化,接续开创革命建设改革发展新局面。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在敲开近代中国大门的同时,使中国人民陷入了危难之中——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岌岌可危。自此,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成为人们的美好梦想。在落后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与西方列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中国人民逐渐丧失主动,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一直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一直未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凄惨境遇,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炮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照耀到了中国,促进了广大人民觉醒,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顺势成立,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好的真理、“民族解放的最好武器”,中国革命才由被动逐渐变为主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与任务等问题的基础上,准确预判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形势和规律,回答了事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此指引下,中国革命的主动权被牢牢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革命胜利后,我们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之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上述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催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持续推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紧跟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在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自觉运用和发展中,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如何持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乘风破浪成功赶上了世界发展的大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国的鲜明表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新飞跃。在其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轮的航向愈加笃定,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主动性日益增强,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愈加坚定。“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③,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史中,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前进步伐,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的世界观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因而能够紧跟历史潮流、掌握历史主动、铸就历史主动精神。

(二) 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植继承

“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29页。

独特优势。”^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特质，是中华民族“根脉”，是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文化基因。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浸润中，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才变得愈来愈强大，愈来愈富有历史创造性，愈来愈能把握历史主动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昭示了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是人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蕴含着国家的根基和执政之本在于人民，只有作为国家根基和执政之本的人民稳固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八个字表明，治国之基、执政之本在于人民，要使治国有序，必须尊民、爱民、为民，民心稳固，国家才能安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彰显了先人的政治智慧和执政理念，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发展这一理念的基础上，继承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大力践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积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动创造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告诉我们，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关乎国家存亡。国家的兴盛、灭亡，关乎着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应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助推社会发展。在国家的兴衰存亡上，每一个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中国共产党深谙这一道理，自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勇于担当历史重任，广泛发动并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克服艰难困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挥所应具有的精神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指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同时做人也应该像天一样坚强有力；大地辽阔，孕育万物，做人应该像大地一样胸怀宽阔，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极奋发的精神状态和胸怀天下的远大抱负，而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奋发图强，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奋斗百年、开创中华民族发展史辉煌史诗的同时，胸怀天下，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大抱负，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又“为人类谋发展、为世界谋大同”，这正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理念的深刻阐释和继承弘扬。

（三）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源于对百年大党成就和经验的全面总结

毛泽东同志强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② 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在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分别总结和概括了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教训，形成了三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历史决议文件，即三个“历史决议”。适时对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总结，既是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生成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战胜利前夕，我们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决议自开篇就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随后从多个方面系统批判了左倾、右倾的错误思想路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全党思想，团结了全党，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随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对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二年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进行了总结，这就有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决议对“文化大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第4—1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9页。

革命”进行了科学定性,对毛泽东同志做出了全面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做出了科学界定和充分肯定,强调不论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的历史主动精神,号召“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①。《决议》开篇强调党百年奋斗以来取得了“四个伟大成就”,随即从十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十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②的具体体现进行全面概括,之后对百年奋斗所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最后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新胜利、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奋斗。综上所述,三个历史决议既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历史主动对经验成就进行总结的理论成果,又表明了党的历史主动来自何处,更坚定和激励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主动奋进的信念和信心。

四、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意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历史主动精神作为社会观念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的重要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主动精神对社会发展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历史主动精神的发扬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代意蕴愈加凸显。

(一)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把握“两个大局”激发动能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研判世界大势和我国所处的新的时代方位,强调要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战略全局。当今时代,“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作用。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以后所呈现出的两大社会阵营对立的“冷战”格局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收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乘机主导全球;与此同时,国际力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全球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迅速发展,随着“金砖国家”兴起、“上合组织”成立等重大事件的出现,世界经济版图逐渐发生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仍然在加速向前,全球力量对比呈现出“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尤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发展迅速,取得了卓越成就,自2010年以来持续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成功开启复兴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声音的传播力、穿透力愈来愈强劲,中国故事的感染力、影响力愈来愈显著,中国智慧和方案的认同力、共鸣力愈来愈明显。随着俄乌、巴以之间矛盾冲突加剧等一系列全球性事件的发生,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面临新挑战,世界形势仍然严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错综复杂。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我国经过长时间“量的积累”,在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已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又要实现新的“质的飞跃”,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这两个15年的现代化布局就是我们的复兴战略全局。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但目前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这一发展现实离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7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4页。

许还有不小差距；同时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社会发展形势复杂多变，各种“黑犀牛”“灰天鹅”事件随时可能爆发，在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实现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毋庸置疑，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创造力。如此，才能成功应对前进路上的“风高浪急”甚或“惊涛核浪”，从而实现“变局”与“全局”的良性互动，使百年“变局”可控，复兴“全局”可期。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以更加自信与昂扬的状态，把握历史主动，运用大历史观，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之大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适时变革上层建筑，加强顶层设计，牢牢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与主导权，逐步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报告中所擘画的宏伟蓝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另一方面，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胸怀天下的胸襟，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倡导构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

（二）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站稳人民立场指明航向

历史主动精神说到底中国共产党人以宽阔胸怀、雄才睿智、远大谋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创造的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作用的充分展现，最终都离不开人民的主体力量。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站稳人民立场指明了航向，即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立场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立场问题的实质，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站在哪一边、以什么为立足点的问题”。^①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这一边，其根本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人民立场，他指出，与过去由少数人发动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立场的价值指向愈加彰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③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解答了历史主动精神的主体是谁以及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了谁、依靠谁等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将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从“天国”拉回到“人间”，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正确解答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主体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谨遵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自成立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从“为人民服务”到“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前进时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将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铭记于心、践行到底，时刻贯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④这一根本遵循。

当前，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指向就是要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适时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党在发挥自身所具有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立场始终如一，即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促进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① 田心铭：《论坚持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第1—13、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第554页。

④ 习近平：《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2023年第13期，第4—16页。

（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开展自我革命增添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分别登场了诸多政党，他们都为救国救民进行了不断探索，但唯有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继而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质变式飞跃。其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自我革命实践实现对自身的改造。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由此可见，历史主动精神既是我们党在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时的精神力量，也是我们党在变革社会的同时更加自觉主动改造自身的精神力量——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征与鲜明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近代中国形形色色众多政党中能够脱颖而出、屹立不倒、持续发展壮大的又一答案。

历史主动精神与自我革命精神在形式上高度一致、在内容上高度契合，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辩证统一。一方面，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涵养自我革命精神、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这既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内在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扬与贯彻历史主动精神的现实路径。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诸多挑战与困难，只有以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为自我革命增添动力，才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从而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只有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②，唯有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状态，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以自我革命时刻净化与提升自己、不断增强斗争本领、牢记初心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向前，但我们党仍然面临着“四种危险”和“四大考验”，需要在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基础上继续以自我革命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只有这样，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党才能够始终保持领导地位。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③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植继承和发展，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与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作用的生动写照，是不断增强历史自信、铭记历史使命的深刻体现，充分展现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状态。历史和现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唯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才能不断战胜和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实现新飞跃，才能运筹帷幄“两个大局”、取得新进展；唯有以历史主动把握战略主动，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伟大变革，始终坚守与站稳人民立场，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伟业。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0页。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2年1月1日，第1版。

③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第4—7页。

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实践经验、问题和策略

——基于广东省 A、B、C 三市的调查分析

郑 维，肖海艳

摘 要：新时代以来，包括统战部门在内的各级各部门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直面互联网统战工作带来的挑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对网络统战工作进行实践探索。总的看来，统战部门探索网络统战工作的步伐加快，网络统战对象的人心和力量被广泛凝聚，网络统战成为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的抓手。但网络统战工作格局离时代之需、人民之需还有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网络统战工作功能定位不清晰，网络统战工作共治机制不健全，网络统战工作队伍力量不强大。持续推动网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探求互联网发展规律、网络统战对象活动规律和网络统战方式运用规律，在落实网络统战工作责任制、打造网络统战综合治理共同体、全力吸纳网络统战人才和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努力。

关键词：网络空间；统一战线；新时代；协同共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15-09

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①。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推动网络统战工作思维、内容和方式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统战工作，要求“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②。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要顺应互联网发展潮流，就是要善于做好“面对面”和“键对键”工作，通过线上线下良性互动凝聚人心。为深入探寻网络统战工作现状，课题组选取广东省 A、B、C 三个市作为调研地点。A 市是广东省下辖的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超大城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在国内有多个“第一”称号。A 市的互联网企业保有量、互联网使用率和影响力在全国首屈一指，是“最互联网”城市，拥有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网络空间统一战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1VMZ008）。

作者简介：郑维，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空间统一战线；肖海艳，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网络空间统一战线。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4 年 3 月 22 日，<https://www3.cnnic.cn/n4/2024/0321/c208-10962.html>，2024 年 3 月 23 日。

②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学习中心组：《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年，第 5 页。

天独厚的网络统战优势和较为前卫的网络统战工作方法。B市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外向型经济和较为自主的地方权力相互叠加,为网络统战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有利的政治条件。C市率先实现“数字乡村”全域覆盖,“数字乡村”智慧平台为农村网络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C市是网络统战先天条件缺乏地区由弱到强、追赶跨越的先进典范。课题组在广东省A、B、C三市开展座谈、访谈,发放6200余份网络调查问卷,总结网络统战成就,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优化策略。

一、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成就

2005年,中央统战部首次提出“网络统战”概念,要求广大统战干部积极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善用新媒体开展工作^①。经过各级统战部门近20年努力,网络统战工作内涵不断丰富,成效显著。

(一) 统战部门探索网络统战工作的步伐加快

近年来,各级统战部门紧随互联网发展潮流,把握网络时代带来的统战机遇,将独立自主和协作配合结合起来,加快网络统战探索步伐。一是统战部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各级统战部门充分领会上级关于深入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相关要求、政策意图,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做好网络统战工作。比如,A市立足互联网企业集中、网民数量超过1700万人等实际,利用“最互联网”城市优势,探索网络人士群体、网络空间阵地和网络技术运用方面的网络统战立体推进模式;C市狠抓网络思想政治引领,加强与海外统战对象的沟通联络,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各级统战部门一致认为网络统战已经成为统战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并因地制宜做好网络统战工作。二是统战部门牵头抓总的网络统战工作格局初步形成。统战部门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中认真把握我国党政机关的“条块关系”,纵向上实现了中央、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联动,横向上构建起了以统战部门为主体,宣传、网信、教育、工信等部门全力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初步形成网络统战“条块联动”大格局。比如,A市制定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各部门网络统战工作职责分工;B市强化市、县、乡三级统战工作责任落实,将网络统战实绩考核纳入年终考核指标范畴。

(二) 网络统战对象的人心和力量被广泛凝聚

各级统战部门把准网络空间中网民群体的动态变化特征,将不断壮大的网络统战对象纳入工作范围,最大限度争取人心、壮大力量。一是网络人士作用发挥得更加明显。各级统战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探索创新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支持他们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发挥正能量”^②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以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为代表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引导、凝聚政治共识,是做好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充分发挥正能量的中心环节^③,各级统战部门通过新联会网络人士分会等社会团体,与网络人士联谊交友,开展政治引领工作,引导其发挥正面作用。比如,A市聚焦网络人士集中于互联网企业的现状,聚集起2500多人的网络人士骨干队伍,打造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园区品牌,让网络人士深度参与舆论监督、城市宣传等重点工作,形成强大辐射;C市通过网络文化协会凝聚网络人士,畅通线上、线下即

^① 刘凌、邢若宸、许兰:《新媒体人,咱们做朋友吧——“网络统战”工作记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5月29日,第10版。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问答》,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87页。

^③ 张献生:《发挥网络人士的正能量》,《人民政协报》2019年12月26日,第3版。

时沟通渠道，引导他们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重大舆情处置、社情民意传达等工作，并将其中的先进典型发展为“两代表一委员”。二是网民群体认同程度更加强烈。各级统战部门肩负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重任，通过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赢得了广大网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问卷调查显示，“非常积极”和“积极”参与网络话题讨论的网民分别为44.7%、32.5%，并且有97.7%的受访者表示在网络空间活动也要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体现了网民群体活动的广泛性和有序性。有88.5%的受访者主动浏览网络空间中关于统战的内容，有92.7%的受访者认为，网络统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网络空间广交朋友、巩固执政地位的有力方式。以上数据证明，网络统战工作效果显著，网民群体的“五个认同”程度较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互联网时代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

（三）网络统战成为打造清朗网络空间的抓手

各级统战部门和宣传、网信等部门将网络统战作为营造良好网络生态、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有效手段，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一是将网络统战宣传工作作为网络统战的“重头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①。各级统战部门纷纷瞄准网络空间信息加速传播的机遇，联合宣传、网信部门联合开展统战宣传工作，尤其是通过各类官方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媒体平台向统战对象开展网络传播，让其获取政策资讯、官方工作动态，推介文化旅游资源，全面增强网络空间中统战对象的认同感，调动他们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热情，形成真正的“大团结、大联合”。比如，A市在市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统战宣传专项工作组，建立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共同牵头的统战宣传工作联席制度，市委统战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粉丝量近40万，微信传播指数长期位列全国统战系统公众号第一名；C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利用网络渠道在海外华文媒体推出大量报道和文艺晚会直播，覆盖28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万以上海外受众。二是将统战领域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作为网络统战的“防火墙”。各级统战部门意识到网络空间“众声喧哗”，统战工作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剧增，第一时间发现和处置网络空间的统战领域风险成为网络统战工作的“兜底性”任务。比如，A市采取“快准稳”工作法迅速有效处置有关涉宗教网络舆论事件，果断平息了网络不良舆论，加强了群众对宗教政策的正确认识；B市统战、网信、公安、文旅等部门深入开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主体清理整顿工作，有力打击宗教领域网络渗透等非法活动。统战部门在化解统战领域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方面初步探索出“1+1+N”工作模式，即由统战和宣传（网信）部门牵头，其他部门按照网络统战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对号入座”，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开展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

二、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的主要问题

目前，网络统战工作格局仍难以充分适应重要且艰巨的网络统战任务，具体表现在功能定位、共治机制、队伍力量和方式方法四个方面，网络统战工作离时代之需、人民之需还有一定差距。

（一）网络统战工作功能定位不清晰

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由此衍生的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网络统战对象与日俱增，并且具有不同的群像特征，要求网络统战“跟得上”，甚至“超前预判”，但目前依然有部分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对网络统战知之甚少、行动缓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5—106页。

一是网络统战工作意识不强烈。互联网时代,话语和社会动员意义上的权力不再集中于传统的官方机构身上,如何与互联网企业、网民群体平等对话、友好协商,增强政治吸纳能力,成为网络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部分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对网络统战的本质意义、任务要点和具体做法理解不深不透,工作思维仍然停留在传统统战工作层面。尤其是部分偏远地区和基层的统战部门、统战干部片面认为网络统战应主要由发达地区和沿海城市承担,对互联网的应用领域广泛化特征把握不足。其次,一些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认为互联网“很敏感”,统战工作不适合“上网”,存在不敢担当、畏惧退缩心理,本质上是政绩观扭曲,不敢作为、不善作为的体现,造成了对网络统战工作“置之不理、爱理不理”的不利局面,使得网络统战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成为“表态高、落实差”的工作。最后,少许统战部门和统战干部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领悟不到位、跟进不及时,存在“一学了之”的现象,以简单的传达贯彻会、安排部署会代替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和扭住不放的跟踪问效,对互联网生态和网络统战对象的深入认识不够。比如,将网络统战对象局限于网络人士,将网络大V等同于新阶人士,仅仅将网络看成统战工作的工具,错误地将网络统战视为网络宣传。

二是网络统战工作标准不明确。目前,中央统战部还没有以“网络统战工作”名义召开全国性会议,网络统战工作要求较为笼统,缺乏权威指导和系统全面的规范要求。首先,网络统战的定义模糊。《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一书认为,网络统战是“以网络为载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传统与现代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等特点的统战工作”^①。该定义仅仅指出了网络统战工作“是什么”,而对“干什么”和“怎么干”缺乏明确界定,造成地方统战部门的网络统战工作无章可循。其次,存在网络统战的方向偏移的情况。一些地方按照网络宣传工作来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统战和宣传、网信部门在互联网领域推出的宣传内容没有从统战工作出发,把统战工作等同于宣传工作,采取“大水漫灌”式的网络宣传手段,政治性过于显化、千篇一律、吸引力差,“宣而不统”。最后,网络统战的指导力度不足。地方统战部门发展出“网络+统战”和“统战+网络”两种网络统战工作模式,或将网络技术作为统战工作的新方法,或将网络空间作为统战工作的新场域,也有将网民群体作为网络统战的新对象的做法。这些做法缺乏统筹指导,因而基层普遍反映需要上级出台网络统战政策文件,加强具体指导。

三是网络统战工作热度不一致。受综合因素影响,不同层级、地区的网络统战工作各有千秋,表现出“冷热不均”特征。首先是网络统战的“上热下冷”格局。调研发现,上级统战部门对网络统战的理解程度比县、乡两级更深,网络统战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投入也更大,而县、乡两级开展网络统战的主动性、积极性更低,习惯于被动听从上级统战部门工作安排,工作的创新点、亮点不多。部分地方的县级党委统战部部长和乡镇、街道统战委员甚至身兼多职,精力过度被分散,使得网络统战陷入越往基层越被忽视、越往下级越薄弱的尴尬处境。其次是网络统战的“东热西冷”格局。东部地区依靠独有优势迅速打开网络统战局面,而西部地区受制于技术、经济、人才等因素,网络统战的步伐则较慢。比如,A市在全国率先搭建网络统战工作平台载体——“智慧统战”信息化系统,实现了数字技术与网络统战的深度融合,为统战工作提供了数据汇聚共享、决策辅助参考和业务流程再造;而西部地区除重庆市、贵州省外,大部分省域还未从“面对面”的传统统战充分创新拓展到“键对键”的网络统战,甚至以网络宣传代替网络统战。最后是网络统战的“表热内冷”格局。部分地区统战部门的网络统战工作浮于表面,将网络统战

^①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工作简单理解为网络宣传、对网络代表人士的走访慰问，热衷于通过网络媒体搞地方特色推介，工作精力主要集中于网络媒介、经验材料等方面，“包装”和“场面”思维严重。实际上，部分地区统战部门尚未完全真正树立网络统战思维，对统战工作如何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认识程度不深，出台的网络统战政策一般是照搬上级和发达地区做法，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理念、方法和成效均较为缺乏。

（二）网络统战工作共治机制不健全

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统战部门内外部职能、机构设置不甚合理，协调配合难度大，各自为政、敷衍塞责现象有之。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齐抓共管格局不够牢固，难以汇聚网络统战工作合力。

一是网络统战工作的内部运行机制尚未全面理顺。目前，大部分统战部门的网络统战工作由其他内设机构或临时工作小组承担，较少专门设置网络统战内设机构。首先，大部分统战部门将网络统战工作分摊给关联性内设机构。比如，将网络统战工作交由新阶层处（科）负责，也有部分地方党委统战部认为网络统战主要是对非公经济领域的网络人士开展统战工作，便要求经济处（科）负责此项工作，使得网络统战工作处于统战部某一内设机构的“次要地位”，而这些内设机构忙于应付自身的“主营业务”，常常忽视网络统战工作。其次，一些统战部门在内部组建网络统战工作小组实现网络统战工作的“半专职化”。部分统战部门为凸显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兼顾工作力量配备的均衡性，在统战部门内部成立网络统战工作小组，或配备专职干部，或安排其他内设机构干部兼职从事网络统战工作，因而这些干部往往身兼多职、分身乏术。最后，网络统战工作的内部协调机制不健全。如前所述，由于各地将网络统战工作置于不同内设机构和非常设机构之中，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网络统战工作布局无法有效实现纵向上的一致性，不利于提高上级统战部门对下级统战部门网络统战工作的指导力。

二是网络统战工作的协同共治格局作用发挥不足。部分地区和单位对网络统战工作“避而远之”，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使得网络统战工作进展缓慢。首先，网络统战工作未被纳入“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之中，目标绩效考核困难。网络统战工作没有得到机构编制部门的重视，未能根据网络统战属性重新确定统战部门“三定方案”，在科层制的党政体制内开展网络统战工作，难以得到同级部门和下级单位的支持。其次，基层单位“等靠要”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网络统战的基层基础不扎实。一些县（区）级统战、宣传、网信、大数据等在内的部门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在内的基层单位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过程中行动迟缓，没有上级文件就不开展、慢开展，其他地区没有搞过的就不搞，等文件、靠政策、要资金的现象依然存在。调研发现，网络统战工作的特色亮点主要集中在省、市两级，县（区）、乡镇（街道）两级循规蹈矩、被动执行的多，先行先试、主动创新的少。最后，同级部门对统战部门牵头的网络统战工作配合不紧密，部门壁垒还未打破。有些单位为了“避责”和“不揽事”，消极配合统战部门牵头召开的联席会议和请求支持事项。调研中部分市、县（区）级统战部门反映，其他单位习惯于被动应付网络统战工作，甚至有不理睬的现象。部门间的协作壁垒、数据壁垒和政策壁垒成为网络统战的桎梏，造成了统战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

（三）网络统战工作队伍力量不强

网络统战对象主要是在网络空间活动的人，网络统战工作也应高度重视人的作用。但目前的网络统战工作队伍与数量庞大的统战对象、愈加复杂的统战形势不匹配，网络统战队伍建设滞后于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一是分类分层的网络统战干部人才存量增量不足。网络统战集网络空间、网民群体和网络技

术等于一体,网络统战干部人才单一的行政思维已不再适应新要求。一方面,统战部门自身干部能力水平亟须提高。调研发现,统战部门的干部配备数量较少,难以适应繁重的统战工作需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同级党委、政府直属机关相比,统战部门的编制数量处于中下水平,导致统战部门人少事多,很难分配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网络统战工作,尤其是部分县(区)级统战部门在编干部不到10人,工作力量薄弱;第二,与上级统战部门相比,下级统战部门的内设机构和在编干部较少,往往是一个内设机构对接上级统战部门多个内设机构,且存在1名统战干部身兼多职的现象,致使网络统战工作“上热下冷”。另一方面,涉网络统战工作的有关单位干部的状态有待改善。宣传、网信、工信、大数据、教育、文旅等单位的干部,以及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干部,虽未直接在统战部门工作,但都从事着不同内容的网络统战工作。部分干部持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错误思想,对网络统战工作职责的认识不到位,应付了事、拖沓扯皮,未深入研究和创新开展网络统战工作。

二是将网络统战对象转化为网络统战力量的效能不高。网络统战对象遍布全网,且以各种形式影响网上、网下场域,但目前统战部门对他们的识别和转化程度较低。首先,精准识别网络统战对象的方法不多。当前,统战部门一般按照“流量为王”标准识别网络统战对象,单纯将点赞量、评论量、转发量和粉丝量作为网络统战对象对网络生态影响能力强弱的依据,最终造成主要将网络大V认定为统战对象的不利局面。实际上,网络统战对象不仅是话题热度制造者、参与者,更有能将网民群体的线上情绪转化为线下行动者。统战部门将思维活跃、偏好各异的统战对象聚集起来的办法还不多。其次,团结引领网络统战对象发挥作用力度不够。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统战部门未能发动有潜质的网络评论员、主持人等人群在网络空间以诙谐幽默、吸睛共情方式的发布原创作品,丧失了网络统战的主动权和积极性。最后,团结网络统战对象的方法单一。统战部门一般以召开座谈会、慰问关怀等方式与具有代表性的网络统战对象交流,政治吸纳成为较为高级的争取方式,但这些方式既不能为网络统战对象带来暴涨的粉丝流量,更无法给他们带来较为丰厚的经济收益,吸引力不强。

三、推动网络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策略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①。做好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要深入探求互联网发展规律、网络统战对象活动规律和网络统战方式运用规律,在明确目标、综合治理和要素保障三个方面久久为功。

(一) 明确目标:落实网络统战工作责任制

网络统战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团结党外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②。要坚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来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统战工作的“最大增量”。

第一,增强主体性力量的网络统战工作意识。调研发现,一些县、市级统战部部长作为同级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61页。

市委常委，身兼多职，真正花在统战工作上的精力有限，不利于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反映出部分领导干部对网络统战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要强化统战部部长专职抓好网络统战工作的责任分工，减少其分管领域内的其他工作，还要对其他各级领导干部传导网络统战工作压力，鲜明抓好网络统战是本职、抓不好网络统战是失职的政绩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①。要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相结合，转变统战干部轻视互联网和忌憚互联网的思想观念，正视互联网给统战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教育引导统战干部立足自身单位和岗位实际，从各方面做好网络统战工作。统战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在网络空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网络统战工作提供强大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动员中华儿女和国际友人投身网络统战事业。

第二，制定实施网络统战标准，指导地方开展工作。要开展地方网络统战标准化试点。中央统战部要和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共同牵头，在经济和互联网发展态势较好，且网络统战工作成绩较为突出的地方选取网络统战标准化试点单位，鼓励先行先试、自主探索，形成网络统战标准化试点成果。网络统战标准化试点单位要构建起包括网络信息技术、网络统战对象和网络空间特征等在内的网络统战生态系统模型，为中央统战部制定网络统战标准化规范提供翔实依据。要迅速制定网络统战标准化规范。地方试点结束后，中央统战部要综合试点成果，通盘考虑全国推行网络统战标准化的前景和困难，按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社会团体等行业系统类型分类制定实施网络统战标准化规范，力求网络统战队伍建设标准化、网络统战运行机制标准化、网络统战战场域建设标准化、网络统战工作流程标准化、网络统战活动载体标准化、网络统战工作制度标准化、网络统战考核体系标准化，实现网络统战工作基础扎实、机制完善、管理规范、标准统一、运转有序、作用凸显。

第三，创新网络统战工作形式载体，凝聚人心力量。网络空间实现了沟通“零距离”和“零时差”，网络技术给网络统战工作赋予了无限能量，这有利于实现网络统战工作形式载体多样化。要将网络统战宣传和网络空间互动结合起来，在宣传题材、宣传方式、宣传时效等方面精挑细磨，改变过去姿态高、题材旧、单向度和政治色彩浓厚的说教模式，根据网络统战对象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网络宣传工作。要推动官方媒体宣传方式转型，戒除刻板、陈旧、乏味的宣传手段，借鉴商业媒体赢得网络统战对象支持的一切有益做法，鼓励官方媒体和商业媒体开展网络宣传合作，一起“引流”和“涨粉”，增强网络统战对象“五个认同”。要在网络产业上真正为民谋利，充分认识到互联网经济在贡献税收和促进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毫不动摇支持壮大互联网经济，实现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加速融合，让网络统战对象享受网络社会福祉。要推动产业互联网深入发展，加快互联网与三大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数智经济、提供数智服务、形成数智产业，让人民群众共享网络产业发展成果，形成网络统战与人民最核心的经济利益互嵌共融格局。

（二）协同共治：打造网络统战综合治理共同体

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领域、各行业，决定了网络统战必须多部门参与。网络统战治理主体要各司其职、默契配合，对全体网民形成感召，构建协同治理体系。

第一，铸就新时代统战铁军，做到“自身硬”。统战部门在网络统战工作中承担主要职能职责，要通过自身建设彰显“统”的能力、“战”的水平。首先，要配齐配强网络统战干部。要加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9页。

强与机构编制部门的沟通配合,争取适当增加行政、事业编制,为招录工作人员奠定基础。统战部门在招录、遴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干部时,要根据网络统战需要设置报考条件,确保新进人员具有网络安全、统一战线学等学科知识背景和工作经历,第一时间熟悉网络统战工作,实现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要经常开展网络统战业务培训和“大比武”,确保网络统战干部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双提升,营造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网络统战工作氛围。其次,要设置网络统战内设机构。各级统战部门要在取得同级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设置网络统战内设机构,专门负责网络统战工作,契合网络统战的重要性。要为网络统战内设机构配足工作人员,同时做好对上、对下和对外工作,确保网络统战工作有专门机构负责、专门人员经办,凸显网络统战的专业性。上级统战部门要加强对下级统战部门网络统战内设机构工作的业务指导,开展网络统战内设机构设置情况专项检查,督促下级统战部门加快设置网络统战内设机构,理顺网络统战内设机构运行机制,确保政令畅通,体现网络统战的连贯性。最后,要创造网络统战优秀业绩。各级统战部门在网络统战工作中要迅速从摸索状态转向开拓姿态,以等不起、耗不起的紧迫感开展好网络统战工作,一方面要严格执行上级文件政策,另一方面要敢于先闯先试,彰显网络统战的主动性。要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对网络统战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依靠统战部门自身努力,实现网络统战工作有形、有感、有效,创造网络统战一流业绩。

第二,构建条块联动新格局,实现“齐动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①要实现网络统战格局与国家治理体系相适应,确保网络统战工作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罅隙,构筑网络统战坚强堡垒。各级各地方“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②,破除本位主义,立足网络统战的跨界现实,开创联合治理、网络飞地远程治理等新型网络统战联动模式,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要建立从中央到乡镇(街道)的五级属地治理体系,明确界定不同层级党委、统战部门的网络统战属地责任,强化对地方党组织“一把手”任期内的网络统战实绩考核,确保网络统战工作得到高位推动、领导重视。开发区、高新区等实行特殊管理体制的地方更要充分利用网络统战资源,因地制宜发挥党工委和党群工作部门的作用,树立网络统战标杆。统战部门要建立网络统战工作情况通报机制,定期、不定期向同级和下级党委通报网络统战成员单位工作开展情况,并进行跟踪问效、差异考核,以增强各地方党组织开展好网络统战工作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健全网络统战部门联席机制,将现有的网络统战部门联席会议机制升格为部门联席机制,从单纯的“会议联席”迈向“全面联席”,实现政策联席制定、会议联席召开、工作联席开展和绩效联席考核,将部门党(工)委领导优势转化为网络统战协同治理优势。统战部门作为网络统战部门联席机制的牵头单位,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据实动态调整联席成员单位,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加大对其他部门的考核力度;其他部门则要将网络统战作为新时代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牢,全力配合统战部门工作。

第三,提高全体网民参与度,达成“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网络人士往往能左右互联网的议题,能量不可小觑……要把这些人中的代表性人士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引导其政治观点,增进其政治认同”^③。要深刻认识到网络人士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7页。

② 中央宣传部:《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9月1日,第2版。

③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5页。

是当前网络统战对象的主要代表群体，掌握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背景和利益诉求，以民主协商、贴心服务和培养使用为主要方式，引导网络人士为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奋斗。要从小掌握网络人士的数量分布、结构特点和组织参与情况，瞄准网络人士年轻化、圈层化趋势，动态更新政策，引导网络人士助力网络统战。要引导“意见领袖”参与网络统战工作。要根据粉丝数量、话题热度和影响能力精准识别“意见领袖”，采取符合网络“意见领袖”行事风格的方式对其开展正向引导和政策支持，满足他们合理合法的多元诉求，动员网络“意见领袖”争取网络民心，提高网络社会动员能力。要摸清海外网络统战对象底数，掌握海外网络统战环境的特殊之处，尤其是要利用互联网技术迅速与海外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搭上线”，形成线上、线下良性互动的局面。

（三）保障有效：全力吸纳网络统战人才和社会力量

网络统战工作对人才、资金和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要素的全方位保障能够有效纾解当前网络统战工作进展缓慢的困难，确保网络统战工作既有治理框架有坚实支撑基础，顺利实现网络统战目标。

一方面，聚天下英才为网络统战所用。要着力培育网络统战人才。统战部门要加强与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合作，在高校开设与网络统战有关的本、硕、博专业，扩大招生规模，实施双学位、联培等制度，提高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水平，培养造就更多网络统战人才；同时，要利用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科研院所和头部互联网企业资源，开展不同类别、不同批次的网络统战人才集训，壮大存量人才的网络统战力量。要不拘一格引进网络统战人才。要以市场化思维开展网络统战柔性引才工作，积极采取项目合作、服务外包、技术入股、人才租赁等办法，让“体制外”网络统战人才成为满足网络统战工作需求的有效供给，启动更加科学的“人才、项目、资金、技术”打包引进方式，发挥人才市场、猎头公司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拼抢网络统战人才资源，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要周到细致服务网络统战人才。要建立以品德、能力、业绩和贡献为导向的差异化评价机制，给予网络统战人才经济待遇、政治前途、荣誉名誉和后勤保障，对做出重大贡献的网络统战人才给予更多支持，用好人才评“价指挥棒”。

另一方面，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网络统战事业。要明确网络统战的目标任务是最大限度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统战对象，实现线上统战的线下统战的紧密结合，必须健全工作机制，坚持社会化和市场化导向，全面吸引和利用社会力量。要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盈利需要，将网络统战工作深度嵌入经济活动中，通过“BOT”（建设—经营—转让）和“PPP”（公私合营）等形式吸纳头部互联网企业和其他有关企业参与网络统战工作，发挥市场主体在网络统战事业中的管理、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发挥网络统战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人民的独特优势。要重视社会非营利机构在网络统战中的作用，广泛联系社会公益组织、社工机构和其他爱心组织深入参与网络统战事业，发动他们涉及群众广、传播速度快、以无偿服务为主等优势，扩大网络统战知晓度和参与度，进一步彰显网络统战的公益性质和普惠优势，从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团结人心和力量。要更加强调网络统战服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质特征，要求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在参与网络统战事业进程中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完善互联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贡献自身力量，并运用网络统战优势化解社会纠纷，弘扬社会正能量，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提升。

责任编辑：念兴昌

歌谣与统战：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视角下 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研究

刘 鹏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是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中央苏区的具体实践形态，其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党开展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传递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助力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彰显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效，具有丰厚的统一战线思想元素。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要汲取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智慧，明确“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紧密团结人民群众；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关键词：中央苏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红色歌谣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24-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①统一战线是党的一项长期性、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中央苏区的具体呈现，在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是党开展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其中充满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元素，是洞悉和解读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崭新视角。目前学界大多从中央苏区基本政策的角度，如土地政策^②、民族政策^③、富农政策^④等，分析中央苏区统一战线的内容与影响，但从中央苏区红色歌谣的角度来解读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研究付之阙如。因此，笔者试图基于中

基金项目：2021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危机时期的爱国主义建构研究：以《新华日报（1938—1945）》为例”（GD21CDS03）；2021年广东高校重点平台和科研项目特色创新项目（人文社科）“中国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研究”（2021WTSCX026）；2023年汕头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一般课题“潮汕红色文化资源在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的运用研究”（2023GHB158）。

作者简介：刘鹏，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22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② 李小平：《中央苏区土地改革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③ 陈夕：《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问题（1921—194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62—89页。

④ 陈君锋：《中国共产党对富农的认识历程及政策演变研究综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10—116页。

央苏区红色歌谣的视角来解读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以丰富对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研究，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提供经验启示。

一、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生成基础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主要是指在土地革命时期，由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工农联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及其中国化

中央苏区党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指导，又发展了党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加强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同盟军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认清并争取农民作为革命最广泛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党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指引，在党的二大上第一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以打倒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推翻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为统一目标，结成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民主的联合战线。^①在党的三大上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加快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步伐。党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国民党，积极响应民主联合战线方针，以推进国民革命运动。1924年1月，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功改组国民党，使其成为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正式形成标志着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在大革命时期的实践，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和经验借鉴。

（二）现实基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及中央苏区的创建

党在中央苏区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是迫于国共合作破裂后的国内严峻形势，以及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失利的现实情况所采取的必要举措，也是基于党成功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而采取的重要举措。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彻底破裂，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各方力量间的抗衡变得紧张且复杂，中国社会再一次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着手寻找新的可靠的同盟军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建立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后联合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以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原游击区斗争为基础，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也成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政权组织。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认清了民族资产阶级附和国民党新军阀的本质，采取了积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方针，而且在真正意义上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并付诸土地革命的伟大实践。由此，在中央苏区，党建立了以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为主要联合对象、以反抗封建压迫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为目的的牢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三）群众基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中央苏区党成功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得益于苏区广大农民对革命的支持和拥护。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长期的调查研究，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深入分析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大革命失败后，党转战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开展土地革命，紧密团结了广大农民。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① 农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庞大的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饱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为摆脱现有的困境，自觉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成为中国革命中的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央苏区的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在革命实践中结成了坚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央苏区开展革命的可靠力量。

二、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彰显

在中央苏区，党为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红色歌谣中融合了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元素，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崭新视角和生动载体。

（一）“可怜的民众”：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传递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导向，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穿于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生动实践。近代以来，中国的工农群众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央苏区工农群众闹革命，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最终目的是解放苏区人民群众，捍卫苏区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中央苏区，党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充分认识到工农群众是红色歌谣的重要创作者和受众，更是统一战线所必须紧密联合的革命力量。为联合广大工农群众组成广泛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党在中央苏区充分利用红色歌谣传递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表达了党和工农群众对反抗封建压迫、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迫切愿望，以强烈的情感共鸣有力地动员了广大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严密封锁下，中央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们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通过红色歌谣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夏季里，满天呀么起乌云，蒋介石，谋财那个又害命，哪个敢作声”^②，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天下主人是工啊农，如何受罪，啊，又贫又穷噢，幸福生活都无啊份啰噢”^③，这是反映了广大工农群众生活艰难困苦。“劳苦的工农，工农工农工农……政府他叛变了，政府他反动了，工农你的生活呢？你的保障呢？”^④ 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当前黑暗的国民政府无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有着清醒的认知。“可怜贫苦人哪，无衣度三冬啰唉……辛苦觉得日日饥呀，哪衣哪，呀哪呀”^⑤，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3页。

②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页。

③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63页。

④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4页。

⑤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8页。

这是广大工农群众渴望摆脱当前的贫苦生活。此外,《农民歌》《打破旧世界》《十诉妇女困苦歌》等红色歌谣,深刻地控诉了旧社会的黑暗生活和人民群众饱受苦难的根源,既是对广大工农群众艰苦生活的真实反映,更是传递出广大工农群众对摆脱旧社会、实现翻身求解放的真实夙愿。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传递了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心声,在情感层面有效地拉近了党与苏区群众的距离,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二)“工农兵联合歌”: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助力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

1.“收了谷子送军粮”:实现工农经济联盟,促成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推进经济建设工作,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的结构性限制仍未得到彻底解决。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提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要求“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①。毛泽东也指出,要努力克服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否则将会对实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造成不利影响。^②由此可见,党高度重视中央苏区经济工作,充分认识到工农群众是开展经济工作的主体和主要受益者,将工农联盟和经济工作的推进紧密结合了起来。正因如此,中央苏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进而实现了工农群众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合作,促成了工农经济联盟。这是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经济领域的有益探索。

在中央苏区,党以实际行动建立工农经济联盟来保障工农群众的基本生活,广大工农群众也通过红色歌谣唱出了他们对党的经济建设工作的支持和拥护。“每人节省一铜钱,帮助红军万万千。巩固发展根据地,工农力量大如天。”^③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衷心拥护的真实反映。“人人都在节省钱,节省钱来买公债。人人都来买公债,人人保卫苏维埃。”^④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工作的大力支持。“金钱集中本应该,革命群众认真来,全体动员加入去,快快捷捷拿出来。”^⑤这是广大工农群众主动选择支持苏维埃政府设立工农银行的真实写照。“收了(里格)谷子送(呀)送军粮呢支援(里格)红军打胜仗呢。”^⑥这是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心连心、共同携手抗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实写照。此外,《购买公债掀高潮》《革命互济会》《买公债》等红色歌谣,不仅朗朗上口,便于传诵,更是反映了中央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在经济方面采取实际行动拥护和支持工农联盟,这既有效反映和保护了工农群众的利益诉求,更在经济层面实现了对广大工农群众的团结。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传递了苏区人民拥护工农经济联盟的心声,在经济层面有效地促进了党与苏区群众的联合,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快快觉悟起来”:开展社会领域统战工作,助力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社会领域的统战工作,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指导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有效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20页。

③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8页。

④ 危仁最:《江西革命歌谣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157页。

⑤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337页。

⑥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307页。

高度重视群体统战工作。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规定苏区各级政府都要设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其任务是将妇女从旧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中解放出来,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和政权管理等工作,有效地改变了旧有的乡村面貌,提高了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妇女群体的团结和组织。此外,党成立了苏区中央儿童局,在共青团的带领下,组织了苏区儿童学习文化知识,领导了苏区儿童参加苏区建设和保卫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儿童群体的团结和组织。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广大妇女同胞得以从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投入根据地的建设和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在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领导下,苏区的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拥护革命、拥护苏维埃,他们臂戴红袖章,在组织和动员青少年反对旧社会陈规陋习、建立革命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解放苏区妇女,教育苏区儿童,实现对妇女和儿童的联合,这是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领域的有效实践。

在中央苏区,党以实际行动解放了妇女同胞,教化了苏区儿童,在社会领域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有效进步,广大工农群众也通过红色歌谣唱出了他们对党的社会性统战工作的支持和拥护。“妇女们,参加革命解痛苦……扮个武装去肩枪,杀尽那反动国民党。”^①这是鼓舞广大妇女同胞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地主和豪绅,剥削我穷人,挑拨离间破坏我团结,我们要热心,加进农会去,打破旧封建,建设新社会。”^②这是对解放妇女、培养妇女、团结妇女、组织和发动妇女等工作的广泛宣扬。“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革命战争的艰苦奋斗,我们前方后方齐努力。”^③这是对共青团紧密联系工农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此外,《红军家属拉犁耙》《妇女力量大如天》《共产儿童团歌》等红色歌谣,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中央苏区的广大妇女同胞和儿童投身于苏区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实现了对妇女和儿童的组织和团结。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传递了苏区妇女和儿童拥护共产党的心声,在社会领域有效地解放和教化了苏区妇女和儿童,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3. “穷人翻身乐融融”:开展政治领域统战工作,加强工农政治联合

在中央苏区,争取农民的支持、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而能否将农民群众从旧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使其自觉成为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是实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关键所在。由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统战措施以促成工农政治联合。一是广泛开展土地革命,使土地重新回到农民手中;二是赋予农民政治权利,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三是加强自身建设,使农民群众彻底信服。党和苏维埃政府以广大农民群众为对象,采取有效的政治性措施获得了农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和拥护,加强了工农政治联合,这是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在政治领域的积极践行。

在中央苏区,党以实际的政治性行动解放了贫苦农民,团结了农村中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众,在政治领域取得了统战工作的有效进步,广大农民群众也通过红色歌谣唱出了他们对党的政治性统战工作的支持和拥护。“石榴开花啊满树红,个将来世界都大唔同啊,土豪劣绅被打倒啊,衰衰哉,穷人翻身乐融融噢。”^④这是对穷苦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的有力号召,穷人也能翻身做主人。

①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185页。

②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189页。

③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341页。

④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42页。

“红军（里那个）发我（哎）土地证，四四方方一张纸，圆圆（里那个）巴巴（也）一（哟）颗印。”^①这是对党通过实行土地革命，颁发土地证书，从法律上规定农民享有土地，保障农民权益的真实写照。“白军士兵们，我来告诉你，你们都是工农的出身，因为受压迫，才把兵来当，想要有平等，就来当红军。”^②这是广大苏区群众对“白军”的共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劝降“白军”，甚至使其拖枪投奔红军的实际效果。此外，《土地革命歌》《穷人翻身乐融融》《白军士兵来当红军》等红色歌谣，也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苏区的农民群众甚至“白军”士兵为不受压迫，实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独立平等而勇敢地与旧制度和反动势力斗争。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传递了农民群众加强政治联合的心声，在政治领域有效地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日头一出红彤彤”：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彰显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效

在中央苏区，党成功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且积极向苏区民众传递党的思想方针和革命的宗旨，以实现对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团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属于工农兵及一切劳苦民众”，“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限制资本主义发展，要使工农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剥削”^③等，充分反映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立场，切实做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党在中央苏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苏区群众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苏区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自身的解放。为此，广大苏区群众自觉围绕在党的周围，投身于建设苏区和保卫苏区的革命实践中，以强大的群众力量有效地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在中央苏区，党通过土地革命让广大工农群众获得了土地，工农群众自觉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红色歌谣表达了他们对党的统战工作和革命事业的满意和喜爱。“土地革命把田分啰嗨，唔会错哟唉，工农个个笑盈盈咳当真。”^④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在分到土地之后唱出了心中的喜悦。“苏区格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格去办呀格公，哎呀日着格只草鞋来干革命哪，同志格，夜走格只山路打呃啊格笼。”^⑤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对党的干部作风深感满意。“我们正在准备着革命的战争，消灭这些寄生虫。为民族，为解放，劳动工农群众，大家当红军！”^⑥这是广大工农群众在获得土地、翻身做主人之后，主动团结在党和红军队伍身边。“打狼要有好猎枪，斧头全靠有好钢，打击敌人要经费，全靠工农来相帮。帮助红军理应该，工农兄弟站出来，红军为我打天下，我为红军买公债。”^⑦这是对中央苏区党领导工农群众形成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把苏区民众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苏区人民也主动参与到党的革命事业中，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扩红指令和号召，自愿倾尽所有支援苏区革命，以实际行动投入中央苏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中。红色歌谣的广泛传唱，既唱出了苏区群众拥党护党爱党、愿意与党携手革命的心声，又在更大范围上鼓舞了更多的工农群众参与到党的统战事业中。党在中央苏区通过红色歌谣的形式彰显了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效，在群众层面有效地团结了广大苏区民众，为巩固和发展党的

①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39页。

②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26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47—650页。

④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46页。

⑤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59页。

⑥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210页。

⑦ 姚荣滔、肖远明：《苏区兴国山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智慧汲取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中对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宣传和书写是党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凝结了党推进统战工作的思想智慧,对于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明确“共产党领导真正确”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党在百年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得出的经验。统一战线是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新时代取得事业成功的法宝,更是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中央苏区,党以坚强有力的领导推进土地革命,反抗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统治,让广大工农群众获得了土地,保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使广大苏区群众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具体实践中锤炼了作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正如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共产党领导真正确》所唱:“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确,红军打仗真不错,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我们真快乐。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哥,我们胜利有把握,向前杀敌莫错过,把我们红旗插遍全中国。”^① 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必须要明确“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坚定不移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画出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固守圆心是根本。^② 中国共产党即统一战线之圆心,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即根本。只有毫不动摇地固守党的正确领导这一圆心,才能以坚强有力的主心骨铸就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

(二) 坚持“工农革命一条心”

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显著特征,也是在党的百年艰苦奋斗的实践中所得出的历史经验。统一战线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大团结大联合。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工农群众是主要的联合和团结对象。在中央苏区,党坚决推进土地革命,根据农民阶级贫、中、富不同特点,有效探索出了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的革命发展道路,苏区人民获得了土地,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保障,苏区人民主动选择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这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得益于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正如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工农革命一条心》所唱:“工农革命万众一条心,离心离德就是反革命,我们大家心连心,团结起来攥得紧。”^③ 人民群众是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团结和联合对象,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必须要坚持“工农革命一条心”,坚定不移地团结和联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画出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扩大共识是关键。^④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即统一战线之共识,坚持群众路线、不断满足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即关键。只有坚定不移地满足人民意

①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144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04页。

③ “中央苏区文艺丛书”编委会:《中央苏区歌曲集》,第71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04页。

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才能以源源不竭的人民力量铸就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

（三）唱响“苏区干部好作风”

党的优良作风，是推进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在党的百年艰苦奋斗的实践中形成的胜利法宝。党的优良作风是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统一战线正是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过程中逐渐巩固和发展起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带头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亲手写就《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大量著作，并始终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原则，为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提供符合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方法，用实际行动发扬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在中央苏区，党坚决执行群众路线，带领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挖井取水，切实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方方面面的问题，用实际行动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中央苏区，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听取群众的意见，用实际行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党通过在苏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扬优良作风，有效彰显了党的先进性，赢得了民心，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央苏区党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功得益于苏区干部的优良作风。正如中央苏区红色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所唱：“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提灯笼访贫农。”^① 党的优良作风是统一战线实现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条件，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必须要唱响“苏区干部好作风”，各级统战部门和干部要坚定不移地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全面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要坚持原则、讲究方法。^② 在统战工作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即做到原则和方法的统一，“固守圆心与扩大共识”的融合。只有坚定不移地在统战工作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能以强大的精神力量铸就新时代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③ 中央苏区红色歌谣作为党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的有效载体，蕴含着党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和智慧，为研究党在中央苏区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崭新视角，也为推进新时代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从党在中央苏区以红色歌谣为载体推进统战工作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思想智慧，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紧密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为卓有成效地推进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开创党的统战工作新局面、同心共圆中国梦提供强大合力。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14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57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608页。

积分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形式

——基于浙江省P市的考察

吴 昌

摘 要：如何有效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层治理鲜明的实践主题。近年来，颇受各方关注的乡村积分制治理，蕴含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不仅是乡村治理的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形式。基于浙江省P市积分制治理的考察可以发现，在乡村治理情境中，积分制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履行民主程序，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使作为主体的村民能够深入参与其中，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增进了民生福祉。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并促进乡村治理发展，有赖于政治领导机制、制度供给机制和行动参与机制等核心机制的发挥。作为一种实践探索，深化积分制治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需在党建引领作用发挥、制度效能充分释放、主体能力显著提高等方面着力优化提升。

关键词：全过程人民民主；乡村治理；积分制治理；实践形式；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32-10

基层民主的发展与基层治理的现代化相伴相生。对于中国而言，广袤的乡村始终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也一直是现代国家转型中所要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与‘有效’之间的匹配关系”^①。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深入推进，这个难题的破解有了很大的改观——乡村治理从“管理民主”转向突出“治理有效”，呈现为基层民主发展与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统一。在某种意义上，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就可视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这样的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基层民主还是乡村治理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约束和一些问题的困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最新发展，“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导引、强劲动力和重要保证”^②，也在实践中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当前，在乡村受到普遍关注的积分制治理深刻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化运用。那么，积分制治理何以解决上述“民主”与“有效”的关系匹配问题，抑或说积分制治理如何实现民主与治理的有效统一？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积分制治理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深化？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金项目：2024年度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规划课题“乡村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样态、运行机制与深化路径——基于浙江省P市积分制治理的考察”（ND24035）；2024年度杭州市党校系统社科联课题“乡村积分制治理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内在机制——以杭州市L区为例”（hdsklcg240043）。

作者简介：吴昌，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协商民主。

^① 王春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民主”与“有效”治理的匹配问题》，《社会学评论》2020年第6期，第34页。

^② 王炳权：《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第1页。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民主是一种价值追求，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探讨。西方民主的异化及其带来的迷失，也引发了人们的反思与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经提出迅速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研究者们主要集中在对其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价值优势、运行机制、实践路径等方面的探讨。

从理论层面看，如陈亚和周光耀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于中国实际并经过长期探索形成的，是历史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的中国式民主^①；孔庚认为，具有广泛性、完整性、真实性、有效性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出对人民民主、国家治理、国际关系等层面的价值追求^②；胡玉鸿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国家制度、人民地位还是权利保障和诉求表达，都离不开法治机制的保障^③；黄毅峰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完善发展需要从政治领导、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参与能力等多方面推进。从实践层面看，研究者围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或结合人大代表之家、民生议事堂、村民理事代表制、屋场会等渠道和载体，就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探索进行考察和分析。如朱凤霞指出，通过四川政协搭建的“有事来协商”平台的考察可以看到，组织开展各种微协商活动，实际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体现了政协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④邓理认为，在数字化改革中，数字技术不仅形成了数字民主，而且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系统性赋能，在提升民主质量的同时实现了基层治理的发展。^⑤

其中，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治理之间的探讨，研究者们都较为一致地肯定两者的高度关联性。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推进了基层治理理论的发展，也成为破解基层治理困境的关键，并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诠释。实践表明，两者不是分离和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因为有着公共性的政治目标与价值，不仅理论上可行而且在实践中是可为的。^⑥在过去的公共事务治理中，涉及“搭便车”困境的解决办法，在治理有效和民主原则与精神上表现出诸多不足。全过程人民民主却创造出一系列“新集体行动的逻辑”，促进了基层治理和民主的发展。^⑦诸如社区治理中“基层议事共治”这类机制，使全过程人民民主从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主实践，是对民主制度的创新。^⑧

积分制在近年来的基层治理中得到很多应用，引起部分学者关注，并论及其中所关联的村民主体、民主协商、民主监督等内容，但较少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角度加以探讨。虽然窦欢以山东省W镇积分制治理为案例，结合访谈调研资料，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民主运行过程的实践情况^⑨，但未能就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刻揭示，也缺乏对积

① 陈亚、周光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成逻辑、显著优势与实现路径》，《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第161页。

② 孔庚：《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内涵、价值追求与实践遵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1期，第57页。

③ 胡玉鸿：《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的法治保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7页。

④ 朱凤霞：《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的人民政协职能拓展——基于四川“有事来协商”平台的分析》，《中州学刊》2023年第6期，第27页。

⑤ 邓理：《系统性赋能：数字技术重塑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多重逻辑》，《学习与实践》2023年第8期，第23页。

⑥ 张灏、范钰焱：《论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特征与实践路径》，《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48—54页。

⑦ 贾双跃：《迈向“新集体行动的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基层公共事务治理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86页。

⑧ 何军、温豪：《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北京市N社区“基层议事共治”机制创新为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第43页。

⑨ 窦欢：《乡村治理积分制：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的实现机制》，《安徽乡村振兴研究》2023年第4期，第80页。

分制治理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路径的思考。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进一步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其在治理领域的实践提供了坚实基础,学界有关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就乡村治理领域具体实践进行探讨的较少。积分制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探索实践,也有必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以更好地促进这一治理方式的发展,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社会的有效展开。

二、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形式的案例呈现

全过程人民民主包含了民主的治理取向,它不仅体现在价值理念、制度程序和内容设计上,还体现在完整的民主进程和治理实践中。^①对于人民群众而言,最直接的民主参与主要在基层,当家作主最直观的感受也在基层。因而,立足具体实践,从乡村治理情境中去观察、理解和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尤为重要。从本质上看,积分制治理模式是实践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路径。

本文案例浙江省P市是浙江省县级市,早在2012年就在全国率先开始以道德积分向农户提供信用贷款的试点,通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积分制治理模式,多次成为或入选国家及部委的试点、项目、案例,被《新闻联播》《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从P市各地实践看,从制度设计到决策通过、管理实施、结果运用等整个运行过程,积分制治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理念的具体展开,其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和民主程序的运用,实现了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的落地见效。

(一) 积分制治理具有坚实的民意基础

人民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导向。基层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②。从关系和过程视角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民意的实现”,“民意的实现程度就是民主的程度,民意的实现方式就是民主的实践机制”^③。从P市各地实践看,积分制治理能在各村展开,为广大村民群众所接受,正是因为它体现了民意。事实上,积分制治理的实践场域是乡村,而村民作为乡村的主体,既是治理的主体,也是治理的对象,因而必须充分考虑村民的想法、意愿、建议、诉求和利益。

一是制度规则设计广泛征求和汇集了村民的意见建议。民意的征求是确保村民参与度和认可度的前提。P市各村在制度设计之初就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向村民宣传积分制的性质、做法和作用,特别是依托QQ群(微信群)、村小组会、党员联户等渠道、载体和平台,实现村民主体全覆盖参与;组织村民充分讨论和表达,全面详细汇集各方意见建议,如涉及哪些积分项目、分值怎么计算、分值怎么兑换等。

二是积分制度的出台经过村民民主协商与表决。民意收集转化为治理议题并付诸实践,村民的参与协商与决策是关键。P市各村党组织在汇总各方意见建议后,与镇村干部、人大代表、村民代表等初步拟定本村积分制制度及相关实施办法,交村民广泛讨论商定;在形成较为一致的结果后,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逐条逐句讨论表决通过,从而确保制度符合民意,在实施中能够得到村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

三是积分的结果运用充分考虑了村民的生活实际需要。在乡村治理情境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在于增进民生福祉。积分制治理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村民的青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小积分关联着民生和幸福。P市各村结合本村实际,根据不同村民群体、不同时期的情况,开

① 孙照红:《接诉即办治理场域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3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2页。

③ 汪仲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社会治理重构——以上海虹桥街道为对象》,《社会政策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7页。

展积分的物资兑换、精神奖励和政策支持。例如，在物质激励上，村民可以根据分值选择兑换米、油、面粉、毛巾、牙膏等日常生活用品，也可兑换旅游券、油卡、超市券等。

可见，积分制治理在乡村推广实施并不是上级党委政府或基层党组织单方的意图或行动，也不是由一部分村民决定或参与的事情，而是建立在广泛的民意基础上，以村民的利益需求的实现为价值旨归和实践指向。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治理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也正因此，积分制治理具有显著的民主优势，进而能够在实践中转化为治理效能。

（二）积分制治理强调村民的主体参与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基层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要把民主参与贯穿于治理全过程，通过全环节系统性的人民民主参与，“以真正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为超越利维坦的集权和无政府的弥散化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①。人民的参与过程是践行民主的根本途径，也只有付诸人民的真实而完整的参与，才能彰显出民主的独特魅力。从P市各地实践看，积分制治理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目标定位，激活和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实现了乡村公共事务中“干部做、群众看”到“干部、群众一起干”的转变。应当看到，对于空心化、老龄化、原子化的乡村，唯有村民的参与才能使村庄治理和村庄发展具有内生动力。

一是通过示范带动村民参与。将个体化的村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是积分制治理的必要环节。一方面，按照“村党总支+网格党支部+党员中心户+群众”的组织架构，通过党员的先行示范及其看得到的积分“好处”，带动村民“跟着看、跟着学、跟着做”。另一方面，为了深化实施和由点到面地推广，P市还在不同的乡镇挑选了不同的村庄开展试点，通过经验分享、成果展示、表彰典型，营造良好氛围。这种“造势”的意义在于在村庄内外形成了积分制治理“势在必行”“要参与”的舆论场，从而引导村民参与。

二是村民参与各方面各环节。在乡村治理中，确保村民始终在场，不仅可以使民意得到充分落实，更能让村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完整实现。从积分制项目内容上看，村民可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诸多方面，如集体经济发展、公共卫生、风俗习惯，实现了民主参与从过去政治领域到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拓展。从积分制运行过程看，村民在民主表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不同环节都能够参与，如选举管理人员、挣积分、兑奖品、查阅经费开支。

三是有序引导村民广泛参与。有效的积分制治理不只是村民参与，更需要有序参与。围绕积分制治理，P市各村都制定了相关制度条例，村干部和村民均要按照规则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制度规则开展行动，确保村民权利得到更好实现。例如，为有效解决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的法治观念淡薄、政策把握不准，小事争吵、大事上访等情况，P市许多镇村邀请了律师、警察、信访干部“送法下乡”，普及法律法规常识，并设置相关积分项目，引导村民有序参与。

可以说，积分制治理通过“增权赋能”的方式，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实现了“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共同参与办”“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这恰恰契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要求。换言之，在积分制治理实践中，随着村民参与的推进与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才得以在乡村社会真正展开。

（三）积分制治理促进村民的福祉实现

追求和增进人民福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旨归。在基层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就是强调以民主的真实性与有效性为根本，“在结果上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②。从民意的视角看，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终体现和落实在人民意愿的有效实现上。在一定意义上，对于人民群

^① 杨妍：《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基于民主理念的实质性路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第11页。

^② 李松：《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内在机制和实现路径》，《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5期，第13页。

众而言,增进人民福祉就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保人民福祉的实现就是民主。从P市各地实践看,积分制治理的初衷就是解决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回应基层群众所关心的现实关切,而这正契合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义。通过问题的解决,不仅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在村民的关注、参与和认同中促进了民主的发展。

一是明晰的责任与分工。工作机制的有序运行是积分制治理得到执行和民主治理取得成效的保障。P市自上而下建立了市—镇—村三级积分制治理领导小组,联动相关单位部门,明确各主体责任分工,并将积分制治理工作纳入年度考评,如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督促各镇街开展积分制定、积分评比等工作。在镇街党委布局和科室支持下,由村级党组织具体领导实施本村积分制治理工作,并建立村党员管理体系、网格员管理考核体系和志愿服务管理体系,推动积分制落实。

二是全过程的规范公开。公开是实现良好治理的保证,也是民主运行的基本要求,如果没有公开就无监督,也就无所谓参与。P市结合各村情况,在制定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和推行村级事务阳光公开制度基础上,通过运行“一张图”让参与者明确做什么、什么能做、怎么做,确保整个积分制治理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公开的,如资金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要求使用和公开。同时,通过公示栏、微信群等方式及时而详细地公开,尤其是数字技术手段的利用,增强了整个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提升了村庄内部的信任感。

三是全过程的监督评议。监督与评议是民主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环节,可使积分制治理形成完整的治理闭环,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解决问题和实现民生福祉。各村除了建立领导管理小组,均成立了监督小组和评议小组,成员都由村民选举和表决同意产生,且成员不交叉,监督与评议结果都需经村民代表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后公示。村民可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对各项工作进行监督,申请或被邀请参与积分评定与核定过程,如依托“村情通”“监督一点通”等数字平台,实现随时随地查看、反映问题、提出质询。这些不仅使积分制治理的每个环节都得到监督,而且问题和争议都由村民协商解决和评定处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不难看出,通过自上而下的责任考核与自下而上的监督评议相结合,村民权利在积分制治理“事前、事中、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保障与行使,确保了治理效能发挥和村民福祉的有效实现。这个过程深刻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和逻辑理路,无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运用,即透过积分制治理深处看到的是服务人民、维护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三、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

P市积分制治理呈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治理情境中的具体实践,诠释了中国式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与有效性。基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积分制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乡村治理成效,“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表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①。那么,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落实落地,并推动乡村治理发展?如何更好地推进?因此,有必要对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内在机制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 政治领导机制

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大体制优势,在基层治理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是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就具体实践看,党的领导推动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积分制治理中的有效展开,进而推动了治理的发展。

一是通过价值引领促进民主行动。在传统道德约束弱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公共意识淡化等现实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村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与集体行动,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积分制治理具有规范化、可视化、过程化、可量化等特征,并与村民日常发生关联,实际上是推

^① 刘银喜、马瑞聪:《积分制推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基于4个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治理现代化研究》2022年第5期,第57页。

动一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精神、行为规范在村民中的建立。从各地基层党组织对积分制治理的关注、宣传、实施和推广看，这些行为本身就在向村民传达建立应有的价值取向，并通过自身作用发挥引导村民的价值观念、凝聚村民力量。从积分制内容上看，党组织对内容进行审核，党的政策被及时纳入其中，以确保始终体现党的意志与人民利益的统一。如此，积分制治理以最根本的人民立场凝聚起村民共识，“在党组织的引导下，普通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既能得到很好的肯定和表达，又不会超出理性的藩篱，更不会转化为一时冲动的集体行为”^①。

二是通过组织动员提升民主实效。如何将分散化、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始终是党在基层作用发挥的关键。积分制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要嵌入既有的治理体系中，离不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如有关组织架构、政策宣传、会议学习、党员示范等。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得到自下而上的积极回应，集中体现为村民意见建议的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合理表达与实际的行动参与。实际上，有效的“社会动员要求基层组织既要以民主的方式贯彻集中，又要以集中的方式引导民主”^②，而回应的情况反映了动员的成效和民主实践的程度。通过彼此的充分互动与共识的达成，村民的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议题、科学的决策和明确的行动，从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落地，也使得积分制治理在民主集中的框架下运转起来。

三是通过协同破难增强民主认同。基层是问题产生的源头，矛盾多元而集中，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全过程人民民主有着鲜明的问题导向，“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③。在这个意义上，问题的发现、收集、回应和解决过程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过程。在实践中，各种问题的解决，单靠基层党组织或村民力量是有限的，必然需要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形成协同共治的格局。为此，P市充分发挥党建联建作用，通过不同领域和层级的党组织合作，汇聚起多方力量和资源，解决治理难题。例如，在积分制道德激励内容方面，P市已有50多个部门提供了60多项道德礼遇项目，610多家企业提供了180多项礼遇项目，147支志愿者队伍、29个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由此，积分制治理中，通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破解基层难题，全过程人民民主得以在人民感知和认同中实现。

（二）制度供给机制

制度是治理的依据，治理是制度的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为积分制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也在乡村制度完善与有效运行中得到了实现与发展。

一是通过规则形塑夯实民主基础。随着乡村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强，乡村既有规则弱化或瓦解，迫切需要重构新的规则，以规范村民的言行、重建公共价值认同、再造集体行动权威、促进乡村有序发展。在国家权力不断深入乡村社会时，更需要完善的制度来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当现代国家将农民带入政治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以制度加以规范”^④。当下，包括积分制治理在内，乡村社会形成和完善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尤其是不断尝试将村民的日常生活与行为纳入其中。积分制治理在各地推广实施的过程中，也扮演着制度下乡的角色，形塑着乡村社会秩序。这并不意味着要实现乡村治理行政科层化，而是推动乡村社会由主体之治转向规则之治，激活民主自治活力，塑造公共秩序。进一步说，乡村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形成就是民主生成的实践过程。制度供给在促成基于民主之上的积分制治理规则形成与运行的同时，也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

① 韩福国：《党建引领基层民主协商机制的实践逻辑——基于上海市社区治理案例的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第75页。

② 杜鹏：《农村社会动员的组织逻辑与治理效能》，《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60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2版。

④ 徐勇：《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50页。

社会的运用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是通过自治发挥拓展民主空间。群众自治机制是广大基层群众实现民主、享受民主的重要渠道，也是基层民主的规则基础和制度保障。无论是村民对公共事务的态度与行动冷漠，还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供给不足或偏离实际，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村民缺乏表达和决策的渠道与平台，也就是村民自治还不足。因而，民主的落地落实离不开村民自治机制的发挥，尤其是薄弱环节上的改善和提升。在治理实践中，民意的广泛形成与有效表达，不仅是群众民主意识的提升过程，也是完整的民主不可缺少的链条。与此同时，治理有效也需要通过民主协商来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因为“不同群体的需求不同，只有多协商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才能找到最佳结合点，才能让民众满意”^①。积分制治理正是民意表达与民主协商的产物，其本身也是村民自治的平台、参与的渠道。这样，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在自治的具体环节上得到了落实与发展，而且这些环节也成为提升民主质量的突破口。

三是通过资源供给保障民主运行。资源是民主运行与治理开展的基础。围绕资源的使用与分配，制度规则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效率、公平和正义。这意味着，积分制治理中的资源保障制度规则不纯粹是治理运行问题，同时还是深层的民主实践问题。不同于以项目制为主的国家资源供给方式和主体承接，积分制治理资源实行民主供给模式，即通过国家供给与基层自治结合，由村集体和村民决定如何使用。由于集体的资源是村民自己的资源，而且与村民积分福利挂钩，从而推动村民积极参与，“村民自治中的民主治理原则因为资源的带动而运转起来”^②。例如，积分兑换的内容和方式由村民以民主方式决定；积分制治理的资金使用和物资采购严格按照制度规则进行，全程公开接受村民监督。如此，国家在确保政策目标实现的同时，保障了村民自治的空间，激活了村民参与的活力，发挥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也起到了规范村干部行为的效果。这样，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运转不仅有了制度规则保障所需的资源，而且围绕资源的使用也得到了具体的展开。

（三）行动参与机制

参与是表达民主本质的核心要素。没有广大人民参与的民主是不健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驱动人民有效参与。因而，行动参与机制的建立是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核心问题。

一是通过情感认同强化民主参与。情感是驱动个体认知与行动的内在重要因素。尽管情感的非理性特征与民主的理性要求存在着内在张力，但民主本身就关涉价值认同与情感认同的问题。在现代国家建设中，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也不是简单的制度下乡或民主下乡，它需要在乡村社会情感认同中才能沉淀下来。作为内生于乡土的村规民约凝聚了村庄内部的情感认同，在内容上易被村民理解和接受，在行动上易被认可和落实。时至今日，村规民约在乡村社会依然发挥着作用，其民主性价值也得到不断彰显，“以有效实用的本土民主资源丰富基层自治的内容与质量，同时在推进基层自治的过程中提升了广大民众民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能力”^③。新时代的村规民约不仅融入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精神与内容，而且由村民民主协商而定，实行以约治理、民主管理，充分体现了村民的意志和利益，因而获得了村民普遍的心理认同和情感支持。积分制治理正是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制定形成并运转起来的，而村规民约制定与转化运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如此，在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能够得到广大村民的支持与参与而得以植根于乡村，促进乡村治理发展。

二是通过激励引导激发民主动力。在现代社会，公共参与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参与

① 骆小平：《把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1期，第67页。

② 杜姣：《资源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基于成都“村级公共服务”的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4期，第100页。

③ 牟言波、赵成斐：《促进基层民主本土资源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融合》，《新视野》2017年第6期，第75页。

的基础一定是民主。在乡村社会，受历史的影响缺乏民主传统，特别是集体经济与村民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结，村民呈现个体化、游离化的状态，无论是基层治理还是基层民主始终面临着内在动力不足的难题。归根结底，民主的价值、功能和优势取决于人民参与的程度，且必须是广泛、持久和深入的。因而，乡村社会中民主的落地及其运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其被接纳、信赖的关键，关键在于能否切中体制之下群体的迫切需求与内心敬畏”^①。与单纯的村规民约、面子观、道德评价、信用贷款、红黑榜等不同，积分制治理在明确村民的权利和责任基础上，通过差异化的项目、清晰化的积分和多元化的福利，将面子、利益和道德融合在一起，重塑了村民行为与声誉的评价机制，更为契合村民的需求。例如，积分达到80分用户，能够享受银行免担保贷款、利率下浮等优惠，缓解了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村民往往选择“趋利避害”，从而发挥规范引导村民和激发内在活力的功效。由此，积分制治理通过建立村民主体感、社会尊崇感、参与获得感相统一的激励引导机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参与与动力得到了有效激发。

三是通过技术赋能释放民主活力。囿于人数、时间、场地等因素，现实社会中民主的质量往往与理想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民主参与提供了开放的平台、便捷的渠道和高效的手段，数字民主也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民主增长点。在数字空间中，不同的主体实现了共同在场，每一个公民的民主权利都能得到行使与保障，“驱动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发展，促进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等形式、渠道的多元化，充分释放民主活力”^②。位处数字化改革先行地区，P市积分制治理就充分运用了数字技术，增强了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充分性、完整性，如网上监督、远程协商、视频会议。同时，数字民主也为政府与公民提供了更直观的交互流程视窗，增进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情况的了解和研判，以更好地促进公共资源与村庄实际、村民需求的匹配，及时回应村民的诉求和问题的解决情况，进而更好地促进村民参与民主实践。借助数字技术优势的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积分制治理中得以充分实现。

四、深化积分制治理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实践路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需要付诸具体实践，也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调适和完善其运作形态与运行机制，才能彰显其独有的价值和优势。积分制治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治理领域的具体化运用。优化积分制治理将更好地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乡村落地生根，将民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

（一）党建引领作用发挥是根本保证

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及其领导的政治体制的生存、调整与适应能力和行动策略已成为解锁中国独特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钥匙”^③。具体到基层，党建引领已成为基层治理的鲜明特征，也是基层民主创新发展的保证。

一是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凝聚民主行动的价值共识。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作用的发挥是党建引领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凝聚村民价值共识、引导村民行动最关键的力量。积分制治理中，引导村民参与，按照民主的方式开展活动，就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为此，可依托“行政村党组织+村民小组党小组+党员联系（中心）户”的组织优势，组织党员在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亮身份、践承诺、做表率，倡导民主行动的价值理念，提升村民对积分制治理的民主价值认识，形成“党建引领+网格联动+群众参与”的格局。

① 李伟嘉：《农村积分制助推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以S村积分制治理为例》，《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64页。

② 李璐、韩苏芸：《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逻辑、功能及路径研究》，《岭南学刊》2023年第4期，第13—14页。

③ 张婷：《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基于S区“近邻”党建模式的分析》，《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9页。

二是扎实走好群众路线，夯实民主实效的民意基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组织动员人民群众。积分制治理作为村民民主实践的载体，必须充分体现村民的意志和利益，才能发挥出民主治理的功效。走好群众路线，能够畅通村民表达渠道，明晰积分制治理中群众期望值的合理边界，及时有效地回应群众合理期待，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通过群众路线的开展，能够激发出村民的力量，依托村民意见建议的表达获得群众治理智慧，确保村民参与权的完整，更好地制定和完善积分制治理的制度规则，提升村民行动质量，增强民主运行的实效。

三是用好党建联建机制，增强民主认同的共治合力。党建联建机制的建立实现了基层党组织从“单兵作战”向“抱团发展”的转变，能够汇集多方力量和资源，以共治合力实现破难攻坚、促进发展。积分制治理要获得村民的认可，切实感受到民主治理的意义并产生认同、形成行动自觉，就要通过党建引领凝聚共治合力，解决村民的“急难愁盼”。要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意识，聚焦村庄发展和民生实事，找准积分制治理中不同成员的利益结合点，深化合作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同时，立足优势发挥，制定共性化和个性化责任工作清单，让成员“各显神通”“大展身手”，确保积分制治理工作开展有部署、有落实、有成效。

（二）制度效能充分释放是重要保障

制度是管根本的、长远的，关键在于执行中不断释放制度效能。积分制治理中民主的落地，不仅需要通过自身的完善“建立起规范化、标准化的操作规则与流程，形成约束不同行为主体的统一规范”^①，也需要相关制度提供支撑。

一是优化积分制度规则，夯实民主实践的制度基础。积分制治理固然有显著的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自上而下地一刀切式地推广。积分制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用，应坚持“有序引导，循序渐进，不搞强迫命令”原则，以问题为导向，根据群众意愿和村庄实际，探索出台实施管理办法。不仅要“因地制宜”，更要“因人而异”，既要考虑不同家庭情况，又要突出个体激励性，确保村民广泛参与。同时，在尊重村民民主商定表决积分制治理制度规则的前提下，要确保符合法律法规，科学合理确定积分制介入日常生活的边界，防止积分制做法泛化，避免积分制的惩罚内容侵犯村民合法权益。

二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升民主空间的治理实效。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人民民主参与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重在强调全过程。在乡村社会，村民自治是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相比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一直是民主实现的薄弱环节，影响了治理效果。因此，积分制治理中要发挥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优势，促进“五个民主”有机衔接，实现均衡发展，形成完整的民主运行程序。要进一步规范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及各类权责关系，不断拓展基层民主渠道、创新基层民主方式，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实现，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是建构多元保障体系，加强民主运行的资源供给。有充足的可供兑换的物资是积分制治理中民主运行的保障。从各地现有的物资情况看，主要靠政府部门补贴或拨付，能够靠集体经济投入的村较少。为此，要建立健全“政府投入+村集体经济收入+社会捐献+联系（定点）单位扶持”的多元投入保障机制。政府层面，合理统筹资金，设立省、市、区、镇积分制治理专项经费。社会层面，发挥税收等政策对公益性捐赠行为的激励作用，引导各方捐资捐物，将一定比例物资用于积分制治理。村级层面，创新“共富+”路径，做优做强“飞地”抱团、“共富联合体”等特色载体，壮大村集体经济，将集体经济收益与积分制治理结合，更好地激发群众参与。

（三）主体能力显著提高是关键之举

人的现代化是既是民主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民主的条件。积分制治理强调村民的参与，只有主体能力得到提高，才能“使村民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会如何实行民主，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

^① 赵晓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求索》2023年第1期，第151页。

民主的范围，真正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①。

一是创新利用乡土资源，强化民主参与的情感支持。从理性主义视角看，基层治理往往强调制度支撑和技术保障，相对忽视人的情感维度。然而，作为维系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情感却是基层治理和基层民主的重要资源。尽管人情、关系、面子等非正式的治理资源对民主的落地和形塑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也能够为其运行提供行动者的情感支持，构建起乡村情感共同体，使乡村社会发展保持一定的韧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实现，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新利用乡村既有的各类资源，激发村民情感和情感共鸣，以情感联结和动员村民，使村民建立起对村庄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认同感，获得村民的支持。

二是聚焦村庄公共精神，关注民主责任的长效培育。就本质而言，公共精神是公民责任在态度与行为上的体现。乡村民主的发展需要有公共精神的村民积极参与，并在公共精神的引领下促使村民关注村庄和其他村民的利益，积极主动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乡村治理情境中，公共精神的形成需要发挥村庄内部村民的民主性，以村民为主体的民主活动也包含着公共责任的再生产。从实践看，积分制治理经过一段时期后，村民参与热情存在边际效能递减的现象，也面临着利益激励下功利化风险的问题。从长远看，积分制治理中民主的有效实现，必须激活村庄的公共精神，塑造村民的责任感，将村民参与提升到更高层次的道德精神层面，并固化为村民的日常行为。

三是提升数字技术能力，促进民主权利的充分行使。数字技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运用，大大促进了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但是，数字技术的运用不单单是技术问题，还是思维认知的问题，不同个体的具体使用存在着一定差异，由此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制约了一部分群体民主参与权利的发挥，导致“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当前，数字化积分制已成为乡村治理中一种新的表现形式，这需要关注村民数字能力建设，提升村民民主参与的能力。一方面，要丰富数字运用场景、完善数字平台功能、简化操作流程，让村民使用更便捷、流畅。另一方面，创新线上线下数字能力宣传和培训的形式与内容，结合村庄实际开展数字治理实践活动，使村民在实践中增长数字技能。

五、结语

乡村是基层治理的重点，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和基本单元。浙江省P市积分制治理实践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治理情境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实践样态，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治理效能。在此过程中，民主的有效实现有其内在的逻辑机理，即以价值引领、组织动员和协同破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领导机制的发挥，以规则形塑、自治发挥和资源供给为主要内容的制度供给机制的保障，以情感认同、激励引导和技术赋能为主要内容的行动参与机制的驱动。积分制治理实践表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广泛的、真实的、管用的民主，体现于具体的民主实践之中，是与人民生活相结合的民主。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就要积极探索多样化的实践形式，创造基层民主实践的增长点。通过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可以提供更多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面向未来，作为一种民主实践创新，积分制治理中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需要在党建引领、制度效能和主体能力上不断深化推进。应当注意的是，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的载体，积分制治理的运用和推广要充分把握民主的本质要求，既要防止“运动式”开展，又要避免“一阵风”现象。同时，积分制治理存在一定的限度和边界，不能过于依赖和强调其工具性价值，更需要着眼于村庄的整体发展，尤其是加强和改进村级组织建设。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闫飞飞：《乡村振兴视角下完善农村直接民主制度的设想与路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12期，第125页。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 功能定位与运作逻辑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钱再见，史诗悦

摘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代中华民族理论发展嬗变的原创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进程中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与政治观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进路，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政治行动者与情境、观念互动存续的输出文本。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共同生活属性与共同伦理系统的现实基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整合国民观念、构建现代国族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功能定位。在这一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遵循了路径依赖规律和运作逻辑，即引领政治行动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关键力量，围绕情境因素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创新之路，聚焦核心观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势能。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制度主义；政治观念；制度变迁；政治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42-08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近代中华民族理论创新发展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新实践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一度居于显学位置。溯其根源，与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利益，应对国外局势变化促进国内各民族整合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首次进入中国共产党官方话语体系是在2014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其后，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党的二十大等多个重要场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流话语，并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时俱进。当前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内容丰富、视角多样，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与建设缘由

该类研究可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促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体系建设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研究”（21&ZD043）。

作者简介：钱再见，南京师范大学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史诗悦，浙江警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统一战线与治理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

国内长治久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就旨在提升国民整合度^①，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为现代民族国家搭建起科学的民族工作体系，以此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国际层面，全球化进程下，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单个民族无法完成，需要56个民族凝心聚力共同维护国家利益。^②在国际浪潮中，民族问题也是西方敌对势力歪曲利用的惯用伎俩。^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做好民族相关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武器，是回击西方敌对势力的重要法宝，也是巩固我国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证。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渊源与思想基础

该类研究旨在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所指。学界公认的是，“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近代民族主义传播后西学东渐的产物，对近现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国家建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理论渊源大多会追溯到梁启超1902年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连接起了王朝国家“中华”概念与西方语境“民族”概念的通道。其后，围绕中华民族的理论阐述及其范围界定，经历了争论、探讨与辩证的过程，并逐渐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学者和思想家认同的政治共识。中华民族从最初的特指汉族，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个民族而成的整个大民族”^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才具备了民族性、主权性和人民性这三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⑤，内涵也稳定为享有国家主权的全体国人，也包括从中国走出去的海外华人^⑥。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理论，并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世界发展的理想愿景^⑦。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的阶段性做出了精准研判。毛泽东同志做出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的论述，邓小平同志则提出“两个离不开”指示，江泽民同志则进一步提出“三个离不开”思想，胡锦涛同志则结合民族工作的时代特征进一步做出民族是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论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与实践方式

该类研究主要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式提出后，学界关于该理论的解读、阐释与争鸣。该层面通过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具体路径，借用文化人类学关于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认为应当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维度强调秉持合作与共享的理念^⑧，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特点和“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⑨，推动形成新时代民族理论体系^⑩，从而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实践维度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立足从

① 周平：《塑造国民整体性：中华民族构建的内在逻辑》，《江汉论坛》2018年第8期，第16—24页。

② 孙洲：《现状与图景：十八大以来国内学术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第30—38页。

③ 倪佳瑜、刘焕明：《论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维护》，《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43—48页。

④ 《康藏民众代表慰劳前线将士书》，《新华日报》1938年7月2日，第3版。

⑤ 周平：《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89—99页。

⑥ 孙振玉：《中华民族理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8—14页。

⑦ 乌小花、艾易斯：《“一带一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理念、价值与实现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4期，第21—29页。

⑧ 常士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多重建构及其逻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3期，第1—8页。

⑨ 麻国庆：《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与“合之又合”的中华民族共同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13—23页。

⑩ 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8页。

精神层面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民族团结^①，并认为中华民族是血缘、地缘和精神的共同体，在经历“自在”“自觉”后最终达到“自为”状态^②。此外，部分学者关注中华民族内在有机性的保障作用^③，增进“五个认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④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体建设问题^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比较注重历史和文化阐释，热衷于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心理发生机制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缺少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本位视角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显而易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符合历史发展、国情世情和政治需求的政治产物，其塑造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和政治进程影响。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上可解构为中国共产党建构的，与中国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和政治发展相吻合的重要政治思想与政治观念，其政治社会化过程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仍然处于动态发展阶段，受到历史文化“无形”的约束和制度政策“有形”的调控，其本质已经具备了历史制度属性。通过政治学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解析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过程，可以为理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逻辑提供镜鉴。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基础

共同体是具有共同性的人类群体，同时也指称关于归属的观念。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伦理系统”，还是“共同的利益基础”，对共同性的这种寻求其实暗含了一种预设，即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群体关系。^⑥它表达的是对意义、团结和集体行动的寻求。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是推进国家整体建设的政治过程，其行为主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执政党，现实基础和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共同性，行为目标是国民整体性和凝聚力的提升。按照滕尼斯共同体理论观点，共同体是血缘、地缘和精神的共同体。通过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考察，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生活属性、共同伦理系统，二者为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基础提供根本支撑。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确定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⑦，使中华民族整合成为一个政治团结的行为主体。

（一）中华民族的共同生活属性

从语义学视角，共同体所指的共同生活是其内部成员维持社会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空间场域。斯大林则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共享语言、地域、经济生活方式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⑧。由此可以推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其内部民族个体必然具有共同生活属性，并由此引申出中华民族具有共享语言、共享经济、共享地域和共享文化的交互特征。

① 青觉、赵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机理、功能与嬗变——一个系统论的分析框架》，《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第5—13页。

② 李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实基础》，《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4—20页。

③ 严庆：《认知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有机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思考视角》，《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35—43页。

④ 高永久：《铸牢边境牧区各族民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意涵、外部影响与整体布局》，《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39—45页。

⑤ 李赞、金炳镐：《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观的三个基本维度探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0页。

⑥ 李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12页。

⑦ 刘军宁等编：《自由与社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75页。

⑧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首先，在共享语言上。我国部分少数民族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并由此衍生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系统。在我国不同地区，同属汉族的地方居民所用的方言也各不相同，地域文化与地方性知识具有区域差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按照语系差别和自愿原则，逐步实现了少数民族识别和身份认定，奠定了56个民族大家庭的现实基础。与处于基层的民族个体不同，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56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使得其位置理应处于高层。尽管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字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基本样态，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民族共享语言文字，为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现实基础。

其次，在共享经济上。费孝通曾指出，西方话语的共同经济生活并不符合我国国情。^① 共享经济则更贴近我国国情和民族特征。从历史纵深看，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长期存在互市、贸易的传统。中原汉族长期从事农业耕作，而边疆少数民族大多从事游牧业和传统种植业，并由此形成了多元的民族个性。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通过农具铁器和牛羊马等物质交换逐步形成共享经济格局，并在此过程促进经济交往、思想交流和文化交融。从现实维度看，汉族在各个民族聚居区与各个少数民族存在着深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建立并沟通着对外经济渠道，促进各民族经济流通和生活水平提升，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内部民族个体间的共享经济格局的形成。

最后，在共享地域和共享文化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庭，民族聚居区是各个少数民族长期生活生产的空间场域，并逐渐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保障。而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并不排斥各民族相互杂居。实际上，在中国境内中华民族大家庭均拥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中国境内的每一寸土地均是中华民族的共享地域。而共享文化则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并与时代文化以及革命文化共同支撑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尽管各个民族都拥有各自独有的民族文化，但这一客观现状折射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的基本特征，其本质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华民族的共同伦理系统

共同体按照行为主体划分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与观念，更是一种与社会相对应的人类共同生活形式，特指那种凭传统的自然感情而紧密联系的交往有机体。^② 共同生活地域为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相互认识的基础，但从相互认识到相互承认，需要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和目标加以约束。作为伦理系统的三重要素，中国共产党基于共同的伦理风尚建立适用的道德准则^③，塑造精神性的共同因素，从而增强共同体内部成员的相互认同感，由此巩固内部成员的政治团结。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通过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和一系列完备的政策工具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逐步塑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伦理系统，增进了其政治共同体属性，以此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议程。

首先，在价值取向上，有学者指出，统一战线的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④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制定实施了科学合理的民族理论与政策，以此作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部约束。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整合国内力量，应对外部挑战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坚持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化人作用。在尊重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加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此保证各民族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其次，在政治规范上。中国共产党运用政策工具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水平。

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

②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页。

③ 厄奈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④ 钱再见、史诗悦：《共识与团结：统一战线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29—36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广泛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在民族聚居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此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正当权利。在政治体制上,成立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部门专门开展民族事务,并在统战部门、人民政协专设民宗处或民宗委,通过设定稳定的政治体制规范民族领域的政治关系和工作形态。最后,在政治目标上,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利益基础构建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并逐步形成官方、非官方和具体实践组成的话语表达体系,在全社会营造和谐的民族工作氛围。此外,中国共产党围绕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规划,致力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达到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目标。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功能定位

从国家建设的整体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政治行动者将之纳入政治议程,并由政治结构和制度工具的参与加以保障,最终完成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社会化过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国族属性被政治行动者认知应用,并同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建设结合起来,成为政治制度设计与政治观念生成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人延续了中华民族国族属性,建立了国族支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华民族理论,从个体、民族和国家三个层面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功能定位,发挥了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的政治功能。

(一) 个体层面:推动国民观念整合化

“中华”与“民族”概念的交叠实现了中华民族理论的重要“突变”,为解决王朝国家臣民意识松散,并重塑国与民的关系提供了政治方案。梁启超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①辛亥革命实现了王朝国家臣民向现代国家国民形式上的转变,国民意识与中华民族观念随着国民政府的成立注入了更多政治建设元素。国民政府国民政策的实施以及革命运动的深入推进,将国民意识从局部地区向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传播,增进了全体国民的国家认同。到抗战时期,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成为应对帝国主义入侵外部风险的重要武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被重新塑造。^②中华民族认同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主要符号,并被广泛应用,极大促进了国民观念的整合。新中国成立后,国民观念被注入人民属性,国家政权的稳定为中华民族发挥聚合功能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更多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个体心理发生机制而言,意识是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观念是意识汇聚的高阶产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不断深化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在社会凝聚广泛共识,从知、情、意、行四个环节塑造稳定的心理过程,推动中华民族实现政治团结的行动目标。

(二) 民族层面:增进现代国族一体化

中华民族理论的生成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是同轨的,表现为中华民族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和伦理系统建设现代国族的政治行动。在该过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具有政治目的的现代国族,成为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的重要支撑,并由此衍生出现代民族国家具备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结构,驱动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转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中,延续使用中华民族理论,发挥其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的社会功能,向大众输出稳定的社会观念,生成全新的国民组织形式和国家制度体系。广大国民在国家建设进

^① 周平:《中华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人口国民化》,《江汉论坛》2020年第12期,第5—15页。

^② 史诗悦、钱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出场语境、价值功能与实践向度》,《学习论坛》2024年第1期,第102—111页。

程中逐渐被原子化，其地域属性和身份属性逐渐褪去，保留的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即国民属性。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族在人口组织和资源动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均称为民族的特殊语境下^①，如今国族属性的忽略造成民族概念的模糊化，民族等同于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被曲解为“想象的共同体”是不可取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不仅是具有实体性质的宏观民族，也包含民族个体的微观民族。在建设民族国家进程中，国族一体化是明确中国特色民族话语的重要表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出于对中华民族国族属性被忽略的回应，中国共产党创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观念，以此回答中华民族建设过程中需要面对多元与一体的问题。

（三）国家层面：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党有效管理国家的制度手段，是内嵌于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创新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对党在国家治理理念、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体系三个维度均有推动作用。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党中央在民族领域的主流话语，并以此构建起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工作话语体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华民族实体心理层面的根本遵循，是构建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关键，并以此为基础增进少数民族群众“五个认同”。

其次，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区，经济贫困的主因导致群众整体文化素质不高，社会治理能力偏低。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的社会功能，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进步，以此为基础提升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

最后，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仅是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而是伴随相应下沉的政策工具，理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高民族地区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在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过程中，国家治理理念、能力和体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塑造。三者的协同耦合与结构互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并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政治目标。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运作逻辑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流派之一，是剖析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分析范式。其核心观点是制度变迁理论，即制度萌发和嵌入到具体时间和结构之中的过程，更能展现变迁的完整历程。因此，历史制度主义更善于处理政治社会稳定期的制度变迁议题。而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重要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受到制度生成的政策工具形塑，因此其同样具有鲜明的历史制度属性。历史制度主义向来关注利益、观念和制度三者间的结构关系，^②而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利益驱动下政治情境、观念与行动者的互动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其形塑过程既受到既定历史文化的制度环境影响，更受到重要社会观念转折效应牵引，并在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情境中实现理论的关键“突变”。“突变”背后蕴含的是制度“渐变”和观念形塑的双重驱动，并在政策工具和政府结构运行中反作用于现有制度架构和社会观念。

（一）引领政治行动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关键力量

政治行动者是制度生成、运行和演绎的行为主体和关键力量。制度变迁受到政治行动者产生的动力驱动，对不同时期政治议题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分野。中华民族理论从20世纪初正式成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议题。在提出之初，其功能就旨在解决王朝国家背景下臣民组织松散、国

① 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6期，第30—32页。

②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25—33页。

家意识不强的社会弊端。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国家，一批革命民主人士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具有国民整体属性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此达到凝聚人心、增强国力的政治目标。自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行动者，在革命年代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凝聚人心的政治功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到抗战时期，面临亡国灭种危险，国内制度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迅速觉醒，为中华民族理论完成制度存续赢得了关键时间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沿用了这一重要政治概念，并使其回归人民属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出场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理论经过中国共产党制度推进和政策形塑，与共同体理论结合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标志着中华民族理论在全新的历史节点实现了关键进路的创新，其背后折射的是新时期制度环境正发生变化的现状。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国内民族领域的风险挑战依然存在，并与意识形态、国家安全、边疆治理等重要议题交叠，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热点与难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政治行动者，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跃变注入了创新活力，其行动逻辑在于如何处理好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关系，旨在解决新时期民族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谐稳定的整体环境。

（二）围绕情境因素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创新之路

在历史制度主义者看来，“情境”是联结制度变迁动机和能力的中介环节，对政治结构运行和政治行动者偏好产生直接影响。“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是制度变迁中最重要的情境因素之一，是核心行动者对制度结果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发生重大提升的一个时间段。中华民族理论在抗战的时间节点实现了质的发展，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进一步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其形成与存续过程并非是在两个时间节点实现制度的“突变”，而是在时间节点前期就已受到历史情境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

梳理中华民族理论的变迁轨迹，大致可以找出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与情境因素。第一个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西方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政治工具。第二个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丰富完善，中华民族成为凝聚国力救国图存的核心观念。第三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旨在促进政治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比三个历史情境，国内外制度环境的变化调整是其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三个时间节点，民族主义的传播、“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以及共同体理论的嵌入为中华民族理论输入了核心观念，均推动了中华民族理论的关键创新。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政治行动者遵循历史制度主义规律塑造中华民族理论，在核心概念上表现为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并举，既保留了原有历史背景与文化模式，还推动了更符合政治环境的制度变革。

（三）聚焦核心观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势能

在历史制度主义中，政治行动者的观念差异为制度变迁积蓄了实践势能。观念是政治行动者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主要包含认知、信念和意识形态等要素。制度变迁的动力通常是指制度决策和反馈两类行动者参涉这一过程的动机和能力。其中，动机是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指的“观念”。^①在政治过程中，核心观念对制度决策和反馈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在既定文化模式和历史背景下，影响政治结构对特定制度的塑造。中华民族理论在诞生之初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观念输入，对国内政治人物、主要学者等政治行动者的个体偏好产生影响，改变了制度形塑进程。梁启超作为首位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要政治行动者提出“形成民族一体化意识，实现对国家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和个人的独立自主”^②的政治目标。之后这个政治目标并迅速成为政学两界的共识。而观念的分歧主要出现在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辩上。此次观念之争既是

^① 张佳威：《走向选举与协商的复合：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的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第86—94页。

^② 田雪梅：《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3页。

学术领域的思想争鸣，更是政治领域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探索。观念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与多的问题。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费孝通则从民族多元文化视角对该观点持怀疑态度。在抗战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民族“一体”的论证更利于国民整合和民族聚合。之后，费孝通逐渐实现了“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重新定义了“中华民族是什么”的核心要义。国族之辩是中华民族理论发展进路中的第一次明确的观念之争，在政治目标与多元现状的择取中，多元一体成为中华民族意识的核心观念，其运行结果既遵循了中华民族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规律，又在其中完成了“关键性枝节点”的创新与变革。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更加强调一体的重要性，并促进新行动者加入与新观念输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旧制度与新制度的更迭。

五、结论

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中华民族理论在新时代彰显强大生命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按照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理论制度变迁的产物，其变迁过程遵循路径依赖规律，是情境、观念与行动者互动存续的结果。中华民族理论在特定的社会系统和政治背景中产生，政治初衷旨在应对王朝国家制度体系无法解决的国民松散、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在此制度背景下，新的政治行动者在原有制度体系和文化模式中开展政治实践与制度探索，创新提出“中华民族”这一国族概念，这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个关键节点。随着抗战背景下国内制度环境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调整，新危机的产生引发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社会论辩，促进了中华民族理论向多元一体格局的系统审思，这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二个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政权后，延续了中华民族理论的政治思想，以此推进中华民族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全新建设历程。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旨在解决新时期民族领域的新问题，这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三个关键节点。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行动者有所不同，但新观念的输入与新制度的生成并未改变最为根本的政治目标。中华民族理论在制度存续期和制度断裂期依然遵循了路径依赖规律，最终实现了“关键性枝节点”上的制度创新。在此过程中，制度、观念与情境在互动中均保持着某种社会平衡，为政治行动者处理社会危机提供正确的政治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制度、观念与情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对政治变量的精准把控是防范政治过程负面偶然性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仍需遵从其根本的行动目标，从个人、民族到国家三个维度构建合理的制度政策体系，推动其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以此增进国家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之源。

责任编辑：杨松禄

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杨松禄

摘要：中国边疆治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权都重视对边疆的治理，虽然边疆治理的主观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整合。从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商周时期“方”与“方”的治理、春秋战国时期“诸夏”与“夷狄”概念的形成、秦汉大一统时期实行的郡县制与编户齐民政政策、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两宋和辽金元时期从“蕃汉分治”到行省制度的建立、明清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及至近代边疆概念的产生，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内部构成、身份认同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总体上看，基于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三重意蕴，中国大地上生存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政治互信、经济相依、文化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关键词：边疆治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王朝国家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50-09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新概念，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却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形成的过程与中国边疆治理的实践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中国边疆治理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建构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边疆是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是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治理而主观建构起来的产物。^①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中国边疆的“边”有内边与外边之分，“疆”有陆疆与海疆之别。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为“内边”^②；明清以后，针对殖民者的边防之“边”，可称为“外边”。本文所指的边疆主要指的是“内边”和“陆疆”。在民族国家形成以前，中国王朝国家的疆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原王朝政权对周边的统治力发生变化。王朝政权的统治力强，疆域就向扩大，王朝政权的统治力弱，疆域就向内收缩，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以“京畿”之地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的疆域模式和以“中心—边缘”来划分的边疆治理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边疆治理中的文化认同教育研究”（YB2020013）。

作者简介：杨松禄，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边疆治理、政治制度比较。

^① 周平：《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思想战线》2013年第2期，第99页。

^② 马大正：《中国边疆治理：从历史到现实》，《思想战线》2017年第4期，第59页。

模式。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所以，中国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实际上也可以视为对国家疆域边缘部分的各少数民族的治理。但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与民族建构并不同步^①。换言之，中国王朝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实践要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不可否认的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王朝政权边疆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必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对边疆治理实效的提高也必然有所助益。纵观中国历史，各王朝政权建立者的来源不一，其疆域范围也有较大出入，所以“边疆”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整体来说，王朝政权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是显而易见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又为中华民族的构建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边疆治理的思想早在夏、商社会就已萌芽。如果将我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有意索求其源流的话，那么可以说，它大体酝酿于先秦，成型于秦汉，进一步发展充实于以后各个朝代^②。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的边疆治理，不仅有效维系了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中形成了经济和文化共同体，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一、“方”与“方”的治理：商周时期中央与周边的关系

先秦时代，中原统治者实际控制的疆域还非常有限，在其疆域之外还存在着大量与其有着不同文化习俗的族群。当时，就中央统治者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而言，也许还谈不上“治理”，但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存在广泛的交流。

殷商统治者将统治区域以外的各类族群统称为“方”。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所谓‘方’是人的集体。”^③“方”并没有严格的划界标准，“方”与“方”之间主要根据礼法习俗等文化要素做区分。学者杨永生将“方”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如下：活动地域多在四夷边陲之地；存在一定政治整合；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势力强大者还会成为中央王朝的重大威胁。^④商末，一些“方”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内部整合，产生了有一定权威的统治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方伯”。目前，留下较多文字记录的是东方的夷方伯和西北方的周方伯。对于实力渐长的众方伯，商朝统治者也采取了武力征服、拆分领地、授予礼器并加以册命、婚媾联姻等方式将其纳入自身的等级官僚体系。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妇好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的铜矿石来自云南^⑤，可见商朝统治者已与一些相对遥远的族群建立了经济联系。整体来说，商朝统治者对待周边诸方的治理是比较残暴的，尤其是劫掠其人口作为人性人祭的行为，由此激起诸方的反抗。最终，强大的周方伯联合不满商朝统治的诸方势力将商朝推翻并取而代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就是“武王伐纣”。

虽然商代的方有很多在武王伐纣前已经臣服于周，但商周鼎革后，仍然有很多方与周人是敌对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与这些方的关系，是周朝统治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周初，周人对这些敌对的方采取了多种处理办法。有的方被举族驱逐到边远地区，被迫承担向周人纳贡等义务，其故地则被分封给周的诸侯，东边的徐方、夷方等势力即属于这种情况；有的方被彻底征服，

① 许建英：《边疆治理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浅论》，《西部蒙古论坛》2020年第3期，第13页。

② 刘逊：《我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初探》，见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54页。

③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61页。

④ 杨永生：《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第49—51页。

⑤ 李昆声、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之探索》，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页。

其土地和人口都被分封给诸侯，著名的鬼方就属于这种情况；还有的方在被征服后直接被转化为周的臣属，周初的“韩伯”就属于这种情况。^①不过，相比商代，周代以分封制为基础的多国体系扩大了中央政权的政治和文化辐射半径，为春秋时代“诸夏”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诸夏”与“夷狄”：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身份认同

“诸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闵公元年（前661年）的记载，原话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是管仲为了劝齐桓公发兵攻打山戎以拯救邢国时说的。可见，“诸夏”是与“戎狄”相对的概念。

最初的“夏”，其实是周人的自称。所谓“诸夏”，从字面意思上看就是与周王室有共同祖先的各诸侯，但实际上指的是认同周王室权威和周人礼乐文化的各诸侯国。关于“夏”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具体方位在哪里等问题，从古到今一直没有定论，但春秋时代各国君主和士大夫无疑把“夏”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以便将自己与周边的“夷狄”区别开来。南京大学的颜世安教授认为“诸夏”是一种新的族群观念，不同于旧式氏族联盟，是不同姓族的组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氏族的族群观念，也是华夏族群自我认同的起点。^②

“诸夏”观念的产生，既是中国上古各族群的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西周分封制下的多国体系演化的结果。如前所述，周人代商后，将姬姓宗族和关系亲近的氏族分封到各地作为诸侯，统治当地原有的族群，并通过联姻、结盟等方式与之联合。但在这个过程中，远离王畿的各诸侯国出现了一种文化现象，即统治阶级尊奉周人的礼乐文化，轻视和排斥当地原有的土著文化。这种现象主要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周人的礼乐文化成为诸侯间进行外交的门槛，吴越等原与周文化差异较大的诸侯为了进入中原诸侯的“圈子”也不得不学习礼乐文化，乃至为自己“发明”出与周人相同的祖先，从而成为“诸夏”的一员；二是各地原来的土著文化依然在当地人民当中广为传播，但始终不能成为统治阶级认可的主流文化，只能偶尔以《越人歌》这样的形式浮出水面。这种统治阶级与下层民间文化割裂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诸侯国形成地方性的民族，却促成了“华夏”这个大的族群概念的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诸夏”与周边“夷狄”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大，一种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天下观逐步形成。在这种天下观当中，四方的“夷狄”被根据方位大致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大类，统称“四夷”。无论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否真实，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周幽王进而导致周平王被迫东迁的历史应该争议不大，可见西周末年“夷狄”的势力不容小觑，能对“诸夏”产生较大威胁。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的实力严重削弱，权威大幅降低，而“夷狄”仍然会不时侵扰各诸侯。在这种背景下，“诸夏”的身份认同逐步明确，成为诸侯间相互联结的重要纽带和团结一致对抗周围“夷狄”的重要旗帜。齐桓公作为当时最强的诸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诸夏”领袖的职责。除了多次发兵解救被山戎攻打的北方诸侯，他还率军南下问责对周天子不敬的楚国，而楚国正是当时自称“蛮夷”的势力中最强大的一个。葵丘会盟时，齐桓公正式提出的“尊周室，攘夷狄”的口号，成为后世“尊王攘夷”观念的滥觞。

尽管“诸夏”和“夷狄”概念的形成也意味着“华夷之辨”观念的产生，但春秋时代二者间除了斗争也有融合。例如，秦穆公向黄河西部开拓疆土，先后征服了二十多个西戎小国。在这之

① 杨永生：《商周时期的方伯与方伯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第95—97页。

② 颜世安：《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夏”融合与地域族群》，《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第98页。

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该地区的大量西戎人不但接受秦国的政治管理,经济文化方面也受到了诸夏的影响,这一点已经被现代考古学证明。^①此外,华夏礼乐文化对吴、越、楚等国人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一时期,以分封制为基础的这个多国体系其实拓展了“诸夏”或“华夏”的边疆。

三、郡县制与编户齐民:秦汉大一统时期“华夏”或“汉人”身份认同的强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郡县制推广到了帝国全境。随着闽中、南海、桂林、象等36郡的设立,秦帝国的边疆远远超出了原诸夏各邦的范围,延伸到了今天的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地。更重要的是,秦帝国在先秦的“天下”思想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王者无外”的边疆思想理论体系^②。

秦代“王者无外”边疆思想的形成,既是对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发展传承,又和秦人自身独特的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秦国王室的祖先出身寒微,并不在周初大量分封的姬姓诸侯之列,封地居民中又有大量夷狄人口,所以常常被东方诸侯排除在诸夏的范围之外。但到了战国中后期,随着秦国的国力增强和领土扩张,与东方诸夏各邦在人口、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深,秦人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转变,他们的统治阶层渐渐将自己视为诸夏的一分子。

在这个过程中,秦国效仿魏、楚等国,引进外国游士进行变法。商鞅变法对秦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改造,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不仅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了秦的国力,为其日后兼并六国奠定了基础,更塑造了之后两千年中原帝国的基本形态。在商鞅变法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中,郡县制与“编户齐民”尤其对后世“大一统”帝国形态的构建与民族认同、民族融合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郡县制与编户齐民的管理制度,某种程度上说是《诗经·小雅》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理念的具体化。郡县制保证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政治资源的绝对控制,编户齐民则确保了各级政权对每一个家庭乃至个体的绝对掌控。

秦朝建立以后,这两种制度被作为基本制度由内而外地逐步推行到帝国能有效控制的所有地区。由于在以这两种制度作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下,所有居民不分地域或文化,都对帝国承担相同的赋税、兵役等义务,这一进程大大影响了各地族群的身份认同。一些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到秦汉时代,“华夏”的定义已经变为“拥有正常编户身份的政治体成员”。^③可见,此时的“华夏”概念,已经在先秦时代以文化为划界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政治认同的因素。

随着秦帝国疆域的扩张,郡县制和编户齐民覆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一些边疆地区原本与诸夏文化差异较大的族群,随着被纳入编户的管理范畴,其身份认同也逐渐向着“华夏”靠拢。汉承秦制,尽管汉初一度实行过“郡国并行”的体制,但“七国之乱”以后,各封国要么被撤销,要么自主权力被大大削弱,郡县制再次成为帝国地方治理的主要管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汉人”也成为“华夏”的近义词,而界定“汉人”的最主要标准,就是其是否具有编户齐民的身份。

当然,伴随着郡县制和编户齐民制度的推广,除了大量边疆人口“华夏化”或“汉化”现

① 关于秦霸西戎产生的文化影响,可参见郭物《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四川文物》2019年第4期,第46—53页。

② 袁宝龙:《秦帝国“王者无外”边疆理想的构建、践行及其困境》,《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页。

③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象,也出现了部分人口为逃避编户齐民管理而“胡化”“夷化”的现象。例如,燕齐、吴越、南越等地的滨海地区,由于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央帝国的编户齐民管理很难深入到这些地区,当地被称为“海人”或“海上人”的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形成稳定的“汉人”身份认同,反而逐渐形成了原本未必有血缘关系的“东夷”或“越人”的身份认同。这些人群成分复杂,包括渔人、船人、方士、海商、海贼等,而一些原本居住在陆地上的农户,为了逃避编户齐民管理下的赋税、徭役等负担,也逃亡海岛加入“海人”群体。^①此外,根据居延汉简等当代考古挖掘得到的文字资料,汉代北部边境地区居民逃亡到匈奴的情况也普遍存在。^②

除了中央政权将边疆各族人口划入编户齐民从而使之转化为“汉人”或编户齐民人口为了逃避负担外逃而成为“蛮夷”,从两汉到曹魏时期,还存在大量北方异族人口因为各种原因内迁并请求依附的情况,这些内迁的族群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族群由于大多是在保留了原有部落结构的情况下内迁的,中央帝国未必能够顺利将其转化为编户齐民,因此他们也未产生“汉人”的身份认同,并经常在帝国要求他们承担兵役等义务时发生叛乱,也正是这部分内迁而未能被汉人完全同化的异族人口为后来的“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

如上所述,郡县制和编户齐民制度的实施将“华夏”或“汉人”的身份认同变成了一种政治认同——凡是服从编户齐民管理的人,不管其血统如何,都是“汉人”,反之亦然。虽然这两种制度下的一些严刑峻法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在秦汉帝国的部分边疆地区造成了人口向外逃亡的现象,但整体来说,这两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帝国边疆地区大部分人口的身份认同,加速了这些地区的民族融合。

四、从“大分裂”到“大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

东汉末年,随着黄巾之乱、关东联军讨伐董卓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延续了四百余年的秦汉大一统帝国土崩瓦解。三国时期,曹魏延续了两汉将北方少数民族内迁的措施,而蜀汉和东吴政权也分别在南中、吴越等地开拓边疆,将内地的技术、文化带入这些地区。

司马氏取代曹魏建立西晋以后,虽然短暂统一了三国版图,但未及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体,统治集团内部就爆发了激烈的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各藩王间此起彼伏的战争持续了近15年,史称“八王之乱”。当时,由于北方的内迁各族群相比编户齐民人口拥有更强的战斗力,西晋各藩王争相拉拢他们加入自己麾下作战,如匈奴首领刘渊曾得到成都王司马颖重用,王浚、刘琨等晋朝将领也分别依靠段部鲜卑和拓跋部鲜卑为自己作战。于是,在战乱导致西晋朝廷的统治迅速衰微的同时,汉魏以来内附的北方各族却日益强大。在“八王之乱”结束仅仅5年后,匈奴人建立的刘汉政权军队就攻入了晋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这个被称为“永嘉之乱”的事件正式拉开了所谓“五胡乱华”时代的序幕。

“五胡乱华”对于“华夏”或“汉人”概念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自先秦时代“诸夏”观念诞生直到三国时期,作为其文明核心区的中原和华北等地(当“华夏”作为地理名词时指的也是这一区域),始终由具有“华夏”身份认同的统治者来统治。然而,自西晋灭亡以后,无论是前汉、前燕等地方性政权,或是前秦、北魏等统一北方的强大政权,甚至是后来重新实现大一统的隋、唐等多民族帝国,其统治阶级从血缘上来说都不是原先的“华夏”或“汉人”后

^① 关于秦汉时代滨海人群的身份认同,可参见陈鹏《“汉人”与“海人”:秦汉时期滨海人群的身份认同》,《人文杂志》2021年第8期,第97—105页。

^② 汪贵海:《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第37—42页。

裔。原本居于正统地位的“华夏”士族，在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建立了具有流亡政权性质的东晋，这个政权后来历经宋、齐、梁、陈四朝，非但没能成功北伐重新定鼎中原，最后反而被北方的隋帝国消灭了。

然而，正是在这南北分裂的近300年时间里，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身份认同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早在十六国时代初期，西晋还未正式灭亡时，匈奴首领刘渊就自称有汉朝皇室血统，以汉帝国的继承者自居，并给自己建立的政权冠以“汉”的国号。其后，虽然由于北方战乱频仍，胡汉之间出现过类似种族屠杀的情况，但随着拓跋部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重建秩序，统治者也开始重新审视“胡汉”问题。北魏建立之初，统治者强调自己的鲜卑人身份，在政治组织方面也保留了很多原来的部落结构。到了文明太后和孝文帝时，鲜卑君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旧贵族势力，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这些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经过这次改革，北魏的都城迁到了洛阳，鲜卑君主开始以中国皇帝自居，原本在占领区随意掠夺物资的军事贵族变成了领取朝廷固定俸禄的帝国官员，原本习惯于归葬北方的部落民变成了籍贯为洛阳的编户齐民，甚至拓跋、独孤、丘穆等鲜卑姓氏也变成了元、刘、穆等汉姓。

事实上，在之前的“五胡乱华”时期，由于北方地区连年战乱，原本的“汉人”人口或大量死亡或逃到了南方。然而，随着北魏汉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北方大量原属“胡人”的人口被转化为“汉人”，这种独特的民族融合形式几乎相当于在华北地区再造了一个“华夏”。此后，在辽、金、元、清等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华北的时代，这种北方少数民族阑入华北并取代当地原有居民的情况一再重复。

北魏灭亡以后，后继的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政权延续了北魏的政策，让北方少数民族的汉化进一步走向深入。随后出现的隋、唐两个大一统帝国，正是这几百年的汉化进程结出的果实。建立隋朝的杨氏，原姓“普六茹”，建立唐朝的李氏，曾姓“大野”。因此，他们的祖先可能是鲜卑贵族，也可能是鲜卑化的汉人。但在杨坚和李渊登基称帝后，他们无不淡化自己身上的鲜卑元素，反而强调自己的汉人身份，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原本的华夏望族弘农杨氏或陇西李氏那里。

也许是因为隋唐皇室自身的多元特征，这两朝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相比秦汉帝国更有包容性。如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相比秦汉帝国希望对境内所有区域实行编户齐民管理的方式，隋唐帝国对边疆治理模式的一大创造是羁縻州的设置。所谓羁縻州，指的是中央王朝在一些边疆地区设置的有别于一般州县的建制。这些地区虽然名义上划入了帝国的州县，但其管理者并非是中央委派的流官，而是酋长、土司等当地传统势力的代表；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也会更多地强调“因俗而治”的特点，这些具有灵活性的边疆治理政策无疑也加速了这些地方的民族融合。

综上，从西晋灭亡到隋唐重建大一统帝国，“华夏”或“汉人”的概念再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被视为“蛮夷”的北方少数民族人口，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汉化，最后竟然成为新的“华夏”族群。与此同时，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区的治理方式，也变得更为灵活而多元。虽然隋唐时期也发生过隋炀帝好大喜功三征高丽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以致身死国灭、鲜于仲通挑拨唐诏关系致使十几万士兵枉死异乡等反面教训，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也是民族加速融合，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形成的时期。

五、从“蕃汉分治”到行省制度：两宋和辽金元时期边疆治理的政策流变

根据唐太宗等有为君主的设想，唐帝国应该成为一个境内各民族共同效忠皇帝、域外万邦来朝的天下帝国。但盛唐时代的和平与繁荣景象其实是建立在中央政权有强大实力以维持统治秩序

的前提下。这一时期,有很多来自中亚乃至西亚的商团来到唐帝国境内并定居下来,包括突厥、回纥、粟特等。这些商团由于长途运输的需要,经常需要自己建立武装。其中,河北地区的粟特人武装商团中产生了后来的安禄山史思明集团。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也是来自内亚的各种军事力量正式浮出水面取代原来忠于中央政权的州郡机构的重要节点,这种趋势造成了从中晚唐延续到五代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帝国灭亡后,沙陀人、契丹人等后起的少数民族取代了已经汉化的鲜卑人的位置,在华北和中原地区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权,如五代中的后唐和后晋。尽管后周和北宋政权将中原地区重新夺回汉人手中,并且消灭了南方的一系列割据政权,但汴梁朝廷始终未能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势力赶出河北,从而未能像隋唐那样实现大一统。在辽、西夏、大理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包围下,北宋始终未能开疆拓土,对境内大多数人口实行编户齐民管理,仅在今天的湖南、广西、贵州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类似唐朝的羁縻管理。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向南转移,客观上促进了南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了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相对于南方,北方的辽国却在管理契丹人和汉人两个不同的族群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蕃汉分治”的机制。“蕃汉分治”的逻辑其实和唐代的羁縻州制度有相似之处,即强调“因俗而治”。从行政结构上看,辽国统治者在中央设立北面官和南面官,分别负责管理契丹人和汉人的事务;从管理的实质上看,“蕃汉分治”实际上是对早已习惯了编户齐民管理的汉人沿用唐代律法,而让保留有部落自治传统的契丹人继续使用其部落习惯法。“蕃汉分治”的做法符合当时的实际,维持住辽国社会的稳定,也为继之而起的金、元等政权的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征服了远至东欧、西亚的广阔土地,至忽必烈时则再次建立了东亚大陆的大一统帝国。元朝延续了辽以来北方“蕃汉分治”的做法,对蒙古人使用成吉思汗颁布的名为《大扎撒》的习惯法,让“色目人”各自根据自己的习惯法自治,对被称为“汉人”和“南人”的编户齐民人口则继续沿用唐宋以来的律法。这种做法对于管理一个广阔的多民族大帝国的统治者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实践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些被后世史家认为有种族歧视嫌疑的现象,如汉人杀死蒙古人须依据律法偿命,而蒙古人杀死汉人则依据草原习惯法赔偿烧埋银即可。这种管理方式也强化了蒙古人、“色目人”和编户齐民人口之间的差异,使得元朝始终具有一种外来异族政权的色彩。

尽管元朝的“蕃汉分治”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融合,但其创立的行省制度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帝国将各地分成郡、县两级来管理,汉代比郡高一级的“州”具有中央临时派出机构的性质,到东汉末年中央政权衰微之时,州牧、刺史在成为常设官职的同时,也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唐代在州、县两级之上设置了具有军区性质的“道”,但同样随着中央王朝的没落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元代的行省制度则强调将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关键权力收归中央,降低了地方割据势力抬头的可能性,最大限度保障了中央集权。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行省制的设立初衷在于对各地实施统一的标准化,但事实上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等不易于实施编户齐民管理的地区还是创设了一些以族群群落为管理基础的特殊政区。^①

六、从族群认同到国家认同: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

作为中国历史上帝制时代的最后两个王朝,明、清两代在元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

^① 陆韧、林晓雁:《元代西南民族地区的户籍、族群管理与特殊政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第41—49页。

权。在中央层面，明代的内阁与清代的军机处都强化了皇帝的个人权力而削弱了相权；在地方层面，两代延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更在西南边疆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强化了中央政权对这些地方的管理，也改变了这些地区居民的身份认同。

“改土归流”除了在人事层面将当地的管理者由世袭的在地土司替换为朝廷委派的流官外，也在行政管理层面将内地的编户齐民管理体制引入了边疆地区。自此之后，大量原本身处帝国体系之外的少数民族人口被正式纳入管理系统，他们的生活与北京的朝廷发生了切实的关系，其身份认同必然也从原来的族群认同向着将来的国家认同转变。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与隋唐帝国不同，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尽管也以中国皇帝和之前历代中原王朝的继承者自居，但并不把自己视为汉人，更是通过剃发易服等一系列政策强调了自己作为满洲征服者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就逐渐变得比“汉人”的范围更大了。

在清朝，近代意义上的边疆概念出现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边疆概念不同，近代意义上的边疆不再以中央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来界定边疆，而是以国家边界为基础来确定边疆^①，这种边疆概念是伴随着外敌入侵而产生的。这个时候，“我族”与“他族”的内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主义思想传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威胁和入侵，边疆各民族“守土卫家”的行为也被赋予了“爱国”的内涵，“族群”认同也升华为国家认同。此时，两种截然不同并相互对立的民族建构理论成为主流：一种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汉民族主义思想，其主张排满兴汉，认为十八省为汉民族的固有领土，满清统治者则为外来侵略者，应当将其驱逐出中国，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来源于这种民族建构理论；另一种民族建构理论以梁启超为代表，为了保持清朝领土的完整，主张大清版图内的各族群不论其血缘、文化、宗教信仰为何，相互间是“从多元到一体”的关系，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后来，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逐渐被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甚至用中华民族来代指中国，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一个被赋予了“国家意义”的概念。

七、结论与启示：中国王朝边疆治理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形成的过程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场域的边疆，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高度重视经略边疆。总体来看，中国王朝边疆治理奉行“守中治边”与“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以达到“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为目的，本质上是维护王朝的统治。虽然王朝的边疆治理存在“夷夏之防”“以夷制夷”等保守思想和重北轻南、重守轻治等弊端，但基于边疆在维护王朝政治统治、经济繁荣、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意义，中国历史上的各王朝都因时因地制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边措施，有效促进了边疆与内地、边疆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政治互信、经济相依、文化交融，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基于“大一统”的政治互信。“大一统”的天下观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统一性、连续性的根本观念，也是存在于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国家观。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统治以后，王朝统治者即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了王朝的边疆观念和治边策略。在此思想指导下，秦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汉朝奉行“王者无外”和“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隋文帝倡导“混一戎夏”“无隔华夷”，唐太宗提出“安辑夷夏，九服同轨，六合一家”，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称自己为“中国”并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例如，匈奴人刘渊建

^① 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67—72页。

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苻健建立的政权都积极推动国家统一；辽人称“契丹、汉人是一家人”^①，清雍正皇帝强调“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②，这些都反映出历代王朝政权，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抑或统一政权还是割据政权，都以“大一统”为王朝统治的政治追求，这种政治追求体现在王朝的治边策略上，使得边疆区域虽然不断变动，但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始终是边疆各民族最根本的身份认同。

基于边疆开发的经济相依。诚然，由于秉持“守中治边”原则，边疆对王朝政权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所以历代王朝对边疆的开发是不足的，但通过筑路、屯田、贸易等措施，还是推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边疆与内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相依。秦统一中国后，修筑了贯通全国的驰道，并在南越地区修筑“新道”、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汉袭秦制继续修筑从中原通往边疆的道路，之后历代都重视道路的重要性，通过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络，进一步加强了王朝政权对边疆的控制，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先秦至明清，历朝历代皆在边疆地区实行屯田制度。屯田制度的实施不仅保障了王朝政权的粮食安全，还推动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流入边疆，也使得大量的中原居民迁入边疆，有力地促进了边疆各民族的融合。随着道路的畅通，移民、屯田的深入，边疆与内地的贸易交换成为必然。自西汉与南越国互通关市以来，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逐渐建立了互市制度，形成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③的生动局面。筑路、屯田、贸易等治边政策的实施，有力促进了边疆与内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互动，而互动的结果就是交融，最终形成了经济相依的经济共同体。

基于文明教化的文化交融。实施有效的边疆治理，文明教化始终是最基本的策略。王朝统治者虽然主张“华夷有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历朝历代并没有采取强制性的文化同化政策，而是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策略，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德泽洽夷”“用夏变夷”，使边疆各少数民族逐渐认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政策，汉武帝提出“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的教化方针，隋唐时期出现了“西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④的学习热潮，元朝“勉励学校，宣明教化”，明清时期鼓励各地兴办社学、义学、私塾等，均有力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进而达到了“德泽洽夷”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王朝政权实施文明教化的过程，也是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汉文化融入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汉文化，最终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

责任编辑：念兴昌

① [元] 脱脱：《金史·卢彦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15页。

② [清] 雍正：《大义觉迷录》，见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6期》，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6页。

③ [清] 张廷玉：《明史·卷222》，《方逢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46页。

④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53页。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向度

彭舸珺, 陈 真

摘 要: 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彰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包容性和统一性则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脉相承的精神瑰宝, 成为孕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力量的动力源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坚定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 不断探索出能够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 新时代;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向度; 文化机理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4) 02-0059-06

文化和文明中蕴含的力量, 是不断推动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客观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 而如何促进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统一性, 让其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化力量, 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①。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②

现阶段,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 中国也正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有效应对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妥善处理民族领域风险挑战, 进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就非常值得关注。因此,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 以文化视角探索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 是现阶段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③。

立足于新时代, 以文化为切入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④, 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举, 有着深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厘清中华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理路, 能更好发挥出文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兰州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阐释研究立项课题“新时代家风建设内容及路径研究”(LZUSZ2022002)。

作者简介: 彭舸珺,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生命道德教育; 陈真,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7日,第1版。

②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9日,第1版。

③ 张志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边疆实践与探索——召存信民族团结事迹及启示》,《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5—7页。

④ 徐波:《运用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功能与实践进路》,《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第20—25页。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意蕴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蕴含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征程上的新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定是在五千年文明基础上不断创造并承载着的新的现代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具有相同精神内涵的,同样也具有共同的方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与中华民族新文明和新文化的创新实践相一致。总体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其不仅强调对历史发展中优秀文化的认同,更包含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传承。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用劳动和智慧创造了优秀的文化,其蕴含的哲理、精神观念等文化基因一直延续到现在,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和思想。鉴于此,要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让其成为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顶层的重要思想源头,比如重承诺、求正义和崇和合等,这些都将作为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力量之源。其中,和合思想能够被释义为和平和谐和团结之意,正是这种文化状态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统一的共同体思想,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包容、合作,以及互相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先进思想,正是基于此才产生了不同民族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的和谐局面。而传统文化中“大一统”的思想理念和社会治理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这些思想对于强化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共识。“大一统”思想作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文化指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迭中成为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观念基础,为促进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文化共识。总体上说,包括“和合”“大一统”等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成为开创中华民族“共同体”局面的思想传承和文化基因,也成为融入人民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共识,这些都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记忆和情感基础。

历史经验也表明,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奋斗历史,是形成“多元一体,交互交融”民族格局的实践基础。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战胜了数不清的自然灾难、外敌入侵,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拓了幅员辽阔的壮美山河。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依靠团结一体以大无畏的精神共同应对内忧外患,捍卫了民族尊严,谱写出众志成城、共抗外敌的壮丽华章。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各族人民为打倒日本侵略者团结一心、浴血奋战,最终获得了战争胜利,成为全世界维护民族独立自由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奋进,大力发展生产力,让中华民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团结一心、休戚与共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种远大理想和为民情怀,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奋斗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机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机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①:一是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华

^① 朱尉、周文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与文化传播路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3—8页。

民族共同体是对民族理论的传承,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①，“大一统”及和而不同的思想理念都是这一意识形成的文化根脉和理论依据。二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只有各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共同发展,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同时,这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

(一) 文化共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

文化共生是基于生物学领域的共生理论,从文化角度出发所作出的系统阐释,即多元文化共存共荣、彼此作用、相互制约、交流交融。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于多元民族文化的共生性。以“文化”和“共生”分别为经纬,从营造文化共生单元的环境,缔造共有文化印象,形塑共同的认知体验、调节各民族文化共生的模式,促进文化互惠互荣,汇聚共认的价值信念、完善文化共生的界面、促进共同体意识链接,汇聚能动的行为意愿等维度建构多元文化共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文化共生作为集体意识的强化点,成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起点与基础。

(二) 文化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

文化共识对于增进文化认同、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首先,文化共识是文化认同的基础,成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和谐最深层次的内涵。不同民族之间产生的文化共识能够减少冲突和矛盾,进一步增加理解和信任,从而促进各民族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其次,文化共识是在各民族长期磨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相互包容的默契和价值观,它是黏合各民族之间不同特征、促进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最后,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外国反动势力通过文化入侵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稳定,而强有力的文化共识可以成为抵制文化入侵的重要心理基础。

(三) 文化共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系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和格局的构建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强化文化体系的传承,通过教育、传播等多种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二是要创新文化体系,鼓励和支持文艺创作、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三是要强化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四是要构建文化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服务和活动。只有这四个体系不断强化,相互联系和作用,才能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格局奠定基础。总之,文化共建可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系和格局的重要抓手,通过加强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基础上,不断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四) 文化共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导向

文化共享强调了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导向,强调了民族间共建共享的重要结果。首先,文化共享强调的是不同民族间的平等性,各民族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切文化结晶都可以平等地享用、共同受益。其次,文化共享成为强化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各个民族能够共同欣赏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他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最后,文化共享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②。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只有各民族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强化民族团结,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保障。

^① 张可荣、舒迎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密码》,《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72—76页。

^② 张继艳:《推动文化自信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双向互动”》,《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第36—37页。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挑战

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问题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民族问题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战争此起彼伏。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抬头。西方的一些敌对势力以民族问题为由对我国进行污蔑打压,直接或间接对各种分裂势力活动提供支持,这都为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来较为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一) 多元文化冲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全球化的不断加速,很多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良莠不齐的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冲击,在碰撞中产生冲突和矛盾,对于促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巩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西方的不良思想过度强调个人主义和盲目的自由观念,甚至在这种观念中掺杂着严重影响我国民族团结的分裂主义思想,这对我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非常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在多元文化涌入中,留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多样性的同时,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性,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挑战。

(二) 多元的社会价值观稀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发生着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这种多元性的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和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大众价值观念的丰富和多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但也对更好地统一思想意识形成较大冲击。如何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科学地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成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挑战。

(三) 尚存的民族分裂思想威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虽然现阶段我国的民族团结工作整体状况良好,但是民族分裂势力仍然存在,包括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思想等问题都尚未完全肃清。目前,虽然整体上边疆地区的民族工作平稳,但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境外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利用民族问题等进行带有政治性意图的渗透,民族分裂等极端思想的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成为影响到民族团结稳定的重要威胁。包括鼓吹“疆独”“藏毒”等影响民族团结的思想,其背后的根本性原因是将其他民族文化认同粗暴地凌驾于中华民族认同感之上,意图削弱边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成重大威胁。

(四) 泛民族主义的回潮削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周边的邻国中,存在多个跨界居住的民族。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关系较为融洽,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些客观问题。因为历史沿革的原因,跨界居住的的民族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这种情况使得这些民族之间有一定的认同基础,但又由于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国籍、社会制度也大不相同,因此又有着不同的国家认同感与归属感。我国的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有着较强的民族认同感^①,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但因为受到周边国家的泛民族主义影响,其对本民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被削弱^②,甚至向着与其相悖的方向发展。这些不良的文化思潮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稳固。

(五) 网络中不良涉民舆情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必备的空间,网络空间对于现实生活中国族问题的影响日益扩大。网络空间在增进各个民族间交流互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网络空间中信息的虚拟化、联动性和即时性的传播都增加了民

^① 乔秀丽、张文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与价值旨归》,《新疆社科论坛》2020年第4期,第6—9页。

^② 郑文宝:《伦理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溯源探赜》,《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3—21页。

族事务治理的难度,对于网络舆情的管理产生较大冲击。其中,一些涉及民族因素的舆情,通过网络世界的传播,会不断地发酵和扩大。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发布不良言论、散播谣言,对我国民族关系进行蓄意挑衅,更是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的严重威胁。其中,一些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空间提前为策划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做各种思想准备。所以,如何让互联网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工具,加强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统筹,促进网上与网下两个阵地的民族工作宣传,做好网络中涉民族舆情的正确引导,是现阶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议题。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根本性、全局性的工作,对于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民族的现代化文明为着力点,成为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 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共同信仰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现实的民族问题相结合,努力走出了一条能够解决中国实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民族大团结,才能为各民族凝聚和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强化共同信仰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对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一是要加强和完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机制。要树立整体观,全面地看待民族工作,强化党在民族事务管理中不同责任主体的职责定位,促进各主体之间的联动,将党的领导贯穿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中。二是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谋划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建构多领域的一体化安全格局,在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防范和化解民族领域的重大风险隐患。要从全局的角度审视安全问题,统筹文化、意识形态、网络等多领域,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坚决打击各种分裂破坏活动,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防止地区间泛民族主义对我国边疆安全产生不良的影响。

(二) 弘扬中华文化底蕴,增强文化认同性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而灿烂的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伟大的民族精神更是各民族一起培育的。因此,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增强文化的认同性,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之一。首先,要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现阶段,对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能够有效打开文化发展空间,能够有效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明成果以一定的文化形态进行承载,进一步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观念、文化理念等转化和创新与文化发展方向及价值取向有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蕴含着博大的精神力量,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建设中华民族文化的最直接动力。其次,要充分调动各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促进更加丰富的现代文明建设。在科学把握中华文化和各个民族文化关系基础上,将各民族文化融合互建,创新发展。要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主干作用,各民族是丰富的枝叶,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将各个民族的灿烂文化融入多彩多样的中华文化中,更好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成为有根之木。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创造源头是勤劳智慧的人民,在日复一日的劳动实践中,将劳作形式和成果转化为文化的内容和成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基本的现实基础。最后,要强化文化遗产的保护。文物承载着优秀灿烂的文明和历史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历史文物也是承载着各民族文化生活痕迹的具体物质形态,是中华民族集体结晶和历史见证。因此,要全面提升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努力传承好、利用好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增强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三）形成共享精神标志物，构筑中华民族形象

标语和标识等精神标志物是文化内涵和精髓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识强化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直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将各族人民的精神理念和价值精髓抽象凝练成具有精神内涵的各类文化形象，然后又使其成为吸引和凝聚各族人民的标志物和文化结晶。这种共享的精神标志物，对于塑造更好的民族形象、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十分直观的指引作用。这些文化结晶的标识物，能够更有效地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内涵建设，对于提振各民族人民的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要从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凝练出更多共享精神标志，从而塑造更多有进步意义的中华民族形象。从内容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还包括政治文明等，但是从现阶段的精神标志物来看，大多集中在精神文化、精神文明，对于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精神标识及形象物仍然较少。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调动全民的创造性，塑造具有更多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国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措施和重要抓手之一。二是要积极把握住共享精神标志物和民族形象的话语权。创造出可以共享的中华民族精神标志物之后，还需要传播和使用，如果只是传播不加解释，那么精神标识物的作用就会被削弱甚至消亡，更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解释和传播。因此，只有在塑造精神标志物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住其内涵的解释权，才能较好地避免不同民族理解上的差异，真正让共享精神标志物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三是要大力做好精神标志物的传播工作。不仅要以感性化的方式入手，通过情感共鸣将精神标志物传递给各族人民，也要注重信息投放的平台和数量，要结合新媒体的各种渠道，尽可能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加精神标志物在各民族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四是要选取并且创造适宜的精神标志物载体。人们对于自身具有心理倾向的事物有较高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因此，共享的精神标志物一定要定位到一些生动、形象的载体上，比如，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含义中“团结”“家国情”等精神文化符号，都能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在思想感情上都能实现更加广泛的认同，最终凝练和创造出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标志物。

（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要用共同的价值观来引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力量的强大精神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价值引领作用。因此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内化成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指引。一是要在宣传思想文化方面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观念，不仅能够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而且成为文化繁荣的根本价值前提。所以，要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精神，不断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与此同时，要注重公民思想道德修养的提升。思想道德是公民文化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培育好公民的思想道德，对于提升社会整体的精神文明具有积极意义。二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输出。思想文化的来源就是社会生活本身，想要综合表达各民族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等情况，就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表达和输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鼓励民众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只有让具有感染力、正能量且深受群众喜爱的各种作品广泛传播，才能让各民族人民体会到自身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人，进而更深刻体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和意义，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和发展。

责任编辑：杨松禄

“共同体”的书写：滇缅公路文学与 “中华民族意识”觉醒

彭春瑞，李心澜

摘要：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标志性符号之一，因为其重要的地位成为抗战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在文学工作者的创作下，出现了民谣体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游记等滇缅公路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歌颂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勤劳勇敢精神和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将滇缅公路意象化，激励云南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外敌，追寻中华民族的自由。在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滇缅公路文学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重任，其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书写必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滇缅公路文学；中华民族意识；共同体；文学书写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2-0065-07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一时之间，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不仅谱写了救亡图存的英雄诗篇，亦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民族本位”的抗战文学应运而生。对此，罗家伦曾深有感触地说，抗战激起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性，而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为洪水所不能湮灭，烈火所不能焚化，武力所不能征服”。^①在“民族本位”文化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借用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纪实文学等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抒发自己的民族情感。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加速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历史上，“中华民族”的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各族人民普遍认同，在时间刻度上经历了三个时期。^②诚然，“中华民族”观念的广泛传播在空间上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过程，这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步步蚕食密切相关。随着东北、华北、华中国土的大面积沦丧，唇亡齿寒的危机感袭来，就连位于中国大后方的云南也未能置身事外。1937年10月，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一大批文化机构随之内迁至西南地区，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也开始扎根西南地区，肩负起抗战建国、启迪民智的使命。

谈到西南抗战，必然绕不开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因其在抗战中的独特地位成为抗战文学书写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道路修筑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基于抗战时期的滇缅公路研究”（2023Y0268）。

作者简介：彭春瑞，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李心澜，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

^① 罗家伦：《民族与民族性》，载张晓京《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

^②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4页。

的重要对象。得益于滇缅公路的修筑,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修路的各族人民,书写了大量有关滇缅公路以及筑路人民的文学作品。在既往的滇缅公路文学研究中,有诸多关于民族团结^①、民族形象^②等主题的探讨,但是学界缺乏对滇缅公路文学书写背后的中华民族意识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以滇缅公路文学书写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滇缅公路文学书写中的“民族主义”立场,探讨文学作品如何将“中华民族”精神具象化,如何将“路”的意象与中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以揭示滇缅公路文学书写在促进中华民族意识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一面。

一、滇缅公路修筑与滇缅公路文学的创作

白山在《血线:滇缅公路纪实》采访手记中说:“你认为,在中国西南,近代以来,最悲壮的事件是什么?”“是修筑滇缅公路。”^③在1937年12月到1938年8月期间,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20多万筑路大军,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成功抢修了一条中国与外部联系的重要运输通道。滇越铁路中断之后,滇缅公路几乎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陆上国际交通线,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命线”。

筑路的代价是巨大的。滇缅公路要翻越横断山脉,横跨大江大河,又途经瘴病区,在当时筑路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工程异常艰苦。据统计,抢修滇缅公路的数十万民工,伤亡人数达万人之多,其中死亡3000多人。^④《云南日报》(民国)曾经以社论《滇缅公路修通了》为题报道了云南各族人民在筑路中做出的巨大牺牲。滇缅公路修筑与维护的背后演绎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正如易彬所说:“筑路本身,乃是一曲‘人间伟大戏剧’”。^⑤鉴于以上原因,滇缅公路为滇缅公路文学书写提供了新的主题和场域,与其相关的各式文学作品在抗战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滇缅公路文学的形式有多种,主要分为民谣体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游记等作品。^⑥这些作品虽然体裁迥异,但普遍表达了创作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歌颂,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诉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第一类作品是用诗歌刻画滇缅公路,以王锡光的《公路是血路》、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和刘楚湘的《滇缅公路歌》等为代表。筑路伊始,王锡光、刘楚湘作为龙陵县和腾冲县的县长,为了动员沿线的各族人民修路,对大家晓之以民族大义,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民众。在滇缅公路的修筑及后续的修缮、保路、抢运过程中都有云南各族人民的身影。后来,作为飞虎队翻译的杜运燮在“血路”上来回奔走,见识了筑路的艰辛和各族人民的家国情怀。上述三人为了纪念修筑滇缅公路这一伟大壮举,缅怀滇缅公路修筑过程中各族人民的牺牲,先后创作了《公路是血路》《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歌》等诗歌。

第二类作品是用纪实性文字记录滇缅公路修筑的恢宏与艰巨。滇缅公路的修筑者和见证者在滇缅公路修筑的前后留下了丰富的纪实作品。作为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全程参与了滇缅公路的修筑,其笔下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详细地记载了滇缅公路的修筑背景、筑路的人民以及筑路的困难等诸多内容,是滇缅公路纪实文学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邢克全这样评价该书:“那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他对战争结局的乐观,正以倾注的热情,将筑路时的工作、生活、

① 赵树芬:《滇缅公路文学中的民族团结书写》,《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82—87页。

② 赵锐:《“西南作家最值得注意者”——论白平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3期,第207—218页。

③ 白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④ 云南省档案馆:《滇缅公路珍档解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22年,序第1页。

⑤ 易彬:《“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第221—235页。

⑥ 赵树芬:《文学中的滇缅公路意象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20年,第3页。

民风、民俗的一些场景和故事，人文化地做了极富诗意的生动记录。”^① 萧乾早年是滇缅公路上的战地记者，他笔下的《从滇缅路走向欧洲战场》记载着经久不衰的民族精神之歌《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滇缅公路开通之后，老舍与曾昭抡曾顺着滇缅公路一路西行，分别创作了《滇行短记》和《缅边日记》，对滇缅公路开通后沿线的经济、社会状况有过详细的描述。近些年来，一些作家重走滇缅路，感受公路遗址，采访滇缅公路的见证者，创作出了《血线：滇缅公路纪实》《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铁血滇缅路：重走滇缅路寻访南侨机工事迹》等一批滇缅公路纪实作品。还有一些关于滇缅公路修筑纪实的文字被统一收录在《血肉筑成抗战路》一书中。以上作品为我们了解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与修筑各族人民的形象提供了多种角度。

第三类作品则以小说、散文形式折射出修筑滇缅公路的艰辛。少数民族作家白平阶 1938 年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小说《跨过横断山》，其后又发表《风箱》《金坛子》《驿运》等相关作品，这些作品被统一收录在《驿运》当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抗战时期滇西各族人民不怕困难，齐心抢修滇缅公路的伟大壮举。身处海外的蒋彝取材于萧乾的纪实文学，著了《滇缅公路上的人们》一书，该书刻画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创伤，以及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抵抗的爱国精神，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危亡的强烈现实观照。

二、滇缅公路文学中的“中华民族”精神

滇缅公路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沿线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此，参与筑路的人民有汉族、彝族、傣族、回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苗族、傈僳族^②等 10 多个民族，他们为了一个相同的信念——“抗日救国”而走到一起，汇聚成了一道亮丽的“全民族抗战”风景线。筑路过程中，各族人民展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引起了滇缅公路亲历者、建设者和考察者的关注，继而将其写入文学作品中。

（一）爱国主义精神

卢沟桥事变后，正面战场频频失利，抗日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领土大面积沦丧，这使得云南各族人民开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重新审视“家”与“国”、“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关系。^③ 蒋彝在《滇缅公路上的人们》一书中提到，尽管以农耕为生的中国人一开始误以为是国家想占用自己的土地，并不想将土地交给国家修路，但是当他们的家人都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下时，这些边疆地区人民的抗日意识终于觉醒。正如书中小梅作动员演讲时所说：“家家户户共同组成我们的国家，每家每户就必须参与保护这片土地……如果我们想要守住这片土地，每个人必须现在就站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④ 于是，以老罗为代表的农民逐渐摆脱封建愚昧的束缚，把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上交给国家，并带领家人参与筑路。同样，滇西地区的各族人民在没有听到“抗战大道理”时，一开始也并不想修路，他们认为辛辛苦苦修路只是让土司享福，直到他们知道修路是为了救国，是为了打败侵略者，才逐渐意识到修好滇缅公路是“中国人的大事”“寨子里家家户户的大事”“我的大事”。^⑤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逐渐意识到除了自己的“小家”外还有更大的“家”，那就是国家。于是，为了响应抗战筑路的号召，很多人来到政府大楼，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要工钱，只想把公路修通，然后从英国、美国把战争

①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 页。

② 上述民族划分标准均以当今民族识别为依据。

③ 宋剑华：《从“小我”到“大我”——论抗战文学“家国”叙事的伦理关系》，《江汉论坛》2020 年第 4 期，第 91—98 页。

④ [美] 蒋彝：《滇缅公路上的人们》，邓丽蓉译，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年，第 31 页。

⑤ 白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2—33 页。

物资运回来,打败共同的敌人。

(二) 勤劳勇敢精神

无论是《滇缅公路上的人们》还是《血肉筑成的抗战路》,这些滇缅公路文学作品都共同揭示了滇缅公路修筑过程中凶恶的瘴疾、汹涌的江水与陡峭的高山对筑路人民生命的无情吞噬。虽然筑路环境如此恶劣,但云南各族人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筑路视为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应尽的义务。正如王锡光作的《筑路谣》所言:“修大路,大建树;凿山坡,就坦途……裹粮携锄怒江边,哪管老弱与妇孺。”^①云南各族人民在“蛮烟瘴雨日复日”的环境下,用自己的“血汗”筑成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修筑不仅要跨越横断山脉,还要在大江大河上架桥。在《风箱》一文中,修筑滇缅公路要经过寸草不生的“猴子岩”,岩下波涛汹涌,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粉身碎骨,然而筑路的青年们却丝毫不畏惧,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难吃的果儿”摘了,这一坡岩石突破后,后面的筑路也就顺畅起来。^②当然,在缺乏先进机械设备的情况下,于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上架桥是十分危险的,在两岸架设钢索的过程中需要人先带着一条绳索游过河,这无异于自杀性行为,但在谭伯英的记录中,这项工作并不缺乏候选人,“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急流中消失……一个人失败后,马上有人顶替他的位置”。^③即使工程技术人员认为没有必要再付出生命代价,后来者仍置生死于脑后,直到将绳索送达对岸。

筑路如此艰辛危险,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云南各族人民依旧把修筑滇缅公路看作是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具体行动。公路修筑期间,时任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与工头和工人们有过多次交谈,“发现他们说话风格很高雅,从没听过一句怨言,从没有任何人说他累了……就是这些人,用这样的方法,将中国的精髓保留了若干世纪;他们是中国最有价值和最丰富的部分——民族的栋梁”。^④

(三) 自强不息精神

在《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中,多次出现了“原始”一词——原始的工具、原始的爆破方法、原始的手工劳动、原始恶劣的环境等,即使如此“原始”,云南各族人民依旧秉持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将自己熟练的技术与古老的工具运用到筑路过程中,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事实上,长达965.4千米、宽7米的滇缅公路全线上铺设的材料基本是碎石,而这些都是靠云南各族人民的双手完成的。这些难以计数的一堆堆石子正是云南各族人民为了建设公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

在云南各族人民得知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为了国家与民族后,公路沿线的各族人民积极响应筑路通令,从远处的家乡成群结队地来到工地上,其中许多人没有被招募,都是自愿来的。许多地方,留在家里的老人、妇女甚至孩子都上阵了。他们都愿意来修筑公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国家大事,推脱不得,人人有份。^⑤许多人在路上和迁徙的途中或死亡或是生病,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中途返家,他们始终士气高昂,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情绪。正是由于他们无穷无尽的忍耐和贡献,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和风险后仍表现出的崇高的持久耐力,才使得中华民族能够按照她的生命路线延续下来。

滇缅公路文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刻画与宣传极大增强了云南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特别是其歌颂了各族人民在筑路过程中所展现的爱国主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伟大民族精神,使得云南各族人民能够识别出一种“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而这种“民族性格”使得个体

① 王锡光:《公路是血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② 白平阶:《驿运》,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页。

③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第125页。

④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第48页。

⑤ 白平阶:《驿运》,第25页。

认同完全沉浸在全新的、民族的集体性文化认同之中。在这块具有历史性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汇聚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各族人民围绕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自强这两大目标而迸发出难以想象的民族凝聚力。

三、“路”的意象与“中华民族”意识

滇缅公路的修筑与抗战局势的恶化密切相关。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的同时大肆屠杀中国民众，把亡国灭种的危险强加在中国人身上，使得身处大后方的云南人民也逐渐意识到必须团结在一起才能保家卫国。正是这份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作家提供了真实的写作对象和丰富的联想主题，使得滇缅公路文学中的民族性得以彰显。文学作品中的滇缅公路，不仅仅是一条联通国内外的公路，更是一种符号象征。它与民族意志、国家期望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抗战建国、救亡图存的主旋律。通过对滇缅公路文学的解读，不难发现，滇缅公路既是一条抗击外侮之路，也是民族自由、民族团结之路，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之路。

（一）抗击外侮之路

日本的全面侵华使得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滇缅公路就是在此背景下的产物。这条被称为“输血线”的公路不仅承载着抗战的战略物资运输任务，而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滇缅公路首先是一条抗击外侮之路，筑路抗战、保家卫国成为滇缅公路文学作品中的首要主题。

在筑路前期，时任龙陵县县长的王锡光就对滇缅公路修筑的严峻形势有过清醒的认识：“东洋倭祸已深入，封我港口占我疆。君不见，兽兵到处嗜屠戮。华北华南尽遭殃。又不见，华东华中成焦土，牛马奴隶俎上肉。”^①此时的中华大地，在日本帝国主义“三光”政策下，早已生灵涂炭。中华民族要想寻得一线生机，驱逐倭寇，就必须坚持全民族抗战，需要源源不断的武器和信念坚定的军队，也需要畅通的对外交通。所以，滇缅公路的修筑极为重要。王锡光任龙陵县县长期间就把修筑滇缅公路当作“最大的要政”来抓。王锡光在《公路是血路》写道“努力打开生命路……驱逐强盗国土复，还我山河武穆志，坚定信念兴民口。”^②在他看来，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他还引用岳武穆驱逐鞑虏收复山河的典故，激发云南各族人民爱国热情，激励人们坚定信念，抢筑滇缅公路，驱逐日寇，收复国土。

滇缅公路的成功抢修，宣告了日本封锁政策的失败。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从滇缅公路入境，有力地支持了全民族抗战，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心理防线”。因此，日本人视滇缅公路为眼中钉，他们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其中惠通桥与功果桥等桥梁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每次轰炸结束后，云南各族人民都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抢修被炸的桥梁，确保滇缅公路畅通。对此，白山在《血线》中颇为自豪地写道：“炸不断的滇缅公路！”^③炸不断的真的是路吗？其实日本人炸不断的是中华民族长期抗战的勇气和决心。

1942年，日本沿着滇缅公路进犯滇西地区，云南成为抗战的前线。日寇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国仇家恨”涌上云南各族人民的心头。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为了挡住敌人的进攻，云南各族人民又要怀着沉痛的心情“亲手毁路”。破路工程之迅速，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决心之坚强。白山感慨道：“在这条抗战血线上……有中华民族为抵御列强的侵略而谱写的不可泯灭的悲歌、气壮山河的壮歌。”^④

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历史选择，古老的中华民族也因为滇缅公路的

① 王锡光：《公路是血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② 王锡光：《公路是血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2页。

③ 白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8页。

④ 白山：《血线：滇缅公路纪实》，第285页。

修筑而焕发生机和活力。彼时的中国，外族入侵，家园和同胞惨遭蹂躏，基于一种“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意识被激发出来，其不仅贯穿在滇缅公路的整个修筑过程中，更在滇缅公路文学书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滇缅公路文学的书写表明，滇缅公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尊严，它是中华民族抗击外侮、保家卫国之路。

（二）民族自由之路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就一直在追寻民族自由和民族独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陷，沦陷区的人民成了“亡国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殖民统治更加坚定了中华儿女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决心。特别是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20多万云南各族人民齐上阵，不畏艰难，短短9个月就促使滇缅公路顺利通车，如此壮举成为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自由的一个缩影。随着滇缅公路的修筑，滇缅公路文学作品中展现了许多关于自由的内容。

杜运燮这样描绘滇缅公路：“这是不平凡的路，这是不平凡的人……挥动起原始的铁锹，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①然而，实现自由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于修筑滇缅公路的各族人民来说，他们需要“穿过高寿的森林与期待，经过万千年风霜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神秘如地狱的疟蚊与大本营”……^②滇缅公路艰苦的修筑环境并没有压倒中华民族追求自由的决心，反而使得中华民族更加坚韧与英勇。

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杜运燮笔下的《滇缅公路》既是写实，也是写意。杜运燮在诗歌中将筑路过程中遇见的“激流”“海风”“云流”“鹰”“水流”“星月”“鸟儿”等事物记录下来，赋予它们“自由”的内涵。他还用“日出”“地平线”“一个新世界的到来”来隐喻未来自由美好的新生活，以此激励筑路中的云南各族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的自由而不断奋斗。谭伯英在《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中描绘了白族妇女白天劳作、晚上到工地上筑路的场景，按理说应该是极为劳累，可这些妇女们却边歌唱“太阳、月亮和江河”边干活。不难理解，自古以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就是自由的象征，白族妇女歌唱它们，就是在歌唱自由。一首首悠扬动人的歌谣，表达了筑路人民对自由的强烈向往。

滇缅公路的修筑因为有中华各族儿女参与，才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希望。反过来“路永远使我们兴奋，想纵情歌唱”。^③蕴含着自由意境的诗歌回响在滇缅公路沿线，充分点燃了公路沿线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滇缅公路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唱的那样，是云南各族人民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它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追求民族自由与民族独立的康庄大道。

（三）民族团结之路

滇缅公路的快速通车，是云南各族人民爱国热情与艰苦劳作的结晶。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虽然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肤色，穿着不同的服装，但是他们都有着保家卫国的信念，他们为着同一目标而紧紧团结在一起，并在滇缅公路修筑及后续维护的过程中，形成了密切联系、互相帮助、相互拱卫的民族关系。因此，滇缅公路的修筑在战争之外的意义也是显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团结。^④

滇缅公路在抗战中加速了云南各族人民力量的凝聚。在谭伯英看来，滇缅公路的修筑将一个孤立的乡村联系起来，“对于公路所要经过的地区的不同民族来说，为了修路，他们不顾相互之间有多么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而走到一起来了，这些完全不同的民族尽可能地友好地生活工作一起，任何民族的矛盾和冲突都未曾发生过”。^⑤在筑路过程中，汉族群众中懂得筑路知识的

① 杜运燮：《滇缅公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3页。

② 杜运燮：《滇缅公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4页。

③ 杜运燮：《滇缅公路》，载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第214页。

④ 贾国熊：《抗战时期滇缅公路的修建及运输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100—105页。

⑤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自序第1页。

人稍多一些，所以他们教傣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青年测量、打桩、打炮眼等技巧，用傣族同胞的话来说“这段路的修成是把我们傣族和汉族老大哥的血汗浸透在一起了”^①。

得益于滇缅公路的修筑，公路沿线的各族人民开始从乡村里走出来，他们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行为让人们对于筑路的各族人民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作为修筑滇缅公路的负责人，谭伯英记录和刻画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形象，比如佤族（彝族）爱歌唱，简朴又坚强，工作很有效率；傣族女孩天性善良，具有崇高的精神，能够竭尽全力工作等。在谭伯英看来，滇缅公路之所以能够快速通车，关键在于参与滇缅公路修筑的各族人民都拥有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真正的精神。^②

滇缅公路的开通又促进了公路沿线的经济发展，出于经济交往的需要，各民族互通有无、相互交流、相互信任，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通婚联姻也多了起来，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巩固与发展。在后续的抗战保路过程中，滇西各族人民勠力同心，与中国军队协同作战，最终成功击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恢复了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无论是一开始的道路修筑还是后面的滇西杀敌，随着云南各族人民团结意识的增强，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和无私奉献下，日本帝国主义节节败退，而中华民族的复兴则迎来新的曙光。

近代以来，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在云南地区成功开辟了连接国外的滇缅公路，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封锁。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该路俨然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生命线”。云南各族人民尽管在“筑路”“保路”“破路”“复路”之间历经饥饿、疾病、死亡等多重苦难，但他们出于追求民族自由的共同使命感而紧紧团结在一起，他们奉献土地、工具甚至是生命，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出一条抗击外侮之路、民族自由之路、民族团结之路，最终成功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因此，滇缅公路更是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之路。

四、结语

滇缅公路这条被誉为“筑路史奇迹”的公路，不仅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为抗战文学提供了新的主题。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滇缅公路文学创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发出了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的最强音。因此，通过对滇缅公路文学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云南各族人民心中的“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汇聚成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勇气与血汗修筑了举世瞩目的滇缅公路。这条路既是中华儿女抗击外侮之路，又是一条民族团结之路，更是一条追求民族自由之路，它记载着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程。云南各族人民在筑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勤劳勇敢与自强不息的精神，是滇缅公路与云南各族人民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与其说是滇缅公路文学书写了中华民族这一主角，倒不如说是云南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行动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③ 在全方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滇缅公路文学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其中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彭勋子：《边疆人民与滇缅公路》，《民族工作》1995年第6期，第46—48页。

② 谭伯英：《修筑滇缅公路纪实》，戈叔亚译，自序第1页。

③ 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求是》2024年第3期，第4页。

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的文化阐释

赵世林，蒋正珊

摘要：运用文化阐释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对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作了分析和总结，认为在历史上形成并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存续着各民族礼俗，并且是在历代国家治理和中华文明传承过程中地方性张力的结果，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融合共生的结果和表现。不论是“儒释道融合型”还是“民间信仰型”，抑或是“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型”，各种类型的礼俗无不体现着中华文明内核和价值体系，都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遗产和整合的结果，其地方性融入的类型表现则是各民族礼俗社会调适的功能使然，在当今具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

关键词：中华文明；礼俗；云南；文化阐释

中图分类号：G1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2-0072-09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全民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①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内核，在传播中华文化在国际的影响力中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中国故事”本身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同属于中国叙事的文化体系，因而“讲好中国故事”，一定程度上就是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的中华文明的文脉故事。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放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设的重要位置。立足于中华文明发展史，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核促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信仰，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塑成了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文化遗产状态。而云南各民族传统礼俗文化从属于中华文明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中呈现出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

现今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趋势和方向，而对传统礼俗文化的阐释与解析是传承中华文明的辅助路径，是让传统文化从“日用而不觉”走向“日用而知”的一种精神内核的凝聚状态。故此，以云南各民族礼俗的社会文化生态和文化遗产体系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地方性融入，深度阐释中华文明的根基及其内涵，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一条属于云南地方智慧的灵感来源。

作者简介：赵世林，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蒋正珊，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一、礼俗是文明内核“日用而不觉” 文化传承的社会实践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在多元文化的共通共生中形塑出兼收并蓄的中华民族，多元的民族、多样的文化、多彩的文明以最为和谐统一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和合”的思想。^①

在中华文明现代体系文化建设中有一条基础主线：以人们日常生活为线索，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和日常生活中实践的礼俗活动是融合了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源流文化基因。礼俗文化的传承性和连续性是中华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综观中国各个民族的传统礼俗，其礼俗的文化内核始终是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有着必然的广泛联系，其深层的原因在于当传统礼俗文化运用到当代社会治理中，“传统文化便凸显出文化价值的一致性与社会发展目标的统一性”^②。

中华传统礼俗文化伴随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厚载根植在中华文明的脉源。各民族共同的礼俗历史的文化记忆和中华文明主体的文化基因共同促成了中华文化传承的社会实践基础。这些礼俗历史记忆与中华文化基因共同汇聚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各族人民所共享的集体记忆，成为人们内心深处与头脑深处潜藏的“日用而不知”的记忆。这种记忆一旦被日常礼俗实践活动唤醒，就必然会引起各族人民强烈的心理共鸣，这个过程也必然形塑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性依附与认同。与此同时，这些记忆和观念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处理和具体运用，都是文明观和价值体系的传承和生活化实践。

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的依托归属，也是各民族传统礼俗活动传承的精神家园，其文化传承的本质是基于各民族礼俗活动的理性实践与各民族精神信仰的感性文化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是文明共同体。^③以中华民族为主体核心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发展，呈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包容性、开放包容与兼容并蓄，而各民族礼俗活动的日常生活的融入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填充了文明的具体内涵，同时也夯实了中华文明延续的根基。云南各民族礼俗所表现出的文明内核也从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脉络。赓续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通过礼俗活动存续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调适的实践，也是通过礼俗活动阐释的一种当代理论的地方性经验及文化实践启示。

二、云南各民族礼俗传承中华文明的社会机制

云南各民族的礼俗活动是根植中华文明的主体且生长于云南地方性社会的土壤中的，它是地方性传统社会的生活节奏和智慧与时代发展的文化产物。同时云南各民族礼俗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主体中多元的地方本土文化鲜明的特色，是地方社会传承中华文明重要的社会机制。

（一）历代中央王朝的国家治理实施

云南属于我们西南边陲地区，向内行政统属于中央王朝，向外与东南亚形成地域联结。在汉武帝设立益州郡之前，“西南夷诸部林立，互不统属”^④。汉朝郡县制度将“西南夷诸部”统一到

① 刘宗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维契合向度——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审视》，《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1期，第42—50页。

② 赵世林：《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与价值伦理》，《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3年第6期，第2页。

③ 青觉、陈林、徐欣顺：《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代文明理路》，《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3年第4期，第41页。

④ 林超民：《从“西南夷”到“云南人”：云南多民族文化认同的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84—185页。

中央王朝集权管理体系之中,就此也逐渐推动了云南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到了唐代,国力昌盛,包容并蓄,加之对外交流频繁,中央王朝统辖一度拓展,故而下放一定政权在云南地域内,成立了南诏大理国。虽享有一定独立管辖政权,但南诏大理国仍然属于中央王朝集权管理体系,而且向中央王朝朝贡等,经济、文化交流也从未间断。进入元代之后,中央王朝开始以军事规划为主,向云南移民,元世祖平定云南,并建立了云南行省。明代开始,中央王朝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官方移民屯兵的形式,将大量汉族迁入云南。明代的移民,主要由军事移动带动行政职能安置、流放和商贸的人口流入,其数量规模 and 影响都远远大于元代,“使得当时云南汉族的人口开始超过云南本地的少数民族人口,继而汉族成为云南地域的主体民族”^①。清代,“改土归流”虽在持续推进,但是移民人口的迁入已经不限于明代政策的导向作用了,而是从经济贸易的层面形成了一种自发式的汉族人口迁入使致,清代成为云南历史上外来自主移民最多的时期。^②

纵观历史上中央王朝对云南部署的国家治理策略,不难发现,从“西南夷诸部”的少数民族林立,到屯兵移民汉族人口大量迁入,在云南境内形成汉族人口超过少数民族人口的逆转,背后带动着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大融合,也带动了儒学在云南地区的发展。

(二)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遗产及影响

基于中央王朝的国家治理的策略,元代开始至明清时期兴起的云南境内的军事移民,随着人口的流动,还带来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传播。元代即开始在云南“创立孔庙学堂……文风稍兴”^③,现存规模完好的建水文庙就是始建于元代。同时,元代也开启了科举制度。但由于土司制度管控,儒学并未在元代形成主流意识。到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和大量汉民的迁入,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得到了传承和普及。先是明代,中央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儒学,开设圣谕坛,宣讲圣谕,广设学府,兴科举”^④。后有清代改土归流统治的持续影响,以文庙书院为主的儒学下沉普及更多地普通民众,使得云南的多民族文化通过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全方位的归属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主流的脉络中”^⑤。

云南“华夷林立”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多样的特点,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的浸润,使得各民族庞杂丰富的文化找到了倚靠的主体。在云南各民族文化融合和凝聚的过程中,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为各民族文化的再创造和更新奠定了主体的基石,并且增强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主体性认同。

(三) 大一统意识和中华民族观念的不断强化

在中国的社会语境中,“礼”与“俗”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话语形式。^⑥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礼”与国家政治结合成为一种文化制度,是有着一个逐渐联合的过程的,“俗”则在地方生活的运作中出现民间“微政治”的多种社会形态。以此为基础,在中国社会悠久历史进程中的“礼俗互动”起到了维系国家“大一统”与地方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作用。^⑦《刘子·风俗章四

①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② 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39—540页。

③ 龙云、卢汉修,周钟岳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8页。

④ 周大鸣:《云南移民与儒学发展》,《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第67—74页。

⑤ 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06—113页。

⑥ 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济南:齐鲁书社,2019年,第1页。

⑦ 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第8页。

十六》言：“风者气也；俗者习也。……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①可以看出礼俗是与人们生活的地方环境紧密相关的。地方区域礼俗的兴起、发展以及整合流变都是地方社会治理价值层面的外化，是一种礼俗伦理道德层面的社会集体意识和社会秩序的共同维系，在国家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中都发挥了积极向上向善的引导作用。

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共同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它是具有中国特色原生性且自成体系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从人类发展文明的初期，四大文明古国发源地到现在以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尽管中华文明在绵延的过程中经历了起起落落，但是它至少已经延续了五千年，并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且延续至今的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的国家。^②由此可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的国际形势中，中华文明是持续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而中华民族正是践行旺盛生命力的主体民族。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长期稳定的发展，得益于中华文明内核中的文化感召力与精神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塑成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共同体形成、持续稳定发展以及进一步夯实赓续的动力源泉，并且立足于现代中华文明的历史新时期，形成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凝聚。

（四）中华文明赓续中的地方性融入

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包容与气度滋长了中华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丰富与充实，而云南各民族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礼俗活动是构成中华文明的地方性融入，也是从属于中华文明传播体系和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方实践。在国家治理体系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体系中，云南各民族日常礼俗实践活动是在中华文明的文化共同体中呈现了一种区域性互动与主体性的社会凝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标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的宝藏。”^③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基石^④，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赓续建设形成了凝聚文明内核的格局。文化认同是社会力量凝聚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传承的历史与民族文化多元性传承的发展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赓续的可持续性路径。立足于现阶段中国化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思维的现代化基础，始终与各少数民族形成民族互嵌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体关系。各个地区少数民族的礼俗文化实践是与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同频共振的文化事实和故事经验。云南少数民族礼俗活动凝聚的文化事实是在促成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这种赓续性的传承与发展是弘扬中华文明展示地方特色的外宣形式，从而形成畅连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

三、云南各民族礼俗的生成及表现特点

云南各民族礼俗主要的表现特点总体呈现出三种类型：以汉族和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等为主体的“儒释道融合型”礼俗、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间信仰仪式型”礼俗和以傣族、布朗族等为主体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型”礼俗。

（一）以汉族和藏族、彝族、白族、纳西族等为主体的“儒释道融合型”礼俗

“儒释道文化融合型”礼俗是建立在儒家、佛家以及道家的文化之上的，儒家文化讲究孝悌忠

① [北齐]刘昼撰，杨明照校注：《刘子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197页。

② 姜义华：《何谓中国》，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第45页。

③ 习近平：《把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第1版。

④ 刘宗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维契合向度——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性审视》，《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1期，第42—50页。

信,释家的佛教文化则关注世间万事之间的因果报应,道家则是崇尚人世间阴阳相平,儒释道三种教义之间紧密相涉,共同搭建起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三个基点的根基。在南宋孝宗赵昚提出“以佛修心,以儒治世,以道养身”^①之后,儒释道才从跨文化的冲突走向“三教合一”的和谐共存,进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核。中华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种文化延伸形成了各自领域的秩序与作用,其中儒学主要是在人们生活的世俗领域发挥着政治功能的作用,佛家主要限定人们的精神领域并发挥作用,道家则主要在身体领域发挥作用。^②儒、释、道在各自的领域、具体场景以及时空流转中发挥着作用,逐渐在每一个国人心中内化为个体的心灵之治与人生观,在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中形塑而成了日常实践活动中普适的文化标准,故此,成为一种人人都能够践行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模式。

中华文明历史上民族交往流动的频繁,尤其是元、明以来随着大量的汉族迁入云南境内以及边疆等地,儒家传统的礼俗文化在云南边疆地区普及开来。文庙为儒学的推动提供了一个庙学身份的场所,而其作为儒学的教化空间,同时兼具中华文明传统文化的象征教化功能,其中云南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建水文庙就是典型代表。建水在南宋以前称为临安,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灭掉大理古国之后,次年设置建水千户,此后才改名为建水州。^③元代推行军屯制,“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当时官员及其家眷等大量迁入云南并逐渐重视教育,兴起了后世教育事业的发展之风,修建起了文庙。建水修建了文庙之后,一方面通过庙学教育的形式推动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同时使得儒家思想在云南各地区得到了相应的传播,而这种文庙教育空间的场域承载性也在庙学的教化普及中潜移默化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建水文庙是除孔孟之乡“曲阜”之外,规模最大的地方性文庙。在文庙内完备的庙学课堂、碑文以及牌匾等符号性物质实体,强化了文庙象征的政治性空间,也促使儒学思想与边疆地区社会融合与互动。文庙承载着儒学在红河州的推动,在云南建水、石屏以及元阳一带出现了“彝族孔姓”的文化融合的特殊实践。建水县管厅镇大凹子村则是这种文化融合的典型例子,人们不仅遵从“孔姓”,而且还非常严格地按照孔子后裔的辈分给家族的人员冠以“孔姓”的族谱名字^④。关于“彝族孔姓”这种特殊的转变,其背后实际上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地方性向中华民族的主体性靠拢的实践,是儒家礼俗熏陶下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地方性融入范式。

文庙作为一种建筑实体,承担了“儒释道文化融合型”礼俗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具象承载的象征功能,而洞经音乐作为礼俗仪式展演的一种艺术形态,则丰富了云南少数民族雅俗共济的日常生活。在云南的白族、纳西族、彝族以及壮族和汉族中流行着这种各民族共享的传统民俗音乐艺术事项,所谓的西南地区的“洞经音乐”事实上是一种源自古代中原汉族地区道教仪式中的科仪音乐。原本的演唱乐器以及道教仪仗比较多,同时由道教居士配合着乐器领唱科仪经文,而后在明清时期在“以汉化夷”的统治过程中,推广了这种具有日常生活展演的“儒释道文化融合型”礼俗,将道教音乐与礼制音乐以及一些汉族曲目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进行了民族地区在地化的文化融合。^⑤洞经音乐在云南白族、彝族、纳西族以及壮族的许多地方都有流传,但是其在各民族各个地区之中又有所不同与细微差异。现今洞经音乐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理地区保存得相对完好,是儒释道文化融合中三教相融的典范。洞经音乐分为固定时间和非固定

① 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043页。

② 赵立敏:《文明交流与互鉴何以可能?——基于差异性、亲和性与功能分区的实现路径》,《中国文化与管理》2023年第1期,第217页。

③ 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水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个旧:个旧市印刷厂,1999年,第27页。

④ 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建水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4页。

⑤ 邓启耀:《以乐合心:生活世界的礼俗和鸣与文化认同》,《民族艺术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0—120页。

时间的展演,固定时期一般是农历计时关于观音以及孔子的诞辰等,而非固定时期则是办寿贺喜或宗庙祭祖等临时性的活动。^①在释家、儒学的文化场域背景中,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会”和腊月初八这两个传统节日呈现儒学文化熏陶的洞经音乐。在佛学文化场域中,民间认为观音有三姊妹,所以一年中也有三次观音会,分别在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以及九月十九,这几日的观音诞辰是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洞经音乐的演奏与传唱。而在道教文化场域中,玉皇会、地母会、本主会、关圣会等这些具有道教文化内涵的神灵所对应的生辰作为洞经音乐庆贺的主体对象。洞经音乐以其独特的科仪音乐艺术性,在云南各个少数民族中呈现出一种地域性,并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将佛教、道教以及儒学进行在地化的地方性融入发展而成为“儒释道文化融合型”的礼俗。

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在云南各民族地方人民的实践中得到了夯实,“儒释道文化中‘道德教化’中的‘教’,偏重扬善祛恶,崇尚优良的道德风气”,^②因此,儒释道的文化所形塑出来的教化功能也成为“儒释道文化融合型”礼俗中最核心的表现形式。于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而言,儒、释、道三家各自之间的张力在相互融合之后,得到了更多转移的出口,从而消解了不同文化体系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尖锐之势,使人们在儒、释、道融合过程中得到了更多思路支撑,中华文明具有了创新、包容以及和谐的特质,进而致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

(二) 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间信仰仪式型”礼俗

在中华文明的传统文化中,民间信仰是与人们日常生产劳作息息相关的一种情感慰藉,也是关乎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一种信仰礼俗,既包括自然崇拜和多种信仰,也涵盖着“道法自然”“崇尚生命”的中华民族的价值和人文观念,是具有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人类文明起源的人文关切。

民间信仰形塑的文化是一种民间普遍存在的,是具有自主性和自发性的情感寄托与崇拜的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也涵盖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神灵崇拜行为观念与仪式习俗的信仰文化现象的礼俗活动。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民间大部分存在着对神灵、鬼魂与祖先的信仰,主要有神灵信仰、祖先信仰、图腾崇拜以及自然崇拜等主要形式。故此,“民间信仰仪式型”礼俗主要是依托云南各地的民间神灵与祖先的信仰,并与各个民族之间特有的文化现象相融合继而形成文化传承型的礼俗。

少数民族原始宗教大都形成一种万物有灵的共识,认为在自然界中灵神无处不在。作为山地民族,彝族常年与山打交道,在他们的观念里山是神的化身,也是神灵的住所,更是通向天界的路径和撑住天的柱子。^③彝族认为传统狩猎、耕牧等生计方式都是由山神负责管理的,“在正月初二、正月初三的时候,必须要祭山神,山神管耕牧,山神管狩猎,山神管买卖,需要备好祭献品,祭献山神爷”。^④人们由这种生存需要的依赖转向精神需要的信仰依赖,山神既是给人类降福的神灵,又是能宰制世间灾祸的神灵,故此形成了关于山神想象的崇拜。关于山神的想象并不限于山神,在这种山神民间信仰体系中是与树神以及林神联系在一起的。石林撒尼人在祭祀土地时,是将山、树、林视为一个整体一起祭祀的;中甸的彝族则常将山神与树神看作一个整体,祭祀通常在两棵大树间进行;而麻栗坡一支的彝族,附近各个村寨都有一个自己村子的神山,人们也会选择山上高大茂密的毛木树作为祭祀的神树。树神成为彝族山神崇拜的主要实体性祭祀的象征物,

① 伍国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白族音乐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89页。

② 牟钟鉴:《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③ 杨甫旺:《彝族文化的融合与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页。

④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古籍研究室:《彝文文献译丛(第21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1998年,第34页。

宣威一带的彝族将开过光的神树认作龙树,以示人丁兴旺和六畜兴旺;新平附近的彝族将神树看作民族英雄阿龙的象征,在“咪戛豪”节时要向神树献祭;而弥勒的彝族支、峨山高平彝族支则会把神树认作祖先的化身象征物,各个家族向自家认领的神树献祭。

不单单是彝族有神灵无处不在的观念,纳西族人民也信奉万物有灵,认为山川大地与日月星辰,包括动物灵长都是“有灵之物”,并与藏族苯教以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结合后形成了东巴教。东巴教是多种文化融合碰撞的产物,故此,在纳西族东巴教的文化礼俗活动中存在多元的信仰仪式活动。纳西族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视作自然崇拜的象征物,尤其认为天和地是人们生存的主要空间同时也是自然崇拜的实物依托。纳西族东巴教最为重视的就是祭祀孜劳阿普这个天神的“祭天节”。天神是纳西族心中富余、繁衍和长寿的象征,并且与纳西族人民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这种祭天的自然崇拜与母系的祖先崇拜也密不可分,天神孜劳阿普诞下的女儿被视为纳西族的女性祖先,并且在纳西族的“走婚”习俗中形成的母系繁衍,致使在“祭天”仪式中出现“舅父”形象占主导的情况,以示母系为重、舅父为大的礼俗特性。此外,拉祜族也信仰原始宗教和多神崇拜。“厄沙”作为拉祜族心中最大的神灵,创造了人类存在的宇宙并宰制着万物及人类的命运,而“尼”神则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掌握着保护和灾祸人们生存的权利。所以在拉祜人心里,“厄沙”被供奉在村寨附近的原始森林中,而“尼”在分管自然的“厄马”(地母鬼)、“厄尼”(水鬼)、“哈尼”(石鬼)等场景,以及分管生活命运的“比那”(头晕鬼)、“那苟尼”(肚痛鬼)等场景中被他们日常供奉起来。^①勐海的拉祜族还会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举行“叫谷魂”仪式,澜沧一带的拉祜族每逢初一、十五都会以寨神为对象具象“寨心节”。作为传统耕种的稻作民族,哈尼族认为自然万物中有很多超自然力量并存在着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会影响或加持他们的劳动生产活动。因而他们在插秧前进行“换龙巴门”,又赶在谷子出落前举行“栽谷年”,等到谷子要丰产时又进行一次“别我涅”^②,收割稻谷前要“吃新”,待到集体打谷子的时候又有不准予告外者的禁忌,以免谷魂惊走等,围绕着稻作生产进行一系列的礼俗活动。景颇族也在万物有灵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根据不同的功能、等级和类型将“南拉”(鬼魂)分类归属祭拜,特别是在“目瑙纵歌”的时候,以“董萨”为礼俗的核心人物展开讨好各种鬼神的礼俗活动。

自有民间文化持有主体产生的关于世界万物神灵的观念,其实质是一个民族自我应对生存生活场景中灾福的一种想象,借由生活和生产场景中的自然物形塑出一种民族自我认同的礼俗活动。礼俗活动一种具有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的社会文化事实,而滋生的民间信仰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再造。

(三) 以傣族、布朗族等为主体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型”礼俗

佛教在云南被分为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三个派别,其中南传佛教也被称为“上座部佛教”。^③上座部佛教由印度本土发起,向南部斯里兰卡以及缅甸、云南等地传播,所以也被称为“南传佛教”,在巴利语叫“Theravāda”。thera,意为“长老、上座”,是南传信徒的自称;vāda,意为“说、论、学说、观点”。^④南传上座部佛教一千多年前传播流入我国,仅在西双版纳、德宏以及临沧和普洱边境一带独有,中国也仅有云南独有。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云南边境各个少数民族中也滋生和衍生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融合型的礼俗。

① 杨知勇等:《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173页。

② 一种围绕着稻田里的害虫进行捕捉的礼俗活动。

③ 和光翰、和少英:《金平傣族多重信仰文化探析》,《民族学刊》2020年第1期,第72页。

④ 陈明勇等:《中国南滚河亚洲象保护的民间知识与文化传统研究》,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第131页。

傣族的礼俗所表现出的，虽然是南传佛教融合的特点，但傣族的民间信仰早在佛教传入前就已经存在，这已被傣学界所公认，其中的民间信仰则传承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道德观、价值观，也表现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佛教传入后，两者融合，形成了傣族、布朗族以及部分佤族等两佛文明融合共生的文化景象。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偏爱水，他们认为水是生命之源，并且是通过本民族特有的节日可以祛除污秽的圣洁美好之物，是吉祥的寄托。傣历的六月^①是傣族新年伊始的时期，人们会在新年历相互泼水以示祝福，所以傣历新年又叫“泼水节”，也叫浴佛节。在南传佛教中，泼水节也是佛诞节，是纪念释迦牟尼诞辰的节日，这种以熏香水泼浴佛身的礼俗逐渐在东南亚各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仰地区流传开，继而形成了傣族人民隆重的泼水节。事实上，在浴佛信仰文化礼俗的背后也潜藏着傣族人民在生产劳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对大自然的认知。西双版纳地区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日照充足，有着明显的旱、雨两季。雨季到来的时间节点和雨季降水量的大小都直接地影响着当地生产劳作的收成。故此，傣族人民泼水节隆重的礼俗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从情感上祈求神灵的庇佑。此外，由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衍生的“开门节”“关门节”以及“滴水”祭祖“赕佛”，“赕塔”等文化礼俗仪式活动也是傣族重要的传统节日。身处滇南、滇东南的布朗族也与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傣族一样，开展一系列以“赕”为主的礼俗活动。其中“升和尚”，又称为“赕鲁皎”或“播帕”，就是布朗男性教化修行一段时间的一种礼俗活动。男子七八岁之后就以“科永”预备和尚的身份入寺学习一些经文、教义等，等到具备升和尚的资质时，就要邀请亲朋好友来见证隆重的“播帆”仪式。除了傣族和布朗族，临沧南伞和镇康一带的佤族也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他们虔诚地相信自己通过“赕”能够为自己积攒功德，消灾免难，因而在他们日常生活中也都流行“赕”这种礼俗仪式活动。

南传上座部佛教融合型的这类礼俗作为滇南地区少数民族集体共享的特殊事件，以它稳固的精神内核来实现对滇南地区多个少数民族的吸引，礼俗精神在生活中自然形塑成凝聚群体和组织心理保障。

除了以上三种表现风格明显的礼俗之外，在云南地区的藏传佛教也是融合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其表现特点是在云南藏区的回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也与当地地方特色和儒学文明相融合，在一些礼俗和文化上具有中华文明的特点，并以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为内核，与之融合共生的。

四、云南各民族礼俗的社会调适和社会治理功能

礼俗文化的表征体系，包括仪（行为）、义（观念）、器（物质符号）、场域（如宫庙建筑、山林、祭场等）等要素构建起来的话语、观念、行为以及符号体系的外显的物质化表达。^②事实上，礼俗活动的场地、器物、仪仗每一个体系都是需要人的参与，人才是礼俗活动的实践操持者。当我们以操持者主体的视角来看待礼俗活动时，就形成了一种以参与者身份疏亲分离的圈层结构，借由这类礼俗活动进而在无形中促成了不同民族、不同亲疏关系之间社会交往的事实，进而形成一种以礼俗为导向的社会调适和社会治理功能。

俗话说：“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三月街”是白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在《云南通志》中载：“观音市，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各省之货。自唐永徽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③到了宋代的大理国时期，“三月街”更是成为我们西南地区最大的马匹、药材交易中心；明清时

① 一般在公历的四月。

② 韩若冰：《礼俗同构与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价值》，《民俗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5页。

③ 杨镇主：《白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期,“三月街”规模不断扩大,辐射东南亚周边国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①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开始,往后七日都是“三月街”礼俗文化活动的重要时段。白族人民精心准备的这个“三月街”盛会是体验大理白族风土人情的理想时间段,白族人自身也会邀请临近的亲朋到大理,而“三月街”礼俗活动本身也吸引了不少的外地游客和客商前往。可以说白族“三月街”以传统礼俗节日活动为纽带,实现了白族自身与亲朋之间、白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以及大理白族常住民与过往游客之间几种亲疏关系融合型的社会交往事实。

明清时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的中央集权治理措施之后,在云南逐步形成“汉夷交融”的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传承趋势。特别是汉族的宗族谱牒文化在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等民族的文化中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云南腾冲地区明清时期属于军政管辖大量军户为单位的移民迁入,并且移民后裔很重视修缮家谱,把汉人宗亲社会的一系列礼俗活动融入当地的文化之中,^②所以腾冲地区普遍存在宗族祠堂的宗族组织关系。在宗祠中“天地国君亲师”的祖先崇拜使得宗族会制定一些内部规范,在地方社会治理中起到宗族规范的教化和劝诫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处于一个自主层面的规范。这种家族的规范能够从道德层面填补一些国家法律层面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的缝隙,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在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都处在有序和相互补充的管理体系之中。

结语

本文揭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礼俗实践活动的类型过程和一般规律,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以及表现形式,展示了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具体而生动的表现,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勃勃生机。在当今我国处于“两个大局”的深刻变革之际,对云南各民族地区礼俗活动的解析是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也是对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深刻认知,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力量的夯实和滋养。在云南各民族维系社会运行中,本文揭示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礼俗实践活动的类型过程和一般规律,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以及表现形式,展示了其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中具体而生动的表现,同时也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和勃勃生机。在当今我国处于“两个大局”的深刻变革之际,对云南各民族地区礼俗活动的解析必将有助于激发人们的文化自信,从其中精神内涵和价值层面加深对中华文明文化基因的深刻认知,必将有助于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力量的夯实和滋养,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正因为云南各民族礼俗在价值和精神层面与中华文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源”和“流”的关系,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社会的整合作用,所以在云南各民族维系社会运行中,礼俗文化活动的传承是推进民族地区社会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的社会主体实践,这种实践和中华文明传承阐释,既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工程所必须,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必将为民族地区推进中华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杨旭恒、罗宁:《云南新旅游风物志》,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34页。

^② 陈艳、尹建东:《明清时期腾冲坝区的移民开发与“边汉社会”生成——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4年第1期,第138—139页。

有“血”有“肉”的文艺：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金永梦

摘要：艾思奇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其作品除了大量的哲学经典还饱含对文艺的看法。艾思奇认为优秀的文艺是有“血”有“肉”的，本质上是现实的反映，特征上是艺术性和真实性、永久性和政治性的矛盾统一体，内容上包含“现实的形象、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情”三个要素，鉴赏上经历“直观、研究、正确的直观”三个阶段，前途上聚焦“组织、形式和思想”三个核心问题。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表明了文艺作品要积极为政治服务，指明了文艺创作的前进方向是“大众的、现实的、民族的”，明确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是表现民族的活力、启发民族的觉悟、提高民族的自信，阐明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路径是“从具体性的道路上去取得一般”，对当代文艺工作者如何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品鉴者如何把握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关键词：艾思奇；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血”有“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81-08

“人类认识现实的工具，是科学理论和艺术、文艺。”^①文艺是文学艺术的简称，泛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等文学艺术作品。弗·恩格斯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②。文艺来源于社会生活，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艾思奇的文艺观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有益观点，认为文艺不是纯粹政治的宣传品，更不是自由感情的宣泄物，而是民族的、大众的、现实的产物，它是有“血”有“肉”的。艾思奇强调，“那血与肉是作为必然性和一般法则的血与肉的，血与肉若只是空空的躯壳，在里面若不包藏着必然性这‘魂’（亚里士多德），那你就写得怎样亲切又有味，活跃又真实，只不过是零碎杂凑的记事文罢了（但优秀的记事文，也有作为现实之反映而以一定的必然法则之内藏成为艺术作品的）。”^③可见，文艺展现的具体事例包藏了必然性法则和一般性法则的“血”“肉”，因着必然性的“魂”所以鲜活。

一、艾思奇关于正确把握文艺本质与特征的观点

艾思奇指出，“永久性是最重要而迫切的问题，因为它与政治性（从广义上解作宣传教化的作

作者简介：金永梦，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文化史。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用)有着矛盾。对于这矛盾的把握怎样,与文艺的本质之理解有着莫大关联。”^①艾思奇在《现象·本质》《文艺的永久性与政治性》《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等文章中,论述了文艺本质是鲜活的现实,具有艺术性和真实性、永久性与政治性的特征。

(一) 文艺的“血”“肉”基础是现实生活

艾思奇认为,文艺的本质是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以具体反映现实,且反映的方式总是从特殊到具体、从具体再到一般。天才文艺作品与普通作品之差,在于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内容上更能够抓住具体现实,在表达上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周到地、适宜地将一种必然性从活跃的具体性中烘托出来。艾思奇借海涅文艺作品阐释文艺的本质,认为海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作品不是“纯粹的”“自由的”艺术,而是现实的映照。对于文艺是否全然是现实的映照问题,艾思奇认为文艺作品对于现实的反映总是有限度的。文艺的真实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艺术,它总是反映现实,但文艺创作又限于作者的阶级、地位、素养、生活、嗜好等条件,故而依着自身性质歪曲了现实的形象。“愈是能写出活生生的具体的事实,愈是使那事实活到血肉都看得分明时,愈更能保持其文艺的价值”^②。真正的文艺创造者,有着敢于冒犯“体面”的勇气和一种势必要保持现实主义真实性的刚毅。在真实性的要求下,文艺作品也许会违背创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偏见,把特殊事例描绘为具体的事例,引出生活的一般原则,最大程度地将现实必然性的“血”和一般性的“肉”展露出来。

(二) 文艺具有政治性和永久性

艾思奇认为,“政治性之自身便有永久性的表现”,“永久性只是政治性的一种附属物”。政治性和永久性作为文艺的两对特征,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正如艾思奇所说,“这现实的感受,或常被人说的所谓实感,就是文艺之所以永久的主因。”艾思奇认为,如果政治性解释为宣传与教化作用,那么政治性普遍存在于一切艺术中。不管有意或无意,最极端的艺术至上者,其作品仍然有内心向社会作出某种意义上的告白,其宣传不是为社会的大众便是为阶层的个人,或是教人置身社会,或是教人远离逃避,不管积极与否,其教化、宣传作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如艾思奇所说,“凡一切文艺总是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在一定的政治性的范围里反映着一定量的真实性的。”这是进入永久性问题的基础。一个文艺家不仅仅是个文艺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人。文艺创作者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层,是没有脱离阶级的绝对“自由人”,他们往往创作了政治的文艺。不承认文艺政治性的论争者认为,真正的艺术家们是可以离开政治影响的自由人,艺术是绝没有政治性的。对此,艾思奇批驳道,“但无论怎样像,实际上凡艺术家都没有真的脱离了充满着政治潮流的社会生活的”^③。文艺创作者跳不出阶级的影响完成“自由的创作”。“所谓自由,是有一定的条件的自由,绝不是绝对无条件的自由。”^④艾思奇评价茅盾先生主张的自由限于两点:形式上作家的自由;联合起来争取爱国的自由。“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本来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⑤艾思奇认为,“政治性之自身便有永久性的表现”,正如卡尔·马克思认为永久性是文艺论争的焦点问题那样。艾思奇认为论争者想要剥离政治性和永久性的关系,各执一端的流派想要在其中一端谋求问题的解决,实质上都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们把事务矛盾的本质劈开,夸大一半而丢弃了另一半,终不得拯救自己。艾思奇认为,“政治性是本质,永久性是属性”^⑥,文艺本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0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8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3页。

④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22页。

⑤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4页。

⑥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82页。

身并不在政治与自由相乖离的两端，因为要么限于政治，要么标榜自由，结果就是任何一端都无法解决问题。只有看到文艺政治性和永久性的矛盾统一，才能理解矛盾和解决矛盾。

（三）文艺具备艺术性和真实性

其一，艺术性是鉴赏者借助文艺作品产生实感的过程性产物。“艺术的”常常是脱离现实的文艺家论争的托词，企图论争文艺的永久性源于自由与艺术。虽然“艺术的”撑不起逻辑，但也反映了文艺确有艺术的色彩，这是无论哪一方论争者都必须承认的事实。作为文艺的一种特性，艺术性本身并不包藏于文艺的具体材料之中。“文艺以具体的材料依着一定政治性反映一定量的现实，它自身只有具体性，是在读者与作品的具体性相接触时，艺术性才从此发生。”^①从这一方面说，我们无须借助艺术性这一概念，因为借着具体引起读者之实感的能力本身就是艺术。

其二，真实性是文艺最朴素的特征。“最前进的作者，能抓着最大限度的真实。”^②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独立于意识以外的不断运动变化又相互联系的物质世界是现实的本质，文艺是在偶然和必然、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统一中从特殊到一般能动地反映现实。文艺的真实与哲学的真实有所不同，文艺是具体的真实，哲学是抽象的真实，文艺和哲学胎胞决定了它们是否具有永久的可能。艾思奇认为，文艺得以永久的胎胞在于它不是给人以空洞的抽象，而是将人带入到极度具体的事例中，身临其境地认可事实本身，感作者所感，理解作者不得不如此的希望。这样的环境不管是同时代的人抑或千百年后的人，一旦触及便能走进作者的环境中，就像是自身也现实地感受到作者那必然的命运，产生了特殊的、具体的、活的实感。

（四）文艺是两对特征的对立统一体

艾思奇认为，将矛盾的本质分裂开来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故而形而上学论者只能看到文艺的艺术性和真实性、永久性和政治性的矛盾性而不能看到其统一性。艾思奇指出，“一切艺术，都是为着当时的现在，遂行着一种广义的政治作用的。政治性是本质，永久性是属性，二者的矛盾，便在这样的意义上有着统一。”^③文艺作品与标语传单不同，虽然从作用上来说，积极的政治性文艺作品与标语传单都起着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但在内容上来看文艺作品的具体性体现了艺术感，而标语传单仅限于宣传本身。只有当文艺工作者以千百万人甚至人类的命运作为文艺创作的任务，而极少强调其艺术性时，它的美学和永久性价值才得以体现出来。从两对特征的关系上来看，艾思奇指出，“为要抓稳唯物论的基础，须得使永久性艺术性从属于真实性和政治性的自身，不能把艺术性这东西当做文艺的主要的决定的要素。”^④文艺的艺术性与真实性、永久性和政治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政治性限制了文艺的真实性，文艺的真实性又体现了阶级的政治性，文艺是艺术性和真实性、永久性和政治性的对立统一体。

二、艾思奇关于文艺创作内容包含“三个要素”的论述

艾思奇在1938年3月撰写的《文艺创作的三要素》一文中指出，“文艺的内容，有三个要素：现实的形象、作者的思想、作者的感情。”^⑤这三要素和树的根、干、叶一样密切关联且不可分割。人们要正确了解这三要素的关系，一方面不能将要素加以分裂，如认为思想高于一切的载道派、只要现实形象的朴素写实主义、将感情当作文艺本质的“言志派”；另一方面也不能持平均主义，现实的形象就像树木的根，是长成参天大树的基础。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8—79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5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82页。

④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3页。

⑤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0页。

其一,现实的形象是文艺的创作基础。艾思奇指出,“文艺的形象并不比普通的照相和镜子,一定要照得纤微毕现。文艺所照出来的只是最精华、最重要的、最能够暴露现实的本质的,也就是人们常常说过的最典型的东西。这就是身边琐事的描写为什么不会成为好文艺的原因。”^①艾思奇赞同鲁迅先生对文艺的描述:“我就像一条老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吃的是草,出来的也是草,那算什么文艺呢?那至多只是消化不良的排泄物而已。”文艺要把握到现实事务的中心,虽然每一篇作品描写的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情景,但这情景又能普遍地使读者的一般心情具体化,这就是文艺作品普遍性和深刻性的力量。

其二,作者的思想是文艺的创作指南。艾思奇认为作者的思想即为作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作者的思想是文艺的要素之一,但其不能决定文艺本身,作者的思想能为作者提供选择材料的方法。“文艺的发生的基础虽然是客观现实的土壤,但在这里仍然要反对绝对客观主义。因为在客观的现实基础具备之后,能否把握和支配这客观基础的问题就要由主观的能动作用来解决。这里就有了思想方法的重大任务。”^②同时,艾思奇还明确了要副/部正确看待作者的思想,不可夸大也不可忽视。“所谓思想的方法作用并不是模型作用,它只是一个方针,叫我们先看清楚现实是大体上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至于现实怎样向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要从具体的现实本身中去发现。”^③

其三,作者的感情是文艺的创作活力。艾思奇指出,“但如果夸大了方针作用,就会妨碍真实的反映。单单的思想,还不能够使你深入现实。要深入现实,还要有你的全幅的情感。仅仅用你的思想的骨架糊上了一些现实的材料,还不能够使你的作品内容表现出活力和生命。”^④艾思奇认为有岛武郎关于艺术“真”与“爱”的说法自然是神秘的,但也包含了一些真理的聪明的理论,其聪明之处就在于能够把握文艺现实基础和作者主观感情的统一。“作者的感情并不是现实的生命,但热烈的感情使作者能够有力地把握到现实的生命。”^⑤艾思奇将作者的感情比喻为镜子的明亮度,认为最亮的镜子才能最明白地反映外物,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正如艾思奇所说的,“在我们赞扬热情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原则是不能忘记了的,因此最后我们要切戒轻躁的贫弱的写作。”

三、艾思奇关于积极鉴赏必经“三个阶段”的概括

艾思奇认为,真正鉴赏是积极的,条件鉴赏是消极的。真正的鉴赏不是要人遵从什么样的条件,而是研究怎样克服限制条件,变革推进不完全的条件。正如艾思奇所说,“仅仅依赖这些条件的鉴赏,并不能真正达到鉴赏的目的,只徒自各人不同地抓着种种的假象。真正的鉴赏是要克服了这些限制的条件,获得充分发展现象的一切必要条件。所以,真正鉴赏应该是积极的;而依赖自然生的条件去进行的鉴赏,就是消极的。”^⑥一件作品的艺术本质不会有两样,当它的本质在人们面前充分地展开时,人们对鉴赏的意见应当也是一致的。因此,艾思奇指出,“直观研究正确的直观,是积极的鉴赏过程所必经的三个阶段。”^⑦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1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4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4页。

④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5页。

⑤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86页。

⑥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26页。

⑦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28页。

（一）“直观的欣赏”是读者对具体形象的主观印象

艾思奇认为，“鉴赏作品也就是去认识作品”。具体的形象只有在生动的直观中才能存在，唯有透过直观才能欣赏形象。文艺作品所展现的是具体事例，是现实的感受而不是空洞的抽象。艾思奇指出，“鉴赏艺术和读理论不同，因为前者呈示给我们活生生的具体的形象。艺术把人带到作者自己的生活里，跟着他呼吸同样的空气，看见他血肉的感情和思想的跃动，凡是好的艺术品，给鉴赏者的印象总是逼真的。”^① 文艺作品的内容是直观的，这为直观的欣赏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关于直观的欣赏积极与否，艾思奇明确指出，古典主义、印象主义和对照主义都是消极鉴赏，他们的共通之处就在于从某一角度给鉴赏设限。从立场上来说，印象主义和对照主义用作品以触发主观印象，较古典主义的僵死规律更为进步，但又因其纯粹直观而表现出肤浅性与局限性。积极的鉴赏在印象主义和对照主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体现为直观基础上理智的理解。

（二）研究的助力是正确品鉴文艺作品的必要条件

艾思奇认为，“鉴赏者对于作品的内容必须能够适应”。“鉴赏者如果不能适应作品的内容，也即是说，作品的内容对于鉴赏者不能发生相当的感应作用，则鉴赏的过程就无从成立，而永久性和可能性也就无从实现了。”^② 单纯的直观是不可靠的，要从有目的有意识的研究中去探求充分的鉴赏条件。由于文艺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受所属阶层的影响，故而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是有限度的。因条件限制了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故积极的鉴赏要从研究作者开始，了解作者的创作是立足在怎样一种阶级、地位、素养和嗜好，研究作者所属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以测定作品反映现实的真实内容，品味曲度，正确鉴赏。正如艾思奇所说，“由于艺术反映现实的定义，我们要求研究的阶层生活，研究现实通过了阶层的曲面镜所遭受的歪曲和变形。”^③ 在方法论上，艾思奇认为传统的自然主义提供的种族、环境和时代的总括体已经无法满足艺术作品的研究本身。很多时候，文艺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品鉴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隔阂，这时鉴赏者就必须以研究文艺作品产生的社会状况和时代背景为起点，通过研究来创造充分品鉴的必要条件。

（三）正确的直观是研究基础上的理智理解

艾思奇认为，“不完全的鉴赏会使我们误解了作品的真意”。文艺的鉴赏中，往往会出现千人鉴赏万种评价的情况。这是由于鉴赏者的注意与不注意、关心与不关心直接影响了其对文艺作品认识程度的深浅，而注不注意、关不关心又取决于鉴赏者的立场、生活、地位、修养、嗜好等因素。因此，艾思奇指出，“鉴赏者的地位、生活、修养等决定了鉴赏者个人的趣味，决定了他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方向。”^④ 如果把文艺作品某一环从整个连锁关系中割取下来，它就失去了表现本质的机能。切取的片面现象，它只是孤立的现象，甚至于假象。将片面现象看作本质会使鉴赏者误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其本身就是对文艺本质的歪曲。理想的鉴赏是要能将文艺本质的内蕴充分地展开，但现实的鉴赏往往由于不是每个鉴赏者都具有充分的适应条件，故此文艺本质的展开形象便因人而异。适应的条件越是不充分，展开得越有限。正确的直观，即在研究作者的基础上测定作品中的正确内容，品评作品中的事物曲度。艾思奇指出，这一步骤有着批评家的任务，鉴赏作品必然要对作品和作者加上一番批判。“批评家站在作者与鉴赏者的中间，为鉴赏者开辟出正确的道路；有力的批评家能帮助鉴赏者达到合理的鉴赏。”^⑤ 艾思奇提倡站在作者地位之外去观察，在研究基础上，批判家对于作者的认识常常比作者自己清楚。“因之，要达到正确的鉴赏，鉴赏者对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22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22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31页。

④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23页。

⑤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32页。

于作品的了解,也应该比作者站得更高。”^①这是艾思奇为正确的直观指出的必经道路。

四、艾思奇关于文艺发展前途“三个核心问题”的总结

在《抗战文艺的动向》一文中,艾思奇指出,在文艺发展前途上有三个核心的问题:组织、形式和思想。

一是“组织上切实的广泛的开展”。艾思奇指出,加强作者的团结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推动文艺工作的必要基础。“地方组织是开展各地文艺运动的必要基础,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单靠一两个中心来影响全国了。就团体的工作来说,目前的文艺组织对于作家应该成为互相帮助互相研究的机关。对于群众应该成为组织群众文艺活动和创造发现新的作者的机关。”^②艾思奇认为,这一机关应该要能号召各种问题的讨论与研究,组织文艺工作团打破作家与现实的隔离,使作家能够到实践中去观察,在现实中去创作。

二是“创作的适当的形式的探求”。艾思奇认为,“形式必须适应于内容的构造”,文艺的创作不能以小形式为满足,广大群众有着广大的需求,希冀从文艺作品中受到一些教育,获得一些认识,许多动人的故事、悲惨的灾祸、敌军的暴行、壮烈的战斗、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复杂又联系的变动,都需要大篇幅的记载。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一文中,艾思奇指出,文艺不是“束之高阁”的东西,它是社会的、民族的,它的主要目的是走进现在的广大的民众中间,我们为民众而工作,因此要把民众的东西还给民众,这就是把握旧形式的必要性。同时,艾思奇认为,不仅要重视旧形式的利用,文学发展中一切好的成果,都不能放弃。运用旧形式,目的不在于停止于旧形式,而是要创造新的民族的文艺形式,我们的新生活、新工作、新体验都在要求有新文艺。因此,艾思奇指出在旧形式中,凡是妨碍反映现实的格律都要大胆地放弃,要在更高的基础上来把握旧形式、发展旧形式。

三是“理论上的正确思想的建立”。艾思奇在《抗战文艺的动向》一文中指出,文艺创作不能只偏重零碎个别问题的讨论研究,忽略了对整个文艺运动的展望、对全国文艺活动的总结。“理论的建立也是今后最重要的而又最繁难的工作。这工作不是靠一两个理论家单独的努力可以建立起来的。这要靠作者的创作的实验,靠各派的理论家互相研究互相讨论,从这些过程中建立起来。”^③对于文艺界研究座谈的活动,艾思奇认为要更充实、更有系统地做起来。在研究座谈会上,各派代表着一定的见解,可能会存在很多争论,这是避免不了的,但争论必须以统一为前提,是为着共同走向一个目标,而不是为着见解的分裂。因此,“理论上的正确思想的建立”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团结文艺界的相关人士,基于一定的活动,经过相当的思想碰撞,最终能在认识上达成一定的共识,在理论上形成一般的指导。

五、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当代价值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④艾思奇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战线上的优秀战士,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文艺作出阐释的基础上,艾思奇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不仅明确了当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任务、指明了文艺创作路径与方向,还对当代品鉴者如何把握文艺作品的真正价值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34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76—477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7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一）“凡一切文艺总是有政治性的”表明了文艺作品要积极为政治服务

艾思奇认为，政治随着阶层关系的变化而变革，文艺为了适应阶层的要求也随着变革而运动。因着各阶级政治目标的不同，文艺总是有着积极和消极之别。文艺具有一定的政治宣传和教化作用，当文艺宣传的是进步阶级的内容，宣传教化就起积极政治作用；当文艺反映的是落后阶级思想或教人逃离现实世界，宣传教化就起消极政治作用。“总之，凡一切文艺总是政治的，而且是在一定的范围里反映着一定量的真实性的。”^①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摒弃文艺自由、艺术至上的错误论断，将纯洁的手掘入污秽的现实，敢于暴露落后阶级的丑恶面目，致力于发挥积极作用，惯于表现民众、发动民众、团结民众，善于为政治服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强调的：“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②“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③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希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④习近平总书记的“五点希望”正是基于前人对文艺提出的有益观点基础上，展望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应有姿态。

（二）“大众的、现实的、民族的”指明了文艺创作的前进方向

艾思奇在《抗战文艺的动向》一文中提出“今后的抗战文艺首先是民族的东西”，“今后的文艺是尽量走向大众的”，“今后的文艺一般地会只有现实主义的基础的”。其一，文艺是民族的。艾思奇认为不管是哪一派作家的创作，总和这一些方面有关联，在这一点上共同地成为民族的作家。民族的不仅仅着重于民族旧艺术形式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内容上能够采用适当的形式表现民族生动力量，发扬民族自信心和坚决心，写出每一时期最优秀的民族典型人物。其二，文艺是大众的。一方面文艺在内容是大众的，另一方面创作文艺的主体也是大众的。艾思奇认为，各派的作家推进了文艺的大众化。“这一个大众，不是一个抽象的空名词，而是各种各样阶级的人民结合成的具体的大众。各派的作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接近各方面各阶级的人民，这是具体地走向大众的办法。空讲大众化，一定要给大众化的文艺规定一个死的形式，这是无结果的繁琐论。”^⑤同时，艾思奇还明确，文艺不是少数人的事业，不是天才的事业，前进的作者承担了相当的任务，但一定条件下，比较落后的作者也担负了一部分的任务。“一部分最前进的作者虽然能把握着现实的最本质的方面，却并不能汲尽现实真实性。”^⑥因此，除了少数最前进的作者外，还有许多有才能的可以合作的作者，我们不能放弃他们，任由他们从着不正确的世界观引导而逐渐走向衰败，要号召他们、鼓励他们、督促他们，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多在现实反映方面下功夫，用集团的笔全面地写出现实的全貌。“政治上的联合战线，在文学上也有反映，不单只是行动上的反映，也是写作的反映。”^⑦其三，文艺是现实的。艾思奇认为，作家不能再以个人“灵感”作为创作原则，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21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20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321—326页。

⑤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474页。

⑥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11页。

⑦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712页。

而是必须面对现实。艾思奇倡导的文艺与民族相结合、文艺与大众相结合、文艺与现实相结合的观点,不仅对文艺创作者提出了要求,也为品鉴者提供了指导。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要经得起人民品鉴、专家评价、市场检验。同时,文艺评论者既是“表扬家”又是“批判家”,需要发挥好价值引领、启迪审美、领航文艺的重要作用。

(三)“文艺是教育和认识的工具”阐明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任务

艾思奇提出“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绝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①。文艺不单作为纯粹的文艺,而且也是教育和认识的工具。进步的文艺要尽可能地帮助实践,最大程度地表现民族的活力,启发民族的觉悟,提高民族的自信。艾思奇指出,文学和科学一样,都有指导实践的任务和作用,最能反映现实的文学最具时代和行动意义。因此,文艺工作者肩负着提高大众认识、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任务,文艺作品承载着凝聚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历史使命。因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致力于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立志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讲品位、重艺德、存正气,要聚焦时代任务,抓住具体典型,创作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文艺作品,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四)“从具体性的道路上去取得一般”明确了文艺创作的根本路径

艾思奇在《文艺的永久性与政治性》一文中提出“凡文艺作品的内容都得是活的”,“在一定的政治性下通过具体性以反映现实”,“从具体性的道路上去取得一般”,“使一般原则生活在事例里”等有益观点;在《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生命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用具体的形象把现实的一切动态反映出来”,“所谓反映,并不是零零碎碎毫无系统的陈列,而是要把现实的运动、趋势、前途,也显示出来,不单只反映现实,也同时预示着将来”,“正确的反映,同时也就是指示”等有益观点,明确了文艺创作的路径。对于艺术之道路,是向前还是向后,艾思奇指出,“创作文艺,是需要能力、需要天才的,然天才的表现并不是机械地将具体内容装进漠不相关的形式里,天才的伟大处在于能周到地、适宜地,将具体性不多不少恰恰活跃地呈现出来,同时也便将一种的必然性从具体性中烘托出来。”^②艾思奇认为前进的人不畏表现真实,凡伟大的艺术家无一不热爱现实,凡永久的文艺品无一不反映现实。同时,艾思奇明确现实不是某一个体的现实,而是社会的、人民的、大众的现实,这就决定了文艺不能局限于个人,而是借创作者的眼睛俯瞰社会现状,借典型的事例来反映社会现实。“我们的文艺人,一方面是民众的教育者,而另一方面却又要同时向民众学习。学习他们的生活、思想以及言谈。真正民族的新文艺是要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发生力量的,它也就是民众的东西。要怎样才能创造这样的文艺?必须拿民众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精制,再还给民众。”^③因此,文艺工作者只有具备洞察现实的毅力、高尚的道德品质、崇高的艺术品格、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俯瞰人类社会的远大视野、形象高超的艺术手法和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才能创作出富有感染力、影响力、创造力和艺术美的杰出文艺作品。

责任编辑:郭周静

①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136页。

②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一卷),第80—81页。

③ 艾思奇:《艾思奇全书》(第二卷),第680页。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时间银行” 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现状及其路径优化

刘华清

摘 要：随着我国老龄化形势的不断加剧，养老成为国家及社会各界关注且常论常新的热点议题。“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为有效应对我国当前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缓解不断激增的养老服务压力提供了积极的思路和可行性选择。作为“舶来品”，其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如制度供给不足、社会公众的认知度低及公信力不足、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低且队伍缺乏稳定性等困境，新征程上推进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高质量发展需在加强法治化建设、提升公众认知度、提升统筹层次等方面不断发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关键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制度优化；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4)02-0089-08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64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7%，相比2010年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比13.5%。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①。“时间银行”这一新型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也可以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②作为一种志愿服务和互助养老服务的创新，“时间银行”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提供养老服务和缓解老年照料压力提供了一种积极思路和可行性选择。

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的兴起及其优势

（一）“时间银行”的兴起

互助养老作为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是老龄工作对现代化问题的积极回应，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制度优势^③。“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是作为一种产生于国外的舶来品而存在的，从广义上来看，泛指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积极参与，通过向对方提供相应的服务进而通过“时间银行”这一组织化平台储存下来，待服务提供者需要之时可以随时提取出同等时长的服务。从狭义上看来，“时间银行”具体指的是“低龄老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高

作者简介：刘华清，云南大学滇池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养老服务、社会治理。

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0年，第37页。

② 陈功、王笑寒：《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第132页。

③ 魏蒙、杜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助养老——内驱力、定位与发展走向》，《学习与实践》2024年第4期，第103页。

龄老人或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提供服务,为自己成为高龄老人时换取别人的服务做好准备”。^①“时间银行”在西方大体上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实现社区成员之间的邻里互助,互助的社会成员基于共同的生活社区,在地域上相邻、文化上相同、情感上相融;其次,在发展的第二阶段需要实现的是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提供大量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及技术资源等,其中,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专业化社工队伍为特定社区内的老人提供内容丰富、多元化的养老服务,这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繁荣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其具有志愿性、自主性、独立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特征;最后在发展的第三阶段需要实现的目标是吸引社会企业的不断参与,即为在“时间银行”组织框架内为社区老人提供了志愿养老服务的提供者支付一定的报酬,这为“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是“时间银行”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

国内多数研究将“时间银行”界定为“志愿者将志愿服务的时间以‘时间币’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储存进时间银行,以便获取将来某种可预期的回报或激励,从而保证志愿服务持续供给的一种制度安排。”^②“时间银行”简单的界定为一种以服务换取服务的代际接力模式的志愿性养老服务模式,这样的认知显然无法对“时间银行”这种养老服务模式形成客观、完整和准确的认知。一方面,无论是在其产生之时还是在中国经过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后,“时间银行”都具有信用产品属性,是典型的信用产品。这一养老服务模式本质上是劳动服务或时间货币的一种延期支付模式。“时间银行模式下的互助养老存在时间银行组织方、服务供给方、服务接受方三方主体。时间银行是组织牵头人,是整个模式得以运作的核心主体,服务提供方和服务供给方是重要的另外两方主体,不可或缺”^③。“时间银行”的公共信用就成为其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时间银行”是一种具有典型的互助属性和显著的互助效能的养老服务模式。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始终以“互惠互利”为基本价值理念,秉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实践运行中,人们因为互助实践产生和获得了认同、信任、友谊,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感、获得感、归属感、幸福感,而缺乏互助意义上的“时间银行”是不可能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

(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比较优势

1. 有利于开发老年群体人力资本,实现“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的有机结合。1997年,西方七国丹佛会议首次提出了积极老龄化(Positive Aging)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在全世界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各国积极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有效缓解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的养老服务需求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与积极思路。相继地,2002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公布报告《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从此,积极老龄化日渐成为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理论、政策和战略。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最大效应的过程。”^④这意味着“积极老龄化”不仅要求老年群体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更突出和强调了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公共事务的参与,其内涵与外延得到了不断的扩大与拓展,意味着老年群体将享有更为优质的老年生活、更高品质的生活向往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可见,树立积极老龄化观念其实质是要充分认识老龄化带来的问

① 李明、曹海军:《老龄化背景下国外时间银行的发展及其对我国互助养老的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6页。

② 陈友华、施旖旎:《时间银行:缘起、问题与前景》,《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第112页。

③ 陈功、王笑寒:《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理论学刊》2020年第6期,第134页。

④ 陈际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发展难点及应对策略——基于解决老龄化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69页。

题与挑战,要深入挖掘老年人力资本与社会潜力,激发老年人的社会活力,促进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公共事物的参与。积极老龄化和“老有所为”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上是一致的,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体现了老年群体是潜力巨大的资源的积极理念,有利于充分调动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社会生产,老年群体不断的社会参与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可实现老年群体自身权益的实现和社会良性发展双赢局面。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往往容易将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但这些老年群体往往有相当一部分的身体仍然保持在良好的健康状态,能够胜任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与类别的工作,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都有积极的社会参与和实现再就业的主观意志和热情,“退而不休”是多数老年群体的共同期盼与心声,而“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恰如其分的迎合与满足来规模巨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能够积极促进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的开发,获得了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感与归属感,实现了“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的双重效益。在“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下,那些低龄抑或身体健康的老年群体有效发挥自身的优势与专业,为那些服务需求者提供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并且这些提供了养老服务的老年群体将自己提供的养老服务通过“时间银行”这一组织化平台得以储存下来,为自己以后的养老问题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由此可见,积极推进“时间银行”的建设与发展是具有增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其社会参与和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及实现“老有所养”与“老有所为”等多重价值功能和社会效益的。

2. 有利于满足老年群体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节约社会成本、提升社会效益。长期以来,以往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多以满足老年群体的经济支持为主要服务内容,从而忽视了老年群体的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而在依托于特定社区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下,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是具备有偿性的,其服务时长以时间币的形式存储在“时间银行”中,等到将来需要时支取出来,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使得参与者所提供的服务更具有长时段照料服务的特征。“‘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功能多元,能为有养老诉求的老人提供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可弥补正式的养老保障体系不足。‘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服务对象较广泛,涵盖高龄失能老人、空巢老人、经济困难老人等弱势老年群体,当他们有养老诉求时都可以通过‘时间银行’申请享受服务。”^①由于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接收者同属一个共同的社区,这样的便捷使得养老服务资源的可及性强,可实现养老服务资源的就近优化配置,帮助老年群体实现居家养老和就近养老的养老愿望与诉求,特别是为那些经济收入水平有限、养老服务能力购买力不足的老年群体带来了希望与曙光,对这部分老年群体而言,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是一种低成本、高质量、可持续的养老服务模式,既有效节约了养老服务的成本 and 提高了养老服务的便捷性,也让广大的老年群体获得自己所需的各种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该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将社区闲置的人力资源进行高效的集约和整合,为社区范围内的老年群体提供了涵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的养老服务需求,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益的养老服务模式。

3. 有利于增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和谐社区建设。“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其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其具有显著的互助属性,该模式在现实的实践运行中引入了有偿激励机制,将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养老服务视为一种有价货币,并以时间货币的形式通过“时间银行”这一组织化平台存储起来,等到服务提供者需要时在通过“时间银行”平台支取,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与以往传统的志愿服务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参与者所提供的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是有偿的,这从根本上解决和消除了参与者的忧虑,有效调动了参与

^① 纪春艳:《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第142页。

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时间银行”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组织化平台吸引不同的参与者之间开展各种互助养老服务活动,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活动既有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也有高层次的精神慰藉方面等多元化、多层次得养老服务需求,这大大加强了特定社区居民之间得社会联系,增进了彼此之间得了解与友谊,提升了参与者尤其是那些低龄老年群体的归属感、价值感、认同感,有利于消除社会隔阂与社会排斥,培育公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促进“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4. 有利于补充和完善现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足,弥合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现有供给不足之间的二元张力。当前,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现阶段的政策目标指向的布局为90%为居家养老、7%为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即所谓的90、7、3模式。“时间银行”有效开发和利用了老年群体的丰富的人力资源,让老年群体在参与中体现和实现了认同感、价值感、归属感、获得感,为社区中的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及其他老年群体提供了相应的多元化、个性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从而有效弥补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不足,从而实现互助养老。同时,“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可有效弥补政府养老力量不足和缓解政府过重的社会养老服务压力。“时间银行”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质量的自主养老途径,并通过积极调动大量社会互助力量的参与充实和补充了养老服务资源,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体系以弥补政府养老力量的不足,缓解政府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压力。

二、“时间银行”在我国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 制度供给不足,缺乏法律保障

“时间银行”在我国作为一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不断增长的养老服务压力的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从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实践运行来看,其缘起于民间的互助养老实践,是老年群体自我选择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产物,是老年群体基于“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理念,在基层社区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从其在我国目前的现实发展来看,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缺乏系统完备、科学合理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规范,造成了其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和零星式发展的特征,“我国目前尚未有规范‘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有关指引和支持政策,制约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地方层面,仅有浙江省政府首次提出了建立‘时间银行’制度。”^①可见,我国“时间银行”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严重不足,缺乏制度保障。其在现实的实践运行中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时间银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与尝试,各地的实践各有特色、各尽不同,且统筹层次低,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二是缺乏对“时间币”统一且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具体的实践运行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服务类别、服务内容的劳动强度、复杂程度及技术含量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诸如提供1小时的洗衣、助餐服务与提供1小时的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服务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如果简单地以服务的时长为基本单元和评价指标,那不仅仅会产生所谓的“道德风险”及“劣币驱除良币”现象,同时会严重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其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三是缺乏相应的纠纷协调和风险管控机制,运行成本和社会风险较大。在“时间银行”服务机制下,服务接受者往往主要是那些生活难以自理的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或高龄老人,对这部分群体来说,体弱多病是常态,在服务提供者为他们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许多不可控的风险性因素,从而引发矛盾纠纷,如果没有

^① 纪春艳:《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第145页。

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作为协调处理的依据,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的志愿者群体和老年群体的权益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将会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四是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不利于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时间银行”具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在具体的实践运行中由于法治化建设不足,往往主要依靠参与者的一时热情与自觉行动,缺乏维系其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可持续性发展大为受限。

(二) 社会公众的认知度低及公信力不足

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特点和社会条件及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时间银行”这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自1998年在上海登录以来,社会公众对其认知度明显不足,只有较少的地方对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和认识的程度也仅仅停留在普通和浅薄的认知层面。“即便是在建立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地方,很多居民也处于初步认知阶段,缺乏信心,很多人对这一事物的发展理念及优势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甚至从未听说过,加之对新事物的陌生感和排斥感,使得一些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缺乏尝试的勇气,尽管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志愿者及工作人员极力宣传这一新型养老模式,并通过亲身实践来号召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但因为宣传范围有限,效果甚微。”^①加之由于在我国“时间银行”的组织者和发起者多是社会组织 and 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抑或是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这样的现实决定了“时间银行”必然让公众对其信心不足,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往往让人们对其总是抱持不太乐观的态度,甚至在学术界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不断激增的养老服务需求压力的“时间银行”在中国只能面临破产的厄运。

(三) 服务人员专业化水平低且队伍稳定性不高

在我国,无论是从“时间银行”的缘起抑或是现实的实践运行来看,其价值目的无外乎是以“时间银行”这一组织化平台为依托,以向不同阶段的老年群体提供各种层次有别、类别不一、内容多元的养老服务为目标指向的新型养老服务体系,尤其是对那些失能半失能或是高龄老人提供的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指向性的养老服务,但这些多元化、个性化的往往都要求服务提供者具有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特殊性和专业化技能,诸如提供上门心理咨询服务、家电维修、法律咨询、医疗保健等专业性较强的养老服务等,因为这种特殊化的养老服务与普通的大众化养老服务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诸如提供洗衣、打扫卫生、做饭等基本养老服务就是一种普通的大众化养老服务,这类养老服务需求的提供是不要求服务提供者具备某种专业化的能力和素养的。“但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时间银行的志愿者主要以低龄老人为主,一般缺乏老年专业护理知识和技能,大多数是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项目,如看护、做饭、谈心、清洁、购物、住院陪护等,深层次的服务内容难以实现。”其次,主观上人们对“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模式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动力不足、参与积极性不高。“客观上缺乏志愿服务的时间和精力,年轻群体以及社区党员之外的人参与‘时间银行’的热情不够。”^②加之作为组织方的“时间银行”对参与者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不力,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许多地方的“时间银行”在实际运行中就面临着志愿服务资源不足的发展难题,致使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续。

(四) 人口的可持续性增长及人口的高度流动性带来的挑战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③,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形势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面临着人口的结构性转变而带来的挑战。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实践表明,人

① 张晨寒、李玲玉:《时间银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新探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82页。

② 纪春艳:《农村“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应对策略》,《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第146页。

③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153页。

口的可持续性增长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支撑与前提要件,同时也是—切制度得以存续发展的基础与必要条件,而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是持续的低生育率与低死亡率导致我国人口增长进程缓慢,“人口增长放缓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定阶段后的普遍现象,但人口增长大幅度下滑会引发—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若不加以干预就会向低出生率、人口负增长加速转变,进而导致家庭风险持续扩大、老年人抚养比负担持续加重、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社会活力持续下降,对未来人口和经济社会安全构成潜在风险。”^①可见,人口的持续性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攸关民生福祉和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大公共议题,而为有效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情势、缓解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模式得以成功运行的前提是建立在人口的可持续性增长的基础之上,而鉴于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加速转变,老龄化程度深、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必然会因为少子化、老龄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导致后续参与“时间银行”的人员供给不足,使得前期服务提供者的储蓄无法如期兑现,进而大为增加信用风险,是“时间银行”发展必然是步履维艰、难以为续。

伴随着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带来的人口的高度频繁的流动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的背景下,使得“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模式面临了不少发展难题与挑战,湖北省阳新县政府颁布文件规定:“助老服务志愿者本人年满60周岁以后,或者助老服务志愿者符合享受助老服务条件的直系亲属、三代以内旁系亲属,均可在全县范围内凭《阳新县助老服务志愿者爱心储蓄证》,支取助老服务爱心储蓄,或优先享受其他的社会公共服务。助老服务志愿者爱心储蓄不能透支,也不在本县范围外使用。”^②然而,在人口的高度流动、迁徙已经成为—种社会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湖北省阳新县所规定的“不在本县范围外使用”说明了目前在我国实践运行中的“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模式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如何使“时间银行”的参与人员实现跨区域的通存通兑是—个亟需解决的发展难题,目前的实践进路是提升“时间银行”的跨区域统筹层次恐怕是理性的现实选择,人口的频繁高度流动要求组建—个至少是全国性的国家统筹的“时间银行”来整体谋划、系统推进、督促落实成为必然选择,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应该组建—个全球性的机构来负责其运营与兑现。在我国,具体负责该领域且有能当此大任的是国家民政部门,倘如建立全球性的类似“时间银行”的全球性组织,恐怕还需要国际合作。

(五) 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不足

伴随着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纳米技术、量子通信等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崛起,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产关系等发生了根本性和革命性的变化,也必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制度建设、思想观念等,其带来的影响是—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全方位和多领域的整体性、系统性的宏大的历史与政治地理空间范围,深刻的重塑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生产关系和思维观念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变革等。“时间银行”这—新型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相应的也必须与时俱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步伐,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时间银行”在具体实际运行中,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建设明显不足,是制约其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与弱项。“由于时间银行尚属于新生事物,其具体运作和机制并不成熟,多数‘时间银行’的管理依托于居委会,记录由纸笔进行,成员数据存取缺乏细致的规定等,运作并不规范,并且这一时期内时间银行的发展为受到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并无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时间银行的发展进行指导和规范。”^③这充分说明我国“时间银行”发展中

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第152页。

② 陈友华、施旖旎:《时间银行:缘起、问题与前景》,《人文杂志》2015年第12期,第117页。

③ 陈功、黄国桂《时间银行的本土化发展、实践与创新——兼论积极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之新思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14页。

的数字化、信息化、标准化和智能化建设的缺失与不足，极大地制约和束缚了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壮大，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变量和重要因素。

三、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化路径

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与重大现实议题，不断探索与寻求新的养老模式予以积极应对我国愈发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新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推进“时间银行”养老互助模式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方面。

1. 加强法治建设，为“时间银行”打上法律补丁。“要将时间银行模式有效引入我国互助养老中，首先要制定与完善互助养老的相关法律制度”。^① 纵观国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的实践经验，其在“时间银行”的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立法先行、以法定制、依法实施的国际规律，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表明，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实践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只有加强法治化建设，补齐制度短板，进而督促落实，才能确保我国“时间银行”在法治化轨道上规范化、合理化发展，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实施。唯有如此，方能增强“时间银行”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吸引多元主体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在其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及时用法律补丁对制度进行修正完善，为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提供法治保障，以确保“时间银行”在法治化轨道上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2. 提升公众认知度，吸引多元力量参与且加强对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的培训。“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在国外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成为了其应对老龄化问题与有效缓解养老压力的一种方式，在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得到了较大规模的推广和发展。然而，在我国，“时间银行”仍属于新鲜事物，不少研究和调查发现社会公众多对其知之甚少抑或无从所知，尽管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和地方有了不少积极的尝试与探索，但这种努力与尝试的影响力和规模体量都相当有限，有的地方以社区为主导推进“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广泛实践，但是却面临着“组织复杂松散，参与网络不健全^②”的问题，鉴于此，亟需党和政府积极有效利用现代各种多元化的高超的媒体宣传技术和手段进行引导和普及宣传，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对“时间银行”的认知度，吸引多元力量积极参与“时间银行”的建设发展，现阶段我国“时间银行”多是由社会组织与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抑或农村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者或发起者，而其他的力量参与明显不足，特别是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与重要，没有党和政府的积极主导，“时间银行”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可能就如有些学者所言要面临破产的厄运。其次，各种公共部门、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多元力量的参与可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提供丰富的人力、物力、资金及技术等资源支撑，对实现“时间银行”的高质量 and 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时间银行”这种新型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主要服务对象多是那些高龄老人、空巢老人及失能或半失能老年群体，这就必然要求服务提供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照护知识或技能，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养老服务时间银行需要专业化的服务人员及服务项目来确保高质量服务的实现。”^③ 现实的使然要求为保障“时间银行”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必然需要重视和加强对志愿服务提供者

① 李明、曹海军：《老龄化背景下国外时间银行的发展及其对我国互助养老的启示》，《国外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8页。

② 邹昀瑾、郭彬、陈功：《资本嵌入与互助共享：政策试验何以推动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基于“时间银行”的案例考察》，《城市发展研究》2024年第2期，第100页。

③ 张晨寒、李玲玉：《时间银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新探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82页。

的技能培训管理工作建设,对其进行多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养老服务技能的专业化培训与管理,不断提升其服务水平与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效能、降低服务成本。

3. 提升统筹层次,构建跨区域的通存通兑机制。鉴于我国由于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相伴而来人口的高度频繁流动性,人口的不断的流动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的背景下,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时间银行”必然需要做出相应的变革与完善,以适应人口的高度流动所带来的发展难题与挑战。就现阶段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实际而言,多呈碎片化、分散化和零星式发展特征,发展规模有限、影响力不大,尽管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少数城市和地方有了积极的探索与尝试,但目前尚处于探索与萌芽阶段。造成这种现实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但不少的调查和研究结果显示无法解决志愿服务提供者的跨区域通存通兑疑虑是关键的一环,这导致了社会公众对其发展信心不足,存在着用户信用模糊、信用背书不足、统筹层次过低以及通存通兑困难等信用困境^①。因此,提升“时间银行”的统筹层次且构建更大规模、跨区域的甚至是全国性统一的“时间银行”机构是现实发展的必然选择,唯有如此,方可提升公众对其的发展信心,增强其公信力与权威性,吸引多元主体和力量的积极参与,为“时间银行”的发展壮大提供更多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技术资源等支持,促进“时间银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健康繁荣发展。

4. 加强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构建统一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纵览国外“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发展经验和实践运行的谱系,其在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实践效果,发挥了典型的影响和积极效应,其原因是多方面与多维度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外“时间银行”的建设、发展、完善的实践进程中均无一例外的借助了现代的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力量,使其实现了“技术赋能”,大大加强了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充分利用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及移动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发展进步的有益成果,促进和保障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高效运营。“时间银行”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的国际经验表明,作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日益严峻的养老难题的一种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时间银行”,其在中国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现代的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重大支撑,加强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构建和完善地区性的甚至是全国性统一的“时间银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系统,实现综合统筹、科学管理、协同高效、系统集成、督促落实等集多功能于一身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一是以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为依托,建立和完善较高级别的“时间银行”网络信息服务平台和专门化的网站,实现“时间银行”参与者的注册登记、服务供需匹配、时间币的评估与通存通兑及监督管理等多重功能,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模式的参与者之间,能够实现服务提供者与服务需求者的高效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效率低下与服务资源的浪费问题;二是在必要时构建区域性的甚至全国统一的“时间银行”网络信息服务系统,打破群体、部门和地区分割,从而实现数据、信息等资源的有效整合与高效利用,同时也有效解决了“时间银行”参与者长期忧心忡忡的跨区域通存通兑问题;最后,有效利用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化与数字化优势加强线上的宣传与普及,吸引更多的群体参与“时间银行”这一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增强其影响力和扩大其影响面,促进“时间银行”的高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顾东明、张向东:《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的信用困境与化解路径》,《青海金融》2024年第2期,第28页。

洱海保护治理从“抢救模式”向常态化的转型

夏志贤

摘要：破解“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难题，是推进生态文明常态化、可持续性建设的核心问题。洱海保护治理实施“抢救模式”，通过强化组织、制度建设，加强工程建设和资金投入，实现了洱海水质稳步提升。但对照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机制评价体系，还存在高水平保护没有与高质量发展相统一、水质提升重点攻坚没有与协同治理相结合等问题。因此，“抢救模式”难以持续，必须实现常态化转型。围绕破解“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难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精准保护的责任机制、挖掘和拓展绿色发展资源、构建保护治理的评价机制三个方面的建议措施。

关键词：洱海保护；“抢救模式”；常态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097-10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在洱海边留下了“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的嘱托。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云南，作出了“继续守住守好洱海”的新嘱托。在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部署中，作为“新三湖”和“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洱海无疑是重要阵地，也是展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靓丽名片”。

湖泊所在流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维系的基本空间，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效应，是各国或地区都会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也是推进生态文明的核心命题。破解这个难题，全球形成了三种公认的模式，即美国五大湖区模式、瑞士博登湖模式和日本琵琶湖模式。^①三种模式所在区域，都实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理想样态。其中，日本琵琶湖因“先污染后治理”的历程，又处在城市近郊、人口密集的区域，其保护治理经验最为其他国家珍视和效仿，但鲜见成功案例。就治理的方式与方法上，国内也形成了典型案例，包括湖北立法治理的经验，以及太湖跨省协作治理的经验^②。两个典型都侧重于方法示范性，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效应上，对比世界先进典型，还存在一定差距。

相较而言，洱海保护治理更具典型性和研究价值。洱海保护治理曾在2009年得到国家环保部的肯定，被誉为“全国城市近郊保护最好的湖泊”^③；2015年再次被国家环保部肯定了“四治一

基金项目：2024年度全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立项课题“洱海环境精准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长效机制研究”（2024YNDXXT32）。

作者简介：夏志贤，大理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① 王圣瑞、李贵宝：《国外湖泊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对我国的启示》，《环境保护》2017年第10期，第64—68页。美国五大湖区是通过国际协定、法律监管、产业升级实现湖泊治理的典型；瑞士博登湖是跨国协调有效治理湖泊污染的典型；日本琵琶湖是通过立法监管控制污水排放、建截污管网系统实现湖泊治理的典型。

② 熊炜：《洞庭湖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水污染治理的立法研究》，湘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8页。

③ 段树军、李强：《洱海：湖泊休养生息的范例》，《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7日，第3版。

网”的经验^①。特别是,2017年以来,洱海保护治理实施的“抢救模式”,其资金、技术和人力的投入空前,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但是,此种模式能否破解“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难题,作为一次环境危机的紧急应对,能否把洱海保护治理推进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常态化阶段,使之更具有可持续性,这个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一、文献综述:洱海保护治理的理论探索

学界对洱海保护治理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从已有文献来看,对洱海保护治理的措施及相关体系的分析,形成了三种解释:工程技术论、政策法规论和综合治理论。持工程技术论者认为,近50年来洱海水水质指标波动的历史表明,治理成效均与截污干渠、截污治污工程、生态修复密切相关^②。持政策法规论者认为,洱海环境问题的实质,在于没有形成有序的生态安全格局。只有通过法律确定生态红线,将流域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才能实现最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③。持综合治理论者认为,洱海所在流域作为地理、社会和政治的多维空间,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其有效治理应当是一项综合行政、法律、科技、宣传等多部门工作的系统工程^④。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洱海水水质受气候变化高度影响,治理成效与气候状况密切相关^⑤。

对于2017年以来实施的“抢救模式”,学界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实施“抢救模式”的必要性和其本质的讨论。对于实施“抢救模式”的必要性,有文献表明,中央领导视察大理,高度关注洱海水水质问题,有力推动了“抢救模式”的出台^⑥。也有学者指出,“抢救模式”的深层次背景,在于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的关系失衡,人类活动超过了流域环境承载的限度^⑦。“抢救模式”的本质是什么?有文献认为,这是一次生态危机的紧急应对。环湖餐饮客栈无序开发,导致污染风险急剧增加,因此要“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⑧。

不论是洱海保护治理的宏观叙事,还是关于“抢救模式”的具体分析,上述文献强调方法效用、分析内容本质的同时,忽视了治理的模式,以及其所在体系能否持续的问题。毫无疑问,治理的措施体现的技术水平、产生的实际效应,以及背后所关联的政治、社会条件,固然是推进“抢救模式”的必要条件。然而,这种模式及所在的体系,其涉及的成本和产生的效用,决定着这一模式能否常态化推进、持续运行。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也事关洱海保护治理,以及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成败。从已有文献来看,学界对“抢救模式”启动之后的洱海保护治理相关问题的讨论比较多,但是,对于“抢救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此种模式能否常态化持续推进,如不能持续,该如何转型,相关讨论大多语焉不详。因此,本文拟从“抢救模式”的评价机制、内容特征、目标成效几个方面,讨论其持续性或常态化转型的问题。

① 杜涛:《全面依法治州 建设法治大理》,《云南法制报》2015年8月3日,第5版。

② 高思佳、侯泽英、吴越等:《近50a洱海水环境演变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素》,《湖泊科学》2023年第4期,第1301页。

③ 李维佳、马琳、臧振华等:《基于生态红线的洱海流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第93—94页。

④ 项颂、孙丽慧、余小梅等:《生态文明视角下洱海流域水环境管理思路与方案》,《环境工程技术学报》2022年第3期,第645页。

⑤ 安国英、郭兆成、叶佩:《云南大理地区1989—2019年期间气候变化及对洱海水质的影响》,《现代地质》2022年第2期,第416—417页。

⑥ 亚鑫:《洱海打好保护治理攻坚战》,《云岭先锋》2019年第5期,第58页。

⑦ 潘文良:《洱海保护理念与藏区圣湖观念比较》,《大理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44—45页。

⑧ 张璐晶:《牢记总书记嘱托 大理洱海三年保护治理初见成效》,《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9期,第47页。

二、理论分析：常态化评价机制的建构

湖泊治理要破解“经济—社会—生态”难题，分析其是否形成良性且可常态化运行的模式，前提是要确立一个评价标准。从湖泊治理的上位概念分析，生态文明评价涉及的理论有：系统论、生态系统论、组织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①。目前来看，要集合这些理论范畴，用于评价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必然的选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是当前推进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的理论坐标和行动指南，为分析和评价“抢救模式”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融合了系统论、生态系统论、组织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理论集成上具有明显的综合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体系完备的理论成果，代表当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认知达到的高度。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最新依据，也为构建湖泊治理的评价机制，提供了基本框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与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重大关系。^② 据此，构建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机制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机制的核心问题，是能否破解“经济—社会—生态”的复合难题。其基本评价标准是，能否平衡保护与发展、外部与内部、自主与被动、自然与人工、重点与协同的关系。其中，“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结合地方实际，抽象转化为“自主与被动”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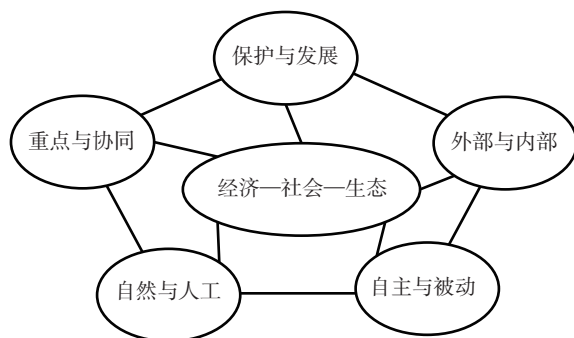


图1 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机制评价体系

三、现状表述：“抢救模式”的内涵特征与目标成效

回溯来看，“抢救模式”的实施背景有二：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二是洱海水质恶化至富营养化初期阶段。分析前者，从中央到省委，各级就洱海保护治理作出系列部署，为“抢救模式”的出台确立了鲜明的政治方向。分析后者，“抢救模式”出台前，监测指标表明，洱海水质初步进入富营养化初期阶段。根据湖泊治理的经验，富营养化初期的水质，经过集中攻坚治理，可重回中营养化状态。但是，从2013年到2016年，洱海周边餐饮客栈发展达到“井喷”状态。据中央环保督察组在2018年10月的通报，生态核心区在建违章建筑1084户，餐饮客栈2498户，其中1947户证照不齐。洱海水质向富营养化恶化的风险陡然增高，在此关键节点，必须实施“抢救模式”，集中攻坚治理污染，遏制富营养化趋势。

^① “系统论”由钱学森于1986—1992年在其亲自创办的“系统学研讨班”上全面阐述，这一理论也适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分析。“生态系统论”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 G. Tansley）在1935年提出，认为有机体不能与其所处的环境分离，必须与其所处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们都按一定的规律进行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组织理论”主要涉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官僚组织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用于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组织与管理活动。“可持续发展理论”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在1987年提出，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②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国人大》2023年第22期，第6—8页。

(一) “抢救模式”的内涵特征

“抢救模式”从时间上去追溯，作为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工作，其正式实施的节点，是 2017 年大理州召开“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实施‘七大行动’动员大会”。随后，“抢救模式”在洱海流域全面推行。“抢救模式”作为应急性和综合性的环境治理，与过去洱海保护治理工作不同，其丰富的内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组织架构、制度架构、工程建设与财政投入等方面。

1. “抢救模式”的组织架构体现了“全员动员”的“决战姿态”。“抢救模式”突破了原有的不同市（县）属地管理、部门分工的局限，州、市（县）、乡（镇）多级联动，不再单独依靠洱海管理（流域）局，将发改、农业农村、住建等多部门纳入，嵌入“河长制”，引入人大、纪检监察、公安等部门，组建监督执法体系。根据当时出台的文件，“抢救模式”的组织架构，可梳理如“表 1”所示。

表 1 “抢救模式”的组织架构

机构	内容	职责	性质
指挥部	2017 年组建大理州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指挥部，大理市、洱源县参照设立，从洱管、农业农村、住建、水务、发改、生态等部门抽调人员组建	领导、协调	协调机构
派出机构	驻流域各乡镇（街道）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工作队，系州政府直接派出，从州、市（县）各部门抽调组建	督促各乡镇、街道工作	协调机构
行政部门	大理州洱海管理局、大理市洱海管理局、洱源县流域管理局	专职负责洱海保护	行政机构
行政部门	大理州生态环境局以及大理市分局、洱源县分局，水务局	环境监测、执法	行政机构
执法部门	大理市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洱源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	执法	执法机构
河长制	构建省、州、市（县）、乡（镇、街道）、村（社）五级河长，河长办设在水务局	水利设施建设	督察机构
研究机构	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洱海湖泊研究院	科研、决策咨询、技术支持	科研机构

注：本表内容是从田野调查及相关政府文件中获取，表现“抢救模式”实施初期洱海保护治理的组织架构，但并不全面。实际上，纪检监察、人大、政协部门也参与指挥部的工作。

从实际运作来看，州级指挥部履行统一领导职责，将保护治理工作分配给市（县），市（县）指挥部又进一步分配到直属部门和乡镇、街道，由作为派出机构的工作队负责监督落实，并将落实情况反馈到指挥部。洱管局作为主要部门参与指挥部工作，水上派出所作为执法机构，也接受指挥部的协调。生态、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虽派出工作人员参与指挥部工作，但本部门也接受指挥部分配的工作任务。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洱海湖泊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为指挥部和各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因此，指挥部作为协调机构，初衷虽是为了解决行政部门之间协调不畅的问题，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担任了领导和决策的核心职能。“抢救模式”的整体组织架构，形成了以指挥部为核心，各单位各负其责、共同协作的工作格局。

2. “抢救模式”构建了“四梁八柱”的制度架构。生态环境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保护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推进“抢救模式”，涉及政府部门、企业和居民多重利益关系，尤其需要依靠法律制度进行调整。“抢救模式”实施前后，大理州人大依据自治州权限，共制定 7 部涉及洱海保护治理的地方法规，州政府亦出台了 6 项规章，形成了以《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核心、其他法规为基础、政府规章为重要依据的制度架构，如“表 2”所示。

在“表 2”所列法规和规章中，《洱海保护管理条例》是最为基础和重要的法律依据。实施“抢救模式”以来，《条例》历经 2019 年和 2023 年两次修订，将保护治理的经验及时地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进行总结。如“生态保护核心区”“生态保护缓冲区”和“绿色发展区”（即所谓“三

区”)的相关条款,就是来自洱海保护治理的具体实践。涉及“三区”的条款,对洱海流域的产业布局、城乡规划等重要工作进行了详细规定,是“抢救模式”在法律上直接的体现。其他的法规,则是对苍山、乡村、湿地、海西等洱海流域重要的生态资源,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保护。6项政府规章,则是以高效、简洁的方式,分别针对垃圾污染、水污染、渔政等生态资源的管理和环境治理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处置办法。

表2 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中的制度架构

《洱海保护管理条例》	1988年制定,1998年、2000年、2014年、2019年和2023年修订	地方法规
《苍山保护管理条例》	2002年制定,2009年、2019年修订	地方法规
《乡村清洁条例》	2017年制定	地方法规
《水资源保护管理条例》	2016年制定	地方法规
《湿地保护条例》	2012年制定	地方法规
《洱海海西保护条例》	2012年制定	地方法规
《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2011年制定	地方法规
《洱海滩地管理实施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56号	政府规章
《洱海流域垃圾污染物处置管理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57号	政府规章
《洱海水污染防治实施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58号	政府规章
《洱海渔政管理实施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59号	政府规章
《洱海水政管理实施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60号	政府规章
《洱海保护区内农药经营使用管理实施办法》	登记编号:云府登461号	政府规章

注:本表内容来自大理州人大官方网站。

3.“抢救模式”实施了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与资金投入。如果说组织架构与制度架构体现了“抢救模式”的隐形轮廓,那么,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与资金投入,则体现了“抢救模式”的显性内容。如“表3”所示,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主要包含截污管网系统,环绕洱海长达128公里的生态缓冲带修复与建设等项目。截污管网系统是用于确保“不让一滴污水流入洱海”,生态廊道是为防止点源面源污染、改善水生态而建设的生态系统工程。

表3 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中的部分工程建设与资金投入

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工程(二期)项目	在大理市环洱海9个乡镇实施村落污水收集工程、村落污水处理工程和生态塘库工程	16.01亿
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生态修复及湿地工程;生态监测廊道工程;生态搬迁工程;管网完善工程;实验地建设工程(带湿地修复科研功能)	98.7亿
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	针对洱海流域山地森林质量不高、坝区水土资源低效粗放利用、入湖河流清水通道受损退化、洱海湖体水质状况极其不稳四个方面的生态问题,划分6个保护修复单元,开展全要素保护修复,部署林草生态涵养、坝区复合生态系统健康保障、入湖清水通道能力提高等六大类保护修复工程、28个子项目,构建“一屏一带一核一区多廊道”总体生态格局	53.8亿

注:本表统计资料来自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仅统计到“抢救模式”实施以来部分工程项目及投资,实际工程量和投资额超过本表的统计。

相对于规模浩大的工程建设而言,资金投入更能说明“抢救模式”的广度与深度。大理州财政局统计的数据表明,在“抢救模式”开启前的“十二五”(即2011年至2015年)时期,洱海保护治理的财政投入是42.11亿元;“抢救模式”开启后的“十三五”(即2016年至2020年)时期,财政投入则猛增到329.8亿元,是此前五年的7.5倍;“十四五”期间计划投入额度依然过百亿元,是“十二五”时期的2倍以上。

(二)“抢救模式”的目标成效

因每一时期保护治理面临的问题不同,“抢救模式”的目标内容一直在不断调整。如“表4”所示,2017年实施的“七大行动”,是“抢救模式”的初步体现,目的在于快速、高效遏制水质恶化趋势,降低富营养化的风险。2018年启动的“八大攻坚战”,是在“七大行动”基础上进行提升,意图从转型发展这个更高的维度推进保护治理。2021年到2022年实施的“六个两年”,不再局限于保护与治理的矛盾窠臼,着力解决水质提升过程中面临的更为实际和具体的问题。最近启动的“九个三年”,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基础上,突出“精准”理念,把保护治理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表4 近年来洱海保护治理的变迁

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	洱河流域“两违”整治行动、村镇“两污”治理行动、面源污染减量行动、节水治水生态修复行动、截污治污工程提速行动、流域综合执法监管行动、全民保护洱海行动	2017年
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转型发展“八大攻坚战”	流域截污治污攻坚战、生态搬迁攻坚战、矿山整治攻坚战、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河道治理攻坚战、环湖生态修复攻坚战、水质改善提升攻坚战、过度开发建设治理攻坚战	2018年
洱海保护精准治理“六个两年”	湖体透明度提升、入湖河道水质改善、城镇污水管网改造、污水集中收集率提升、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美丽河湖创建	2021—2022年
洱海保护精准治理“九个三年”	精准提升洱海湖体水生态修复、洱海主要入湖河流水质改善、洱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洱河流域城镇截污治污体系、洱河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洱河流域湿地提质增效、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治理、洱河流域产业转型发展、洱海海西库塘调蓄带农田尾水回用处置	2023—2026年

注:本表根据政府部门出台的洱海保护治理的相关文件整理而成。

狭义上的“抢救模式”,就是指“七大行动”与“八大攻坚战”,但广义上而言,“抢救模式”持续至今,涵盖“六个两年”和“九个三年”。从保护治理理念上来说,“六个两年”和“九个三年”,已经突破“抢救模式”的应急治理窠臼。在2021年,就有“从抢救性治理阶段转入到保护性治理和生态修复阶段”^①的表述。但“六个两年”“九个三年”在组织架构、制度架构、工程建设与资金投入等方面,与此前的“七大行动”和“八大攻坚战”,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对“抢救模式”的讨论不能局限于“七大行动”,要贯穿到“六个两年”“九个三年”。

“抢救模式”具有高效的组织、制度、工程建设和技术上的优势,直接反映在洱海保护治理的具体成效上,就是在短期内快速遏制住了洱海水质持续恶化的趋势。从“七大行动”“八大攻坚战”到“六个两年”“九个三年”,洱海水质各项指标均在稳定提升。如“图2”中所示,反映洱海水质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在稳步下降。这也意味着,洱海水质由富营养初期转为中营养状态。^②

四、问题剖析：常态化转型的必要性

“抢救模式”在较短时期内,依靠大规模人力、工程建设和财力投入,快速遏制了洱海水质恶化的趋势。这种高投入的模式,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作为应急性治理,用以化解洱海生态治理的危机。洱海水质恢复到中营养状态,意味着应急治理的任务基本完成。实际上,早在2021年,政府部门就宣告“抢救模式”结束,进入洱海保护精准治理的新阶段。然而,随“抢救模式”而

① 苏云慧:《奋力开创大理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新局面》,《大理日报(汉)》2021年12月16日,第5版。
② 中共大理州委:《关于制定大理白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大理日报(汉)》2020年12月29日,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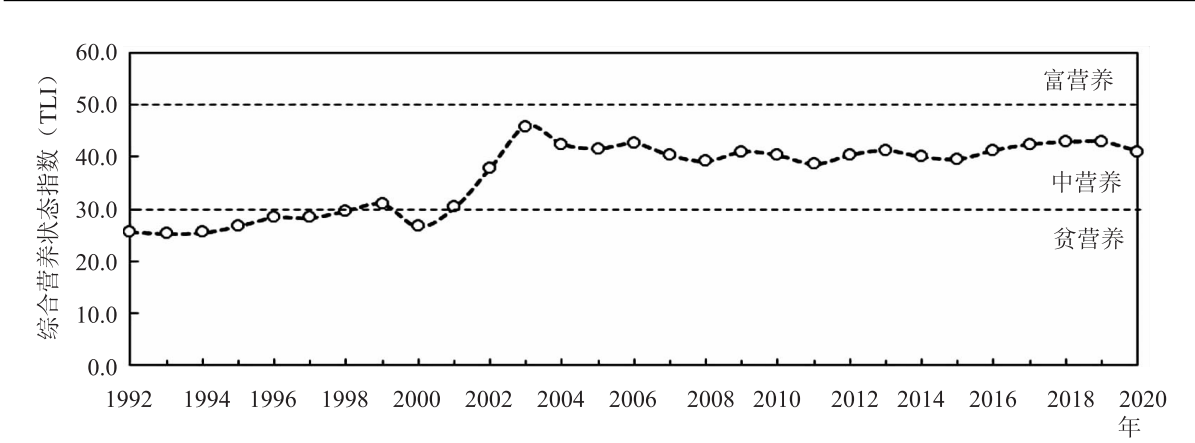


图2 洱海水质历史变化

注：本表来自大理州生态环境局。

来的制度、观念、机制等系列因素，并未随“抢救模式”结束而消散，依然被保留下来。对照“图1”所示的生态文明常态化机制建设评价体系来看，其中的一些因素成为当前推进洱海保护精准治理和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制约。

（一）高水平保护没有与高质量发展统一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分析，洱海流域并非是单纯的生态系统，因为有居民和企业的存在，而应当被视为社会生态系统。这要求，洱海保护治理不能单纯地追求生态效益，而是要把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统一起来，视二者为“一体两面”。但在“抢救模式”中，“表1”反映的组织架构，从“指挥部”到各职能部门、乡（镇）街道办，以及派驻的工作队，都将保护治理作为主要职责，忽略了发展任务。“表2”中列举的法律规章，多是强调保护治理，对发展的支持与鼓励不多。“表3”列举的工程建设与财政投入上，重点与方向是洱海保护治理领域，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投入较少。

表5 大理州十二县市从2015年到2023年区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单位：亿元）

县市	大理	洱源	剑川	鹤庆	宾川	巍山	弥渡	祥云	南涧	永平	云龙	漾濞
2015年	333.83	54.08	25.61	55.42	88.56	48.03	44.48	115.77	44.73	34.80	44.72	18.84
2023年	546.00	89.13	66.51	139.94	175.65	111.55	100.34	204.57	96.04	80.99	78.81	41.54
年均增速	7.9%	8.1%	19.9%	19.1%	12.3%	16.5%	15.7%	9.6%	14.3%	16.6%	9.5%	15.1%

注：本表根据各县（市）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整理编制。

“抢救模式”工作和投入重点，决定了其成效，即高水平保护的生态效益显著，但在高质量发展上出现失衡。具体言之，洱海流域经济发展低于全州，在全省九大高原湖泊中也是较低。如“表5”所示，大理州所辖12县市，自2015年到2023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表明，位于洱海流域的大理市和洱源县，年均增速远低于州内其他各县。从云南全省九大高原湖泊来看，洱海流域实施“抢救模式”过程中，湖区所在大理市经济增长，也显著低于其他湖泊所在地区。如“表6”所示，统计九大高原湖泊所在行政区域，自2015年到2023年的经济增速，洱海所在的大理市年均增速为7.9%，仅略高于阳宗海所在的宜良县的7.4%。

表6 九大高原湖泊所在区域从2015年到2023年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单位：亿元）

湖泊	滇池	洱海	抚仙湖	程海	泸沽湖	杞麓湖	星云湖	阳宗海	异龙湖
区域	昆明市	大理市	澄江市	永胜县	宁蒗县	通海县	江川区	宜良县	石屏县
2015年	4008.94	333.83	64	67.4	30.8	93.2	72.49	150.5	56.06
2023年	7864	546	163.2	124.3	86.1	205.9	189.57	240.1	144.02
年均增速	12.0%	7.9%	19.3%	10.6%	22.1%	15.1%	20.2%	7.4%	19.6%

注：本表根据各地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整理编制。

分析经济失衡的具体原因,一是在“抢救模式”之下,洱海流域产业限制较多,大理市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行业。随着国家房地产政策调整,房地产的经济发展支撑作用趋弱,导致大理市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二是“抢救模式”实施过程中,大理市海东规划大幅压缩,大批项目停建处置,导致大理市经济发展的区域和产业大幅收缩。三是大理市和洱源县行政区域大部位于洱海流域,按照“三区”管控要求,经济发展空间被大幅压缩。对比全省其他高原湖泊及其流域在国土面积中的占比,洱海流域的大理市和洱源县,除“三区”外,能布局产业的国土空间非常有限。这是近些年经济增速较低的重要因素。四是洱海流域以个体户为业态形式的餐饮、客栈居多,其整体市场交易数额庞大,但个体交易数额较小,没有纳入经济统计范畴。

(二) 水质提升重点攻坚没有与协同治理结合

钱学森晚年研究系统论,给出明确的定义: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部分组成相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①。参照这一定义,生态系统属于具有特定“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这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②。这对洱海保护精准治理提出了局部与全局协调、治标和治本贯通、当前和长远结合的协同治理要求。然而,“抢救模式”注重水质提升这个重点,但在流域生态系统的建设上兼顾不足。因为,就生态关系而言,水质指标是生态系统之“标”,良好的生态是洱海水水质之“本”。“抢救模式”下,虽然对水质指标高度关注,但对水生态系统的建设重视不够,而良好的水生态系统是水质稳定提升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和长远统筹上,在“抢救模式”实施之后,关停和搬迁大批项目,但新的替代性产业没有培育出来;不断加大保护治理投入,但对生态资源的长期经营缺失。在局部和全局统筹上,在限制洱海流域发展的同时,在全州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同等规模的产业区域。

(三) 落实保护责任没有与自主推进治理同步

根据组织理论,组织因进化形式不同,分为“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依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按默认规则自动形成有序的结构,就是“自组织”。一个系统如果“自组织”能力越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也就越强。如果把“抢救模式”下的洱海保护治理视作一个组织,考察其从实施以来至目前的历史变迁,多缘于落实中央和省级部门的保护治理部署。简言之,即“他组织”因素多,“自组织”因素少。实际上,洱海流域作为整体和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因部门、行政区划、行政层级分割,自主形成治理的“自组织”存在一定困难。比如,洱海作为“苍山洱海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其生态保护是由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作为风景名胜区,规划建设又是由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作为湖泊,其保护治理又是由洱管局专职负责;洱海的湖区主要是在大理市,但流域上游又归洱源县管辖。

目前负责洱海保护的职能部门,也很难统筹洱海保护治理的工作,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在“表1”的组织架构中,洱管局作为洱海流域地方政府特设机构,并非如其他政府部门的“条条”组织,虽有乡镇“洱管所”,但“上无省级部门的头”,即上无业务对口部门。在“抢救模式”实际运行中,洱管局由行政执法单位,转换成议事协调机构和巡查检查部门。洱海保护涉及的另外一个职能部门是生态环境局,但生态环境局主要的职责是环境监测。“表1”中的河长制,根据统一工作安排,其河长办设在水务局,但水务局目前的主要职责是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这三个部门均无法有效统筹洱海保护治理的系统工作。

“抢救模式”由“他组织”主导,整体组织架构在初期实现了高效运转。但随着“抢救模式”

①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②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中国人大》2023年第22期,第6—8页。

的任务完成,进入精准治理阶段,“自组织”系统却未能及时建立起来,造成没有一个职能部门能有效统筹做好洱海保护治理工作的困境。

(四) 人工治理污染没有与生态自然恢复协调

洱海流域的生态系统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共同栖息的所有生物及其环境之间,不断进行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的统一整体。当污染风险急剧上升时,原有生态系统失衡,就需要人工干预,因此要开启“抢救模式”;但是随着“抢救任务”完成,水质提升到“中营养”状态,就需要稳定这一阶段的生态系统,避免过多人为干预导致新的失衡。但实际上,自2020年宣布“抢救模式”结束后,洱海保护治理的建设规模、资金投入等指标,并没有收缩到“抢救模式”开启前。不仅如此,持续推进“六个两年”和“九个三年”,开展“打捞水草”“一年内三次开海捕捞”等工作,主观上是在强化“精准治理”,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对洱海流域的生产者、一级消费者、二级消费者等生态链条的反复干扰。这或许是2023年水质波动的原因之一。

(五) 政府推进生态治理与社会参与环境保护没有协力共进

系统论注重构建系统内外协调的关系,在生态治理的具体实践中,要求正确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矛盾。然而,在“抢救模式”下,政府推动洱海保护治理连续演出“独角戏”,群众、社会资本、科研单位在参与过程中,没有形成协力共进的良性机制,系统外部约束与内部自主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具体言之,首先,群众缺少参与环境治理的平台和动力。洱海流域存在大量的生态组织,如观鸟协会、兰花协会、户外运动协会等,这些组织缺乏参与洱海保护治理的平台,部分群众从生态道德的角度偶尔参与环境保护,但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流域多数群众在政府主导的洱海保护治理中,扮演着“观众”的角色。其次,社会资本参与洱海保护治理导致政府负债率过高。这是“抢救模式”难以持续的直接原因。如,在推进“抢救模式”关键的“十三五”时期,洱海保护治理累计投入资金329.8亿元,其中财政资金96.39亿元,引入社会资本运用PPP模式及其他投入资金233.41亿元,社会资本占比超过70.8%。不少研究指出了其中的高估收益的风险^①、政府支出的风险^②和信贷风险^③。最后,科研机构服务洱海保护治理和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效能不均衡。洱海流域集中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上海交大云南(大理)研究院等一大批科研单位,主要服务于生态治理。但在实际运行中,多数机构主要研究污染治理,研究绿色发展的比较少。在研究成果应用上,成果转化率低,实际应用性不强,还存在同一问题反复研究、重复研究的情况。

五、讨论与结论:常态化转型的路径

围绕破解“经济—社会—生态”的核心难题,需要立足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层面,针对五个方面的问题,尝试提出常态化转型的路径。

(一) 生态层面,建立精准保护的责任机制

一是优化“指挥部”工作机制。现存的“指挥部”和派驻的工作队,是“抢救模式”衍生的协调工作机构。随着“抢救模式”任务完成后,洱海保护进入精准治理阶段,这一机构没有及时优化调整,导致保护治理责任主体模糊化,削弱了职能部门履责效果。因此,“指挥部”和派驻工作队的工作机制应随着治理阶段和任务的变迁而及时调整,探索建立职能部门联席会议的常态化

① 张曼:《环境保护类PPP项目收益分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21年,第42页。

② 和选敏、杨娟:《优化大理市洱海治理PPP项目资金运作机制的路径探索——基于美、英、韩三国国际案例比较分析》,《时代金融》2020年第4期,第63—65页。

③ 欧阳剑平:《商业银行PPP项目信贷风险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6年,第29—30页。

机制,便于将保护治理的责任明确到具体部门和乡镇街道。二是建立洱海保护职能部门的协调机制。洱管局作为法定的洱海保护治理职能机构,但仅有州、市(县)设置,乡镇(街道)层面设站所,省级层面对口单位缺失。鉴于当前洱海保护精准治理及流域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综合性工作,在州市(县)层面,探索建立与发改部门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发改部门综合协调作用,高效协调生态、农业农村、水务、林草等部门,实现发改部门综合协调与洱管专职保护效能同时兼顾。在乡镇(街道)层面,根据最新一轮的机构改革要求,要充实乡镇(街道)一级环保工作力量,增加从事洱海保护精准治理一线工作人员。三是建立高效的“洱海卫士”聘用管理机制。“洱海卫士”归企业管理运营,成本高于原来的“滩管员”“水管员”,人员属于外来人员,在农村的“熟人社会”中开展工作效率较低。“洱海卫士”聘用为本地本村人员,也存在乡村“熟人社会”中“不敢管”“不好管”的履职问题。建议强化管理考核,明确管理责任,规避“熟人社会”问题,提高“洱海卫士”工作效率。

(二) 经济层面,挖掘和拓展绿色发展资源

一是加强个体户精细化管理。洱海流域存在大量餐饮客栈,作为个体户没有纳入经济统计。要加强个体户精细化管理,发改部门要积极同网络平台对接协调,加强互联网平台餐饮客栈的数据管理,纳入经济和税务统计的范围。二是在法律层面探索生态经营权。洱海流域重视保护治理的投入,轻视生态资源的经营。建议从法律层面对洱海生态廊道、苍山步道等生态资源,探索确立生态经营权,在保障生态公益性前提下,将生态廊道和临近区域纳入生态经营权的管理范围,实行有偿经营管理。三是拓展大理市发展空间。大理市的行政区域大部分处于洱海流域,在“三区”管控下,能布局的产业较少。鉴于目前流域人口的密度和单位面积的经济密度均较高,要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动大理市和洱源县的经济稳步增长,必须在洱海流域之外拓展发展空间。建议,借鉴“飞地经济”经验模式,如大连市长海县在普兰店市建立工业园区的成功案例,在“大祥巍”一体化框架下,探索大理市与祥云、巍山等邻近县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共管共建共享新片区,为产业发展、产业转移、招商项目落地拓展空间。四是发展文化创意新业态。洱海周边常年散居着大量文化艺术设计人员。当前艺术设计已经脱离面对面沟通的旧模式,形成线上协作、异地作业的新型业态。要充分利用大理的这一资源优势 and 业态条件,在大理市集中打造文化创意设计展示区域,举办全国或国际文化创意活动,培育和发展文化创意设计产业。

(三) 社会层面,构建保护治理的评价机制

一是全面开展洱海保护治理的绩效评价。“抢救模式”实施至今已近10年。对于“抢救模式”的经验成绩自我总结较多,但缺乏更为客观的第三方评估,导致机构“叠床架屋”,保护治理责任划分出现“九龙治水”。建议引入第三方,对近10年来洱海保护治理的组织、制度、政策、资金、工程建设等进行全方面评价,为下步构建洱海保护精准治理的良性机制,提升保护治理成效提供决策依据。二是建立保护治理的科研管理制度。洱海流域科研单位多,缺乏统一的管理,存在多头研究、重复研究的问题。建议要高度重视洱海在生态文明建设、湖泊治理上的学术资源价值,增强科研管理的主动性,打造高原湖泊治理和绿色转型发展的高端学术平台,污染治理研究(自然科学)与绿色发展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并重,定期开展科研项目与课题成果评价。三是打造群众参与洱海保护治理的公共平台。流域群众参与保护治理的比例小、动力弱。建议进一步强化宣传发动,引导鼓励环境公益组织规范有序开展洱海保护治理活动,增强公众参与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对流域周边开展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户,鼓励开发洱海生态文创产品,依托科研院所搭建生态文明教育的研学平台。

责任编辑:李亚强

新时代文化宣传在融媒体环境下的 创新实践研究

马 雯

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媒体的变革，新媒体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主要平台。在新时代背景下，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精神和要求，运用融媒体环境开展文化宣传创新与实践，已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的内容更加多元化和立体化，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但融媒体环境下的文化宣传，也受到意识形态日趋多元、管理体系不完善、政策法规发展滞后、复合型人才不足、社会文化心理差异突出等方面的制约。面对新形势，应该从弘扬主旋律、提倡内容创新、完善监管体系、加强技术与文化融合、培养跨领域人才、推动政策创新等方面着力，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更好地提升新时代文化宣传的质量和效果。

关键词：融媒体；新时代；文化宣传；制约因素；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107-08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数智化等科技迅猛发展的浪潮，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媒体融合发展日趋成为文化传播媒介发展趋势、日常环境和重要范式。研究文化宣传在融媒体环境下的创新与实践，有助于从业者适应变化，更好开展优秀文化传播和主流价值引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这对于适应新时代发展提升文化传播效能、促进文化“两创”、加强文化交流以及培养新型媒体人才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的特点和优势

（一）融媒体环境对文化宣传的影响和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①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融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宣传工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②融媒体环境已日趋成为文化宣传“不可须臾离”的背景场域。

融媒体环境通常指不同媒介形态相互融合，形成新的传播模式的情境。融媒体不是多种媒介形式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整合与创新，它打破了传统媒介的时空界限，促进了平台之间的相互融合、资源整合和协同，使得文化宣传的内容、形式及其传播的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化、碎片化，传播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化、立体化，传播效率、效能提升不断实现飞跃。一是宣传手

作者简介：马雯，《云南政协报》通联部编辑，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融媒体发展。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6页。

^② 庄晶：《融媒体背景下群众文化宣传引导策略研究》，《大众文艺》2020年第22期，第7—8页。

段更加多样和高效。融媒体环境使得文化宣传的内容、形式和渠道更加多元化、立体化,传播效率、效能提升实现飞跃。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结合,文化信息能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提高了信息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宣传互动性和参与性不断增强。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角色,而是可以通过评论、转发、创作等方式参与到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双向互动不仅让受众对文化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验,也为文化宣传者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有助于不断优化和调整传播策略。三是宣传内容更加丰富多样。融媒体环境下的文化宣传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涵盖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能够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此外,随着传播渠道的网络信息化发展,文化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互动性、体验感的增强激发了受众的参与热情,极大提升了宣传效果,更好地激发起公众的兴趣并实现情感共鸣。四是新时代文化宣传具有国际化的特点。跨国界的文化传播不仅有助于推广本国文化,也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这要求文化工作者要致力于通过有效的文化宣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地位,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国际传播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二) 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创新的优势

1. 有利促进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创新性传播

一是有利创新平台载体,激活文化资源,实现传统与现代对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需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新媒体手段的运用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可能,能够将传统文化以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和接受方式的形式呈现,使其焕发新生。二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社交网络、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工具,具有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的特点,能够让更多人在短时间内接触到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三是新媒体手段能够创新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传统的戏剧、音乐、书画等艺术形式,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重新编排和演绎,使其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四是新媒体还能够促进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人们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五是新媒体也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激发公众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从而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 有力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文化自信成为维系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利用融媒体平台创新性广泛、迅速传播中华文化,不仅能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还有利于增强全体中华儿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一是融媒体平台能打破时空限制,让中华文化的精粹得以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二是融媒体平台可以提供互动性强、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环境。三是融媒体平台为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空间。总之,融媒体平台是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它不仅能够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还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色。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共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3. 内容形式灵活多样,广泛适应受众需求

(1) 文化宣传内容趋向多样化、个性化,目标群体更加细分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宣传的内容愈发趋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且受众群体变得更加细分化,每个人对于文化的需求和兴趣点都不相同,文化宣传需要更加精准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面宣传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喊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会适得其反。”^① 在新媒体时代,文化宣传需要更加精准地定位和传播策略,以满足不同人群的

^①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53页。

需求和兴趣点,才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2) 提高公众文化参与度,增强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媒体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更好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及时把人民群众创造的经验 and 面临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融媒体以其独特的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互动性强等优势,为文化宣传开辟了新的道路,有效地提高了公众的文化传播度和参与度。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通过多元化的媒介形式,注重与公众的互动和沟通,不仅让公众成为文化宣传的参与者,更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可见,融媒体环境下的文化宣传在增强公众文化获得感和满足感、鼓励公众参与文化“两创”和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媒体融合发展有利于优化文化传播路径

媒体整合发展有利实现媒介资源整合,打造全方位、多维度的传播平台。一是传播形式丰富多样、生动灵活,文化传播效能和受众体验获得极大提升。融媒体环境下,新兴文化传播平台突破传统单一传播模式,实现传播内容从文字到图像及音、视频等多渠道、多形式传播,能够以丰富的媒介载体样态满足不同受众的多样化需求。二是全媒体传播格局促进了媒体内容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不同的媒介有其独特的传播特点和受众群体,通过资源整合,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内容服务。总之,借助数字化和互联网科技浪潮,融媒体发展有利于实现媒介资源整合,打造全方位、多维度的传播平台,使文化传播方式、路径获得跨越性的优化和变革,媒体内容形态极大丰富、公众参与度大幅提高、文化传播综合效能获得巨大提升。

面对融媒体环境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深入研究文化宣传创新实践,推动文化宣传工作实现自身发展和对融媒体环境变迁的积极应对,意义重大。一是推动融媒体环境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创新发展,是守牢党的意识形态阵地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融媒体环境下互联网和高科技的运用和迅猛发展,既给文化宣传工作和守牢思想意识形态阵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现代化传播平台、载体和传播手段。二是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使命任务。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的创新实践,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宣传教育,必将为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质生产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对增强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三是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传播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两个结合”的文化成果,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新要求,也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使命和新任务。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创新实践,是深入阐释、广泛宣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增强我国主流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四是创新和丰富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的融媒体肩负新的传媒使命,作为文化新质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融媒体,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和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渠道多角度全方位进行文化宣传,使文化产品的种类形式极大丰富,数量爆发式增长,对人民群众增长知识、拓宽视野、丰富文化认知和体验、充实精神生活,进而提高国民整体思想道德和文化素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人民日报:《总书记引领我们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人民日报》2023年10月8日,第1版。

二、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 利益格局分化、利益主体和意识形态多元对文化宣传形成挑战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日趋多元。在部分网络社区和元宇宙空间,不少网络新媒体传播主体和受众群体仍存在身份的虚拟性及信息溯源的困难,这给不良文化、非法信息提供了传播扩散污染网络空间的机会。^①

新时代的文化宣传面临商业利益侵蚀、信息碎片化和表面化、网络空间极端言论、泛娱乐化趋势等多方面挑战。例如,某些网络游戏公司为了吸引用户充值,设计出诱惑性极强的诱导消费机制,宣传虚荣、奢侈和及时行乐,这与倡导勤俭节约、立足艰苦奋斗的传统文化价值相冲突。一些带有消极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如宣传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商品拜物教和金钱至上的视频、音乐和网络文学作品等受到一部分年轻人的追捧,必然对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构成冲击。一些网络达人和自媒体为吸引流量和关注,公然传播低俗、暴力或有错误价值导向的内容,对青少年和缺乏研判能力群体的价值观形成不良影响。一些作品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甚至歪曲和否定历史事实,以吸引眼球和提高知名度。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政府、媒体机构、文化工作者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坚持正确的文化舆论引导方向,加强监管,创新宣传方式,丰富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确保文化宣传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健康发展,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 管理体系不完善,版权保护和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在融媒体环境的加持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产品的数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然而,这种快速的生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尤以版权保护和文化安全问题最为突出。现有的网络监控技术和内容、知识产权识别检测技术尚不能完全满足日益增长的网络信息管理需求,对于一些新兴的媒体或社交平台及其传播方式,监管手段和技术更新还不够及时,文化产品容易被复制和传播,给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创作者的权益会受到侵害,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也会受影响。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匿名性,一些不良信息、错误观点和有害内容容易在网络上传播,尤其是一些境外敌对势力蓄意制造和传播虚假或经技术手段篡改过的音视频内容、图片,妄图通过造谣、诽谤,污蔑诋毁我国国情民情、党委政府形象和既定方针政策执行情况。因此,加强文化安全监管,确保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政策法规发展滞后,难以满足新媒体时代的需求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内容生产、加工和传播的形式和途径日新月异,融媒体传播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创新性的激增,导致既有法规政策调整更新滞后,对一些新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整规范存在真空和缺位,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带来信息监管难题。虚假信息、网络谣言、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层出不穷,而现行的政策法规往往难以对这些现象形成有效约束,或快速高效地进行防范和打击。二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新媒体内容的版权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也存在争议和缺位。三是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多样性和跨国性等特征,使传统的法规体系难以适用。不同的新媒体平台有不同的运作模式和技术特点,而现行的法规往往基于传统的媒体形态设计,对一些新型媒体仍难以进行有效规范。四是融媒体时代公众的媒体参与度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这对传统的媒体管理规范 and 体制机制提出了挑战。

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于融媒体环境下,群众文化传播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和定位日渐模糊。^②如何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有效防止滥用言论自由,是政策法规体系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① 庄晶:《融媒体背景下群众文化宣传引导策略研究》,第7—8页。

^② 庄晶:《融媒体背景下群众文化宣传引导策略研究》,第7—8页。

（四）人才短缺，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不足

作为一项专业的、长期的工作，融媒体建设需要由专业的人才和运营团队进行统筹规划。^①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使文化传播途径更加多元化，受众也更加广泛。然而，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人才非常紧缺。这类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能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推动文化的传播，还要有深厚的文化学养，能够理解文化的精髓，将文化内涵准确无误地传递给公众。

目前，很多文化宣传活动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上，没有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来提升宣传效能。一方面，技术人员往往缺乏对文化艺术的深入理解，难以把握文化传播的关键点；另一方面，文化工作者对于新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不能有效地将文化内容数字化、网络化。这种状况限制了文化宣传的发展，影响了文化的传播效率和广度。

（五）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差异，影响文化产品的推广

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差异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心理和认知层面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接收、处理和理解。在文化产品的推广过程中，会直接影响到文化产品是否能够被目标受众接受和喜爱。

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于文化产品的认同感和共鸣程度不同。例如，一部电影在不同国家的票房表现可能会有很大差异，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电影是否能够触及当地文化的心理共鸣点。如果文化产品贴合目标受众的文化心理，更容易引起共鸣，从而促进产品的推广。此外，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差异还体现在对文化符号和意义的理解上。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符号体系和意义解释，一个在某个文化中具有积极含义的象征，在另一个文化中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甚至带有负面含义。因此，文化产品在设计和推广时需要从符号学和语义学深入了解目标文化，避免误用符号，导致不必要的误解或冲突。此外，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差异还涉及沟通方式和风格。不同文化对于沟通的直接性、委婉性和形式性有不同的容忍度和期待。这意味着文化产品在推广时需要采用符合目标文化期待的沟通策略，以便更有效地传达信息并引起共鸣。

总之，社会文化心理认知差异是影响文化产品推广的重要因素，只有对这些差异有深入的理解和尊重，才能设计出跨越文化障碍、触动不同受众内心的文化产品和推广策略。

三、融媒体环境下文化宣传发展路径探析

（一）加强党对文化宣传的领导，弘扬主旋律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导和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② 要通过教育、媒体和公共活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程和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文化自信。同时，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创作和传播反映时代精神、展现正能量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音乐和文学作品等。在确保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还应主动创新群众文化产品形式，以更好地适应融媒体传播技术特点。^③

二是要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积极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尤其是其中一些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网络人士和意见领袖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加强党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领导，坚持对他们信任尊重，加强团结引导，把他们切实组织起来，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他们的

① 文晶：《融媒体时代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外新闻宣传策略》，《传媒论坛》2021年第17期，第117—118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17页。

③ 庄晶：《融媒体背景下群众文化宣传引导策略研究》，第7—8页。

社会实践活动和网络影响力,积极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正能量,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贡献力量、发挥作用。同时,要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政治引领和教育,提升他们对国家方针政策和文化战略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三是要强化基层文化宣传。基层是文化宣传的一线,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文化宣传能力,通过社区、村镇、学校、企业等基层单位,将文化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利用基层文化中心、图书馆、文化广场等设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持续唱响文化主旋律,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人心。

(二) 完善监管体系,净化网络空间

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网络,必然方便群众、造福人民,反之则有可能极大地危害社会。规范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环境、端正价值导向、倡导文明上网,势在必行。

一是加强网络空间行为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环境的净化必须以法律作为保障,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伦理和行为准则,把网络建设融入行业管理规范体系。多部门联合联动,政府、企业、家庭相结合。政府要加大对网络不文明现象的打击力度。企业要强化网络平台责任,严格把握好准入制度,作品发布要经过审核,倡导平台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二是加强网络空间积极正面的氛围营造。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新时代网络文明建设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追求、文化风尚,深入开展网上党史学习教育,传播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形成的伟大精神谱系,打造广大网民喜闻乐见、积极向上、健康有益的作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让网民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收获、有所成长。不断创新网络作品、举办丰富多彩的网络文化活动,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积极的网络氛围,打造丰富多彩的网络环境。

三是加强文化安全监管。新时代的文化宣传不仅要求内容具有创新性、互动性和针对性,而且需要紧密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尤其是数字化和网络化技术,以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实现立体化、个性化、精准化的传播。例如,一部介绍传统文化的纪录片可以通过电视台播出,同时也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或点播,观众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和分享,这样的多渠道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文化宣传的影响力。但这同时也对加强版权保护和文化安全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全媒体传播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①要加强对融媒体内容的文化安全甄别和监管,尤其要加强对相同内容以不同媒体形式和变化形态在不同媒体渠道呈现和传播的识别、评鉴和监管,要同时借助AI、大数据等前沿科技手段和科学严密的监管制度、流程,使一切不良内容纵使改头换面、变化多端,在监管者的“火眼金睛”下也无所遁形。

(三) 适应新媒体发展需求,推动政策法规创新

一是更新和完善新媒体相关的版权政策至关重要。要明确新媒体环境下版权的界定、使用规范以及侵权责任,保护创作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鼓励创新和合理利用。要制定完善适应融媒体、网络信息化、人工智能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大执法力度,保障版权。针对融媒体结合现代化高科技手段迅猛发展的新形势,要进一步加强针对融媒体领域版权认定、识别、监管和保护的政策法规制定完善,与时俱进升级更新相关执行操作标准,从而切实保障优质的作品给作者带来应有的收益,为创作者建立高效可靠的作品产出激励、保障机制,为相关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提供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二是针对新媒体平台上的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需要制定严格的法规进行打击,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滥用,同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三是为了防止新媒体成为传播虚假信息和不良内容的渠道,法规应当加强对平台内容的监管。政府还应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18页。

当通过立法促进新媒体平台运营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防止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行为。政府、企业、社会有关各方应共同努力维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性媒体生态,尤其要注重保障中小型和新兴媒体的生存空间防止融媒体领域出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

(四) 培养跨领域人才,优化人才结构

培养既懂技术又懂文化的复合型融媒体文化传媒人才成为当务之急。这要加强教育体制的改革,鼓励和培养跨学科学习和研究人才,同时也需要企事业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为文化宣传的新时代做好准备,为新时代文化宣传注入新的活力。

1. 加强对跨学科融媒体文化传媒人才的培养,促进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

跨学科融媒体文化传媒人才能够在科技创新与文化遗产之间架起桥梁。他们不仅理解科技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应用,还能够洞察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从而在新技术的设计和应用中融入文化元素,使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冰冷的代码和机械的运作,而是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交流和传承。跨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支持,包括建立跨学科课程体系,鼓励学生在主修专业之外,探索其他领域的学习;提供实践项目和研究机会,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学会如何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解决问题;鼓励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接触社会的机会。例如,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和鼓励跨学科研究实践项目,建立多学科研究中心,为跨学科人才提供职业发展指导。社会对于跨学科人才的认可和需求也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企业及相关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应该更加重视候选人的多元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专业背景。同时,社会应该对跨学科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跨学科项目的学习和研究。

总之,宣传文化人才是掌握现代传播科技、具备优良媒介素养和治理能力、坚守社会责任的“智媒人才”。^①加强对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不仅可以促进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还可以推动社会创新和经济发展,为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2. 鼓励行业跨界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队伍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行业边界的日益模糊,鼓励行业之间的跨界合作已成为融媒体环境下推动文化宣传创新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汇聚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视角,激发新的创意和解决方案。

一是通过跨界合作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交叉融合,产生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例如,科技公司与艺术家的合作可以推动数字艺术的发展;文化传媒行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则可能带来文化传媒从内容到传播范式的革命性进步。二是适应跨界合作的需求,企业和组织需要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队伍。这意味着在招聘时不仅要考虑到候选人的专业能力,还要重视他们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多元化的团队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提出更全面的解决方案。三是教育和培训机构应调整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跨界合作能力。这包括提供跨学科的学习项目、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和实习,以及与企业合作开展工作坊和研讨会,帮助学生了解不同行业的知识背景和工作方式。四是政府和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提供平台,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例如,建立行业交流会议和论坛,鼓励企业分享经验和资源;设立跨界合作基金,支持有潜力的合作项目;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企业招聘和培养多元化的人才。

因此,鼓励行业跨界合作,构建多元化的人才队伍,不仅能够为融媒体文化传媒、宣介机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还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创新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教育机构、政府和行业协会都需要发挥积极作用,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跨界合作和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

(五) 加强技术与文化的融合,注重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要做人的工作的,要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重要职责。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① 柳杰:《“智媒人才”:5G时代宣传文化人才新要求》,《中国记者》2019年第9期,第126—128页。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① 相对于传统纸媒,融媒体更需要加强策划,打造具有较高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产品,才能具有恒久魅力。^②

1. 利用新技术讲好文化故事,丰富文化表现形式

传统纸媒的副刊要想长久不败,必须利用网络的独特优势扩大地方报纸的影响力。^③ 在利用新技术讲好文化故事、丰富文化表现形式已成为重要趋势,新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增强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还能够拓宽文化的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以更加直观和便捷的方式,接触到多样的文化内容。

一是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为文化故事的呈现提供新手段。通过这些技术,观众可以沉浸在一个三维的虚拟环境中,仿佛亲身体验历史事件或文化场景,从而获得更加深刻和生动的体验。例如,博物馆可以通过VR技术,让观众“穿越”到古代,亲身体验和感受历史文化。二是交互式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也为文化故事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创作者可以通过互动剧本、游戏化内容等形式,让观众参与文化故事的创作和演绎,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兴趣。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的分享功能,传播优秀的文化作品,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在城市文化传播中,受众用户数量与传播效果有正相关关系,受众越多,传播效果越明显。^④ 三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为文化故事的挖掘和个性化推荐提供了可能。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和消费习惯,可以向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文化内容,从而提高文化内容的匹配度和满意度。四是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创新为文化表现形式的丰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结合视频、音频、动画、图形等多种元素,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文化产品,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2. 坚守文化传播的伦理底线,尊重文化多样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呈现前所未有地扩大和加快。在这一过程中,坚守文化传播的伦理底线,尊重文化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对各种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尊重,也是维护世界文化生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在传播本土文化的同时,应避免贬低或歪曲其他文化,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和特点。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都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应当努力保护和传承那些濒临消失的小众文化,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以增进相互理解,减少文化冲突。同时,这也有助于形成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全球文化景观。总之,坚守文化传播的伦理底线,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文化和谐共存的重要原则。在这个多元互联的世界中,我们应当共同努力,既保护和传承各自的文化特色,又积极拥抱和学习其他文化的精髓,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面对全球一张网,需要全国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加大对媒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力度。各级宣传管理部门要改革创新管理机制,配套落实政策措施,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⑤ 只有紧紧围绕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要求,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优势,不断创新内容生产与传播方式,提升传播效果与影响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受众,推动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融媒体的优势,同时也要正视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探索和创新,更好地完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313页。

② 余意明:《媒体融合与地域文化宣传的“株洲探索”》,《新闻战线》2019年第14期,第118—119页。

③ 余意明:《媒体融合与地域文化宣传的“株洲探索”》,第118—119页。

④ 庄晶:《融媒体背景下群众文化宣传引导策略研究》,第7—8页。

⑤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2019年3月16日,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4/2019-03/16/c_1124241408.htm, 2024年5月9日。

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的思考

——以云南省为例

谭舒匀

摘 要：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在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进程中开展的有益探索，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难题。通过易地搬迁，一批困难群众从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搬迁到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但与此同时，生活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变化也带来了如何有效适应新环境的问题，笔者聚焦这一问题，依托调研提出了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的一些思考，为做好该项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会治理；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4) 02-0115-06

一、研究背景

用易地扶贫搬迁办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人类减贫事业上取得的伟大创举，是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实现低收入困难群众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①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百姓安居乐业问题，强调“要完善移民搬迁扶持政策，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②。云南省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2005年底，全省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10.5%，低收入人口占全国低收入人口的12%，居全国第二^③，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到2020年底，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与全国一道实现了整体脱贫，全省99.6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从原住地搬出，建成了2832个集中安置点，迈出了脱贫奔小康和推进实现乡村振兴的第一步^④。2022年，云南进一步制定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及配套方案，奖补安置区特色产业项目2559个，在安置区周边配套建立工业园区15个，农牧业产业基地598个，就业帮扶车间663个，仓储和旅游等产业项目615个；万人以上集中安置区实现了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全覆盖，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搬迁群众至少接受了一次培训和掌握了一项技能，搬迁家庭至少1人就业，实现了零就业家庭的动态清零，搬迁群众和

作者简介：谭舒匀，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公共政策。

① 杨佳：《习近平扶贫论述中的系统思维研究》，扬州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② 《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2020年9月21日，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20-09/21/c_1126520311.htm，2024年6月30日。

③ 《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2008年5月14日，https://www.yn.gov.cn/zwgk/zfxgkpt/fdzdgnr/ghxx/zxgh/201903/t20190301_179291.html，2024年5月15日。

④ 《地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巡礼之十六 小康路上闯出“云南奇迹”——云南省“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纪实》，2021年3月3日，https://www.ndrc.gov.cn/xwdt/ztl/ydfpbqgzl/dfxl/202103/t20210303_1268846.html，2024年5月20日。

搬迁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升,逐步实现“稳得住、有事做、容得下、能发展”的目标。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是贫困群众在地理位置上的迁移,而且意味着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重建、社会关系的重塑。新的社会结构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①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和牵挂搬迁群众,多次赴地方调研并专程考察搬迁安置点,多次指示要做好搬迁后扶工作。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后续帮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提供了遵循。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指出要“聚焦原深度贫困地区、大型特大型安置区,从就业需要、产业发展和后续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完善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完善后续扶持政策体系,持续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②,并把此项工作列入“十四五规划”作出安排部署。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工作,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近年来,为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在新的社区能够住得习惯、融入社区、获得发展,云南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加强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大中型集中安置区大多成立了新的社区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小型安置点一般采取并入就近社区的办法进行管理。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昭通靖安新区^③,以及全国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县城集中安置区会泽新城^④。全省2832个易地扶贫安置点都制定了管理章程、居民公约和村规民约,成立起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建立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按照标准逐步设立了民政、社会保障、就业创业、卫生计生、文化服务等“一站式”便民服务站……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不断完善。

二、研究目的

笔者参与云南大学《乡村大调查:云南省2022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机制及政策建议》课题组赴东川(昆明)、禄劝(昆明)、鲁甸(昭通)、会泽(曲靖)等地,走村入户、座谈走访、问卷调查。调研发现,各地在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各类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机构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安置区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得到加强,搬迁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提升,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虽然易地搬迁群众总体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也逐步实现“拔穷根”“换穷业”,但距离“可发展”“能致富”仍有一些差距,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

随着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完成,安置区短期内迅速集聚了大量的新增人口,在人员构成、人口素质、生存状态、生活便利、社区稳定等方面,都与传统社区产生了不尽相同的状态,一方面

① 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中国经贸导刊》2020年第23期,第4—8页。

② 《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2021年3月22日, <https://www.12371.cn/2021/03/22/ARTI1616411867434175.shtml>,2024年4月20日。

③ 《“枫桥经验”的“靖安版本”》,2020年9月13日, https://www.yn.gov.cn/ztgg/jjdytpgjz/ynjy/202009/t20200913_210577.html,2024年3月20日。

④ 《云南会泽:易地搬迁再建一座幸福城》,2020年1月27日, <http://sn.people.com.cn/n2/2020/0127/c378306-33746156.html>,2024年1月20日。

搬迁人群面临着生产生活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另一方面,易地搬迁打破了原有的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搬迁群众甚至面临着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在不同程度上的“断裂”和“重构”等一系列矛盾、困难和问题,给集中安置区的基层治理、社会稳定、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带来了许多挑战。

本研究一是要聚焦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探寻有效管理路径以及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二是要聚焦解决好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怎么治理”“怎么发展”的问题,通过对前期各地安置区社会治理探索实践样本的分析研究,提出构建安置区相对完善的社会治理、社区治理的办法举措、制度机制等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三、研究意义

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后续发展,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关键一环,尤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虽然通过易地搬迁和人口集中安置,贫困人口摆脱了“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窘境,但在实现持续增收致富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调研发现,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社会治理与传统社区的治理有明显的差异。传统社区中的人群是自然汇聚逐渐集中形成的,居民成分构成丰富,在人口聚集的过程中产业也随之发展,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容易形成市场气候,也更容易形成和谐的邻里关系和社会氛围。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是由政府统一规划安排,以较快速度“新建造”的社区,聚居人群由原来分散在广大偏远山区、点多面广的人口构成,搬迁群众从星星点点的“散居”状态,集中搬迁到高楼林立的安置区,从“山里人”“村里人”迅速变成了“城里人”“社区人”,融入新社区、新生活的难度较大,适应城镇生活也将面临一个较长期的过程。由于易地搬迁群众来自不同的地区,民族风俗、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各不相同,会影响到居住人群邻里间和谐关系的构建。因此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只有先解决了搬迁群众的稳定脱贫、社会保障和产业发展,然后才有可能去思考和追求“特色社区”“文化社区”的发展。

在调研中我们也看到,虽然不少地方的安置区治理体系建设离“服务人、凝聚人、改变人”的要求还有较一定的差距,但是易地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就业帮扶、社区服务组织建设等发展路径是耦合的,易地搬迁安置区群众“能致富”的终极目标,与乡村振兴“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战略要求是一致的。这种耦合性和一致性,使得我们更深刻认识到,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分析一段时间以来,全省各地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已经组织实施或正在探索的社区组织、管理服务、群众需求、生活保障、社区和谐等社会治理实践,研究分析安置区的产业振兴、就业帮扶、生态环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现实路径,寻找到目前以及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且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下大力气做好易地搬迁扶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后半篇文章”,这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的现状

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在社会治理和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产业培育的困难,以及搬迁群众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中遇到的社区融入困难等,共同构成了当前安置区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搬迁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也对实现安置区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障碍。

(一) 安置区社会治理基础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一方面,社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滞后。部分集中安置点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文化中心、

养老服务中心等设施建设尚未按计划完成配建,还存在污水及垃圾设施配套不齐全,基层发热哨点诊室设置覆盖面不够等问题;有的安置点虽然建设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但未达到每百户30平方米的标准;部分安置区配套的综治中心、派出所、公共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尚未配备到位,必要的基层自治、群团、社会等组织建设不规范,片长、楼栋长、警务室、调解室根据安置点规模设置不够合理,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基本阵地的为民服务站点还没有做到全覆盖。

另一方面,社区管理服务人员力量薄弱。一些工作人员没有经过相关专项培训,业务能力不足,大中型集中安置区人口基数大,专业的社区管理人才十分缺乏,人少事多的矛盾极为突出;目前的社区干部大多是原居住地村干部,初步接触城市社区管理,经验匮乏,观念和角色难以迅速转变;部分集中安置区存在基层党建工作基础薄弱情况,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等社区社会治理工作组织还没有建立健全,还没有实现党的组织、党的工作对安置区群众全覆盖;部分集中安置点还存在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机构职责不清、工作范围界定不清、工作机制不够成熟完善,专业社会服务工作人员待遇偏低、人员不稳定等问题,导致社会治理资源分散,自我服务管理能力薄弱。

(二) 搬迁群众面临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融入社区生活难度大

一方面,安置区群众跨县、跨乡(镇)易地搬迁,对祖祖辈辈世代居住的环境依赖度高、故土观念强。同一社区人群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短时间难以改变,存在相互间文化和生活习惯的磨合、包容、融合问题;另一方面,易地安置后搬迁群众“农民变市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前以家庭为单位“农业收入+劳务收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突然间变成了“土地流转收益+劳务收入”的“按劳取酬”的社会化生产和分配模式,生产方式的明显差异、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必然存在较长期的转变和适应过程。

调研发现,部分安置区只满足了“居住”功能,但诸如技能提升、收入稳定,转变新观念、融入新环境等更深层次的难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安置区搬迁群众就近就医、就学尚未落实,低保、医保和养老、婚育等事项,仍然要回到迁出地办理,“两头跑”导致群众办事难、成本高,搬迁群众与居住社区工作生活联系不紧密,融入社区难度大,部分搬迁群众萌生出想要“回到老家(迁出地)”生活的念头。

(三) 安置区产业培育难,搬迁群众稳定增收支撑乏力

一方面,由于各地能够结合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引导培育不足,主导产业发展缓慢,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集中安置点周边配套发展的农业园区、工业园区、产业基地等大多数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竞争力不足,帮扶车间大多以初级产品加工和来料加工制造为主,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生产规模小、效益低、抗风险能力差,短时间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受经济形势的影响,部分帮扶车间运营困难,有的已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吸纳群众就地就业、增收致富的能力减弱,产业发展对易地扶贫搬迁家庭的收入带动效应不明显;此外,社区集体经济培育力度不足,安置区经营性资产如商铺、超市、菜店、药店等有待盘活,部分安置区的资产底数尚不明晰,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等权属尚不明确,导致资产运营效益不佳,集体经济持续增收乏力,安置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易地搬迁后,虽然青年人为增加劳务收入普遍有意愿到外地务工,但由于群体劳动技能素质不高,大多无法满足现代化生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和学历要求。据统计,云南脱贫劳动力和监测对象中“有技能的”仅为3.85%,初中以下文凭占比为46.55%,在就业市场中竞争能力低。受经济下行影响,青年人外出就业门路日趋狭窄,返乡人数逐渐增多。安置区常年居住的留守群体,多以妇女、儿童和老年人为主,部分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老人和妇女,也因自身能力和就业岗位需求不匹配,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群众增收难度大。

(四) 移民搬迁后续帮扶政策制定不够精准, 贯彻落实不够有力, 安置区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 部分安置区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系列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措施的系统梳理和学习不够, 在统筹协调、督促落实、结合当地实际细化政策等方面, 缺乏针对性, 措施不够精准; 有的县区迁入地、迁出地的衔接不到位, 对搬迁脱贫户的“三保障”关注不够, 对监测对象的识别标准把握不精准; 部分搬迁群众对户口迁移后家庭持有的《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三块地”的使用权到期后再次承包等政策的落实问题仍存有疑虑; 不少地区存在数据采集不准确、更新不及时、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现象, 存在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够、工作对接不够的情况, 导致现有政策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未能形成贯彻落实、推进发展的有效合力。另一方面, 由于搬迁群众多数靠转移性收入维持生活, 无力缴纳物业、水电等生活费用支出, 因此部分安置区从迁入之日起就由政府买单或实行减免等优惠政策; 虽然规定了政策过渡期限, 但过渡期结束后, 此类支出仍然没有明确的出处, 靠地方政府继续投入, 财力又难以为继, 政策上如何接续尚未明确。

调研发现, 许多安置点缺乏系统清晰的发展方向和有效举措, 规划时未能体现“特色化”“差异化”的要求, 更缺乏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整体发展思路; 不少搬迁群众仍存在着过度依赖政府转移支付等“输血式”帮扶的情况, “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 对于依靠自身努力,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信心不足, 内生动力不强。

五、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社会治理问题的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困难和问题, 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和资金投入, 采取有力措施, 促进产业发展和就业保障, 进一步加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的社会治理。

(一) 厚植社区治理基础,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进一步理顺社区治理体系, 把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首位, 推进“基层党组织+”组织架构, 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体, 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物业组织为补充的组织体系, 构建党建工作为引领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发展的治理格局。加快形成“社区(街道)—小区(楼栋)—党员(小组)”的网格化管理系统, 建立“社区管理+物业服务+党员业主带头参与”的搬迁群众自主管理模式, 厚植社区治理基础; 加快安置区便民服务站、综治中心、派出所(警务室)、公共法律援助服务中心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实现社保、卫计、优抚、救助、养老、残疾补贴等在社区“一站式”办理; 依据社区规模(所辖小区数、户数、人数等)、以及人口密度、服务半径、特定人群服务对象等因素,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工作需要, 合理确定安置区社会服务管理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千方百计充实基层力量, 进一步规范社区管理, 稳定社会治理人才骨干队伍, 确保工作有人抓、服务有人管。

(二)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帮助群众尽快融入社区生活

探索建立我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服务标准体系, 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目标, 完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 实现安置区服务管理规范化; 加快推广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服务队伍为依托、社会慈善资源为助推的“五社联动”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聘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群众参与社区保安、保洁、物管、照料老人等服务工作, 给予相应的劳动报酬, 调动搬迁群众参与自主管理的积极性; 有条件的社区还可以就近流转一定面积的农业生产用地, 划块提供给有需求的搬迁群众, 建设“便民微田园”, 解决他们日常所需, 缓解他们故土难舍、农活难忘、农具难放的情绪; 注意处理好社区中不同群体的利益, 构建新型和谐社区关系, 提倡安置区群众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积极推动社区创

建“日间照料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等便民服务设施,鼓励开办“小食堂”“小餐桌”等便民举措,打通有效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做好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物质保障和服务,增强群众对社区的认同感,帮助搬迁群众更好融入社区生活。

(三) 聚焦特色、培育产业,努力保障群众稳定增收

坚持把安置区产业配套和后续产业发展作为搬迁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基础保障,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优势,因地制宜规划符合当地实际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跳出乡村,以县域经济的视角系统谋划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按照“一县一业”“一区一策”“一村一品”的要求加强产业引导,针对不同安置点的情况分类施策,多渠道、多元化发展特色产业;按计划分步骤制定后续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支持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扶贫车间,结合实际推广适宜技术,千方百计发挥搬迁群众在种养殖业方面的经验和技能,通过发展特色种养殖业,促进一批有劳动能力、勤奋努力的搬迁户率先发家致富,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摸清底数,落实集体资产权益,将配套建设的商铺、公共停车场、农贸市场等明确为搬迁群众集体资产,通过集体经营、委托经营、招商盘活等方式,实现集体收益稳定增加;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重点选择一批成长性好、前景可期、辐射力强的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培育更多“链主”企业 and 专业合作社,努力实现产业、创业、就业齐头并进,带动和帮助更多的搬迁人群实现稳定增收。

(四) 完善政策、强化落实,促进安置区可持续发展

认真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0部委印发的《关于切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指导意见》,贯彻落实国家民政部等9部委印发的多个“指导文件”精神,积极争取中央加强对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人口集中安置区保障性转移支付支持力度;建议对重点脱贫人口新增非义务教育期费用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养老保险金、生态补偿金、社会救济和救助等转移支付的标准。认真贯彻云南省各级各部门印发的“工作方案”“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政策组合,做好户籍迁移、房屋产权管理工作,落实物业管理费、电视收视费减免,水电费优惠补贴等物业管理服务。及时落实各类支农惠农奖补政策,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精神,^①进一步宣传和明确搬迁群众依法享有原“三块地”(耕地、林地、草地等)的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衔接落实好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让搬迁群众“吃上”长效“定心丸”。进一步贯彻落实我省《关于支持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相关精神,将符合条件的搬迁家庭新增人口住房需求,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加快推进搬迁安置区村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明晰搬迁群众财产权、搬迁安置区集体产权,加快完善扶贫资产运营收益分配和处置等相关管理制度,在确保扶贫资产安全运行、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扶持壮大搬迁安置区集体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 语

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实施,不仅需要政府的有力推动和政策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搬迁群众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搬迁群众只有积极投身到社区治理当中,才能实现从“搬得出”到“稳得住”再到“能致富”的转变。这一目标必将在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推动下,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搬迁群众的积极配合下更好的实现。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宋洪远:《深化农村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农村工作通讯》2023年第5期,第34—36页。

(上接封二)

学条件形成鲜明对比，报告前沿而精彩。他描述了在美时异常庞大的计算机设备，并以随身带回的一段波导管实物进行展示。那时，波导管的研究尚属机密，孟昭英作为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为了在联大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顾美国的检查风险带回了该器材，这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报告会结束后，很多师生拥到讲台前轮流观摩。黄宏嘉说：“我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选择了微波作为研究方向，就是受到孟先生那次报告的启示。”

转眼已是1944年四年级下学期，抗战到了非常紧要的关头。为配合盟军做好抗敌工作，国民政府决定从全国大学中征调当级毕业生担任翻译官。在联大读书的黄宏煦、黄宏嘉兄弟也积极应征，投笔从戎。黄宏嘉回忆：“我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东北，被分到原始森林的缅北战区22师66团3营，就这样上了前线，服兵役到日本投降为止。”



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1944级毕业合影，三排右起第三人为黄宏嘉。（图片提供：黄柯）

抗战胜利后，黄宏嘉应聘到重庆国际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1946年调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1947年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任助教，1948年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并于翌年获硕士学位。这时，是继续攻读博士还是回国投身祖国建设？在强烈自然的爱国心支配下，黄宏嘉于1949年秋毅然选择回国。为获美方许可，他撒谎说只是去欧洲旅行而已。尔后，突破重重封锁到了香港，又辗转过台湾海峡抵达天津，终于回到祖国。

“我急于回国的唯一原因，我想，不是我爱美国少一点，而是我爱中国多一些。我爱中国的整个，不仅爱她的美德，而且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谈起这一坚决果断的抉择，黄宏嘉在1949年8月28日致美国友人沃汉夫妇的信中动情地说。

回国后，黄宏嘉作为我国光纤技术的先驱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毫米波传输的研究，发展了耦合波理论，提出了“超模式”概念，发展了处理某些复杂模式耦合问题的物理数学方法，其领导的研究组于1980年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单模光纤，实现了他工业强国的人生梦想。

作者简介：龙美光，云南师范大学教师、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秘书长，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五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班长。著有《靛花巷三号：西南联大书信录》。

（责任编辑：念兴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YUNNAN SHEHUI ZHUYI XUEYUAN XUEBAO
(季刊, 1999年创刊)
2024年6月 第2期(总第102期) 第26卷

主 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 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 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 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 编: 650031
联系电话: 0871-68091598
电子邮箱: ynsyxbjb@163.com
出版日期: 2024年6月20日

定 价: 9.00元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No.2 (Sum.102) Vol.26 Jun. 2024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 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Tel: (0871) 68091598
E-mail: ynsyxbjb@163.com
Published: Jun. 20, 2024